鄧小平帝國三十年

作者：阮銘

鄧小平帝國三十年（１）

　　中國共產黨正在準備大張旗鼓地紀念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三十週年。那次全會，是從毛澤東帝國向鄧小平帝國過渡的歷史轉折點。所以也可以說，今年是鄧小平帝國的三十週年。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門屠殺之後，我在美國寫過一本《鄧小平帝國》，結尾一段話是：

　　「鄧小平在六四屠殺後宣佈把他的本來不合法的最高權力又一次轉讓給他的第三個接班人江澤民。所以應該說，鄧小平帝國在歷史上已經結束了。六四以後的中國，已進入後鄧小平帝國時代。這是一個將生未死之間的過渡時代。專制制度苟延殘喘，但還沒有斷氣。民主制度已孕育在母腹之中，但還沒有誕生。要使中國自由民主制度和平地誕生下來，還需要每一個中國人作出各自的獨立的貢獻。」

　　歷史表明，這個結語是錯了。鄧小平已於一九九七年二月去世，但他留下的鄧小平帝國沒有結束，還在繼續「崛起」；民主中國也沒有誕生。究竟如何解釋這一歷史現象？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現在人們比較熱心批毛，而諱言批鄧；大概是以為徹底批了毛，中國走向自由的障礙即可消除。我看很難。今日中國的統治思想，是「鄧小平理論」。鄧小平理論當然包括毛澤東思想，就是鄧小平自我標榜的「完整、準確的毛澤東思想體系」；你不批鄧，就不可能徹底批毛，此其一。其二，鄧小平對毛澤東思想確有「發展」，在當今世界比毛澤東思想更具欺騙性。

一九八九年席捲中國的自由民主運動，是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激盪的產物，被鄧小平的屠刀毀滅在天安門下。我當時判斷，鄧小平所恐懼的全球民主浪潮的「大氣候」和中國人民爭取自由民主人權的「小氣候」，豈是鄧小平的坦克和子彈消滅得了的？這「大、小氣候」終將再起結束鄧小平的帝國，所以寫下最後一章《暴力的失效與帝國的末日》。

歷史的進程出乎預料：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繞過血腥的天安門廣場，半年後抵達柏林牆下。東德共產黨沒有傚法鄧小平下令鎮壓，讓歡呼的民眾推倒了這座分隔共產奴役制度與自由世界的監獄之牆。羅馬尼亞獨裁者西奧塞古下了鎮壓令，軍隊拒不執行，反而逮捕和槍決了這位共產暴君。整個東歐共產國家獲得了自由。

最後傚法鄧小平的是發動蘇聯一九九一年八月政變的亞納耶夫。他把在黑海休假的戈爾巴喬夫軟

禁起來，宣佈自己代行總統職務，成立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接管全國權力，調動紅軍鎮壓莫斯科示威民眾。但當葉利欽爬上一輛坦克演說，與民眾一道阻擋軍隊時，塔曼裝甲師的戰車調轉炮口保衛葉利欽，存在七十四年的蘇聯帝國隨之瓦解。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南歐初興之時，世界上只有四十個民主國家，絕大部分屬於富裕的西方工業發達國家。二十年後，全球超過半數的國家和人口進入民主國家行列。有人從而認為人類已走向「歷史的終結」。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寫道：「我們可能正走向人類意識形態演變的終點，並以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化作為人類政府的最終形態。」

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共產奴役制度挑戰自由民主浪潮的歷史沒有終結。天安門屠殺後鄧小平的開放式共產奴役制度，在全球自由國家的資本、資源、資訊、技術、人才強力增援之下迅速「崛起」，今天正迫使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全球退卻。而人們尚未認識到鄧小平式新奴役制度的擴張對人類自由的巨大威脅。

從毛澤東帝國到鄧小平帝國

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我說過馬克思有兩個靈魂：追求「每一個人的自由發展」的人道主義的馬克思，認同暴力和無產階級專政、要把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的馬克思。毛只取其一。

秦始皇也有兩個靈魂：一個建設者的靈魂，車同軌，書同文，發展了古代中國的交通、水利、文化；一個暴虐者的靈魂，修長城，修阿房宮，修墳，焚書坑儒，以言治罪。毛也只取其一，說「破字當頭，立在其中」，其實是「只破不立」。

毛澤東用半個馬克思加半個秦始皇，建立起他的封閉帝國。封閉秦帝國的是萬里長城。封閉毛帝國的是意識形態的萬里長城──毛澤東思想。

一個封閉的奴役制度帝國，靠高度集權奴役、壓搾本國人民，也可以「崛起」於一時。陳毅不是說「寧可當掉褲子也要發展原子彈嗎」？毛帝國正是在不但當掉褲子，而且砸掉鍋子、餓死幾千萬人之後的一九六四年原子彈上天；接著在「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文化大革命中氫彈、導彈、人造衛星上天。

但是封閉帝國的「崛起」有其限度。毛澤東「全面專政」的意識形態長城不但窒息了政治、思想、文化的生機，而且阻塞了資本、資訊、資源、貨品、人員的流通，導致經濟從停滯到「崩潰邊緣」。於是有了鄧小平改革。

鄧小平對毛澤東，既有繼承，又有變革。繼承的是毛澤東在政治、思想、文化領域的封閉，就是他自己概括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那完全是從毛澤東那裡來的，不但「完

整、準確」，甚至比毛澤東還毛澤東，他把毛澤東帝國的「四大」，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從憲法中勾消。變革的是對西方自由國家資本、資訊、資源、貨品、人員的開放。

鄧小平的「兩手硬」戰略

鄧小平的這「兩手硬」戰略，並不是一開始就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是解放思想和民主改革；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中央工作會議上的爭論，是實踐派、民主派對凡是派、專政派之爭，是全開放對全封閉之爭。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鄧小平讓胡喬木替他起草了一篇發言稿。胡喬木在稿子中寫了「要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無論如何不能忘記社會主義社會還有階級鬥爭，黨內還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寫了「我們務必要使階級敵人的一切活動，在開始出現的時候就加以消滅」等等。這是堅持毛澤東帝國全封閉路線的凡是派、專政派的典型語言。

鄧小平把胡喬木的稿子拿給胡耀邦，說：「這個不能用，喬木的思路不行了，你給我找人寫。」那時鄧小平的思路，是拒絕胡喬木代表的凡是派、專政派，而傾向胡耀邦代表的實踐派、民主派的。鄧小平廢棄了胡喬木的稿子，在胡耀邦幫助下組成臨時起草班子，按照鄧小平當時的思路，完成了那篇後來被稱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主題報告」的講

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講話中突出了「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鄧小平說：「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

那時鄧小平還明確支持「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西單民主牆。他說：「群眾貼大字報是正常現象，是我國形勢穩定的一種表現。我們沒有權利否定或批判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群眾有氣要讓他們出氣。」

可以說，那時的鄧小平，是和胡耀邦一起站在實踐派、民主派的立場上，拒絕了反民主的凡是派、專政派。鄧小平在聽取胡耀邦匯報理論工作務虛會討論情況時，還講過更鮮明的民主言論。他說：

「十月革命後六十多年，民主沒有搞好。今年上半年要寫出一篇二、三萬字的大文章，五四發表，從世界歷史發展與人類社會的趨勢，講清楚民主的發生和發展。資產階級以民主起家，反對封建專制。它搞民主超過歷史上存在過的一切剝削階級。無產階級民主應當是民主發展的更高階段，要超過資產階級民主；資產階級民主的好東西要大大發揚。過去無產階級沒有搞好，斯大林犯錯誤，我們也犯錯誤。

我們要人民當家作主。怎樣使人民感覺到自己

是主人？資產階級有一套使自己成為主人的東西，選舉、立法可以支配政府。我們需要想辦法使人民感覺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

那一天是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兩天後鄧小平到了美國，回來後發動了一場「懲罰越南」戰爭，西單民主牆出現魏京生警告「防止新獨裁者」的大字報。短短兩個月中，鄧小平的「看法和注意力」從傾向民主派、拒絕專政派轉向拒絕民主派、傾向專政派，於三月三十日發表了胡喬木為他起草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把他兩個月前設想的「民主大文章」拋到了九霄雲外。鄧小平說：

「我們必須看到，在社會主義社會，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敵特分子，有各種破壞社會主義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壞分子，仍然是一種特殊形式的階級鬥爭，或者說是歷史上階級鬥爭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遺留。對於這一切反社會主義分子仍然必須實行專政。這種專政是國內鬥爭，有些同時也是國際鬥爭，兩者實際上是不可分的。因此，在階級鬥爭存在的條件下，在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存在的條件下，不可能設想國家的專政職能的消亡。事實上，沒有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就不可能保衛從而也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

鄧小平的兩種「思路」

這不是轉回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時被鄧小平廢棄的那篇胡喬木草稿的「思路」了嗎？三個月前

鄧小平說「喬木的思路不行了」，三個月後卻成了鄧小平自己的「思路」。

同一個鄧小平，兩種「思路」，三次講話。究竟何者為真？何者是假？

我看都是真的。這就是鄧小平自己講的「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和一九七九年一月，鄧小平的「注意力」在改變毛澤東帝國留下來的「思想僵化，迷信盛行」、「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的狀況，所以「看法」傾向胡耀邦代表的民主派「思路」。到了一九七九年三月，鄧小平的「注意力」轉向胡喬木、鄧力群們向他報告的「社會上那股懷疑社會主義、懷疑無產階級專政、懷疑黨的領導、懷疑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思潮；黨內也有人不承認這種思潮的危險，甚至加以某種程度支持」的傾向，所以「看法」也就轉向胡喬木代表的專政派「思路」了。

此後六、七年，鄧小平的「看法和注意力」在民主派和專政派之間，轉過來、倒過去，時而主張「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從制度上保證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時而主張「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能搬用資產階級民主，不能搞三權分立那一套」，「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

一九八七年一月胡耀邦下台，標誌鄧小平與黨內民主派的最後決裂；也是鄧小平帝國「反自由化」大戰略的最後確立。之前在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那場「大辯論」，專政派在鄧小平支持下擊敗民主派。然後鄧小平和專政派利用一九八六年底的學生運動逼迫胡耀邦提出辭呈。那次事件，可以看做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悲劇的小型排練。當時學生運動雖因胡耀邦處置得當和平落幕，但仍使胡耀邦和黨內民主派遭到清算。鄧小平當時的講話已經殺氣騰騰，揚言「不怕流血」，「天安門廣場來一個抓一個」！

鄧小平和鄧力群的對話

但事後專政派的奪權目標沒有實現。因為鄧小平確立的「反自由化」大戰略是「兩手硬」。鄧小平認為專政派只有專政一手，沒有開放一手，所以不能用專政派推薦的「左王」鄧力群取代胡耀邦。早在導致胡耀邦下台的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那場「大辯論」前十天，一九八六年九月十八日上午十時，鄧小平和鄧力群之間有一場有趣對話：

鄧小平：新的稿子（指胡耀邦主持起草的《精神文明決議》草案）發下來了，你看了沒有？

鄧力群：看了三遍，有四條意見。……

鄧小平：你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你這次對決議草案提意見的方式不好（指鄧力群把他

和胡喬木的意見送給陳雲等人）。你和胡喬木不要擴大我和陳雲同志之間的分歧和矛盾。

鄧力群：你們兩位之間有不同意見，我看出來了。陳雲的主張，我宣傳過；你的主張，我宣傳過。宣傳你的主張比宣傳陳雲的主張多得多。

鄧小平：明天開會，你就講一句話，完全贊成這個稿子。

鄧力群：我不講。

鄧小平：你不講，別人會講。

鄧力群在《十二個春秋》自述中說：鄧小平與我談話時，當著面是說：你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但與王震他們談話時是說：「要把我們往『左』的方面拉。」

這表明鄧小平在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之前，還是想支持胡耀邦反對鄧力群的「左」。等到全會上發生那場他意料之外的大辯論，看到除了陸定一、萬里之外，楊尚昆、余秋裡、王震、薄一波、陳雲、李先念、宋任窮、彭真等所有老人，都站到專政派一邊，鄧小平也就從反鄧力群的「左」轉向反胡耀邦的右了。

但鄧小平帝國的反自由化戰略，與專政派陳雲、李先念、王震、鄧力群、胡喬木們不同。鄧小

平反自由化，主要在政治、思想、文化領域反，不能擴大到經濟領域，影響他另一手開放。而專政派一直想把「反自由化」擴大到經濟領域。鄧力群主張：「自由化思潮氾濫，第一段是思想領域自由化氾濫，第二段是自由化侵入經濟領域，第三段是形成代表資產階級的政治勢力。」

鄧小平帝國的總綱領

第一段指胡耀邦，第二、三段指趙紫陽。鄧力群稱趙紫陽是「資產階級政治勢力的代理人」。他說：「有一次李先念問陳雲，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講黨內有個走資派，犯了錯誤；但是從這幾年看，趙紫陽像不像一個走資派呢？陳雲說，什麼像不像，他就是走資派，他的思想，他的生活，他的政見，證明他是地地道道的走資派。」

由此可見，專政派要推翻趙紫陽，讓堅持毛澤東全面專政的鄧力群取而代之，是既定方針；有沒有胡耀邦去世後的學生民主運動，都無可避免。

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之後，挑選誰來做鄧小平帝國的繼承人成了問題。鄧小平一度屬意李瑞環，拒絕了專政派的首選鄧力群。最後達成妥協，鄧小平認可了陳雲、李先念共同推薦的江澤民。

江澤民執政之初，意識形態領域聽鄧力群、胡喬木指揮，提出「以反和平演變為中心」；經濟領域聽陳雲、姚依林指揮，回歸「鳥籠經濟」。結果

是兩年經濟大滑坡。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警告「誰不改革誰下台」，直指江澤民。江澤民慌忙拜託鄧小平牌友丁關根求情，表示完全接受鄧小平批評，同鄧力群、陳云「保持距離」。

鄧小平南巡講話：「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這是鄧小平帝國的總綱領。

鄧小平說：「十二屆六中全會我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要搞二十年，現在看起來還不止二十年。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把希望寄托在我們以後幾代人身上。我們這些老一輩人在，有份量，敵對勢力知道變不了。但我們這些老人嗚呼哀哉了，誰來保險？我出來後就注意找第三代，兩個人都失敗了，不是經濟上出問題，都是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上栽跟頭，這就不能讓了。」

那時胡耀邦已去世，趙紫陽遭軟禁，黨內民主派已徹底清除。鄧小平還放不下心，立此政治遺囑，警告鄧小平帝國的繼承人：「經濟上出問題」可以「讓」，「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上栽跟頭」的胡耀邦、趙紫陽，絕不可「讓」。

這就叫「警惕右」。有人還幻想今年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三十週年將「平反」胡耀邦和趙紫陽，該重讀一遍鄧小平這段話。

「防止『左』」呢？鄧小平說，「有些理論

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些就是『左』。」

指的是鄧力群、胡喬木們，實際上也包括陳雲、李鵬、姚依林和江澤民前期。但是不要緊，「經濟上出問題」，可以「讓」。還是「左」比右好。

鄧小平曾批評毛澤東，「一個領導人，自己選擇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種封建主義的做法。」鄧比毛更甚。毛選過劉少奇、林彪，選了又廢，最後選上華國鋒也未站住。鄧選過胡耀邦、趙紫陽，也是選了又廢。但最後一著比毛高明，他不但選定自己的接班人江澤民，還選定接班人的接班人胡錦濤。兩個都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上經過考驗：一個在上海查禁《世界經濟導報》，一個在西藏鎮壓藏民請願，均威震國際。鄧小平為防備江澤民「經濟上出問題」，還指名「懂經濟」的朱鎔基輔佐江。

所以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後，鄧小平不需要再「出頭」。他的帝國，從政治綱領到組織架構均已完整確立，足以抵擋「國際大氣候」—全球民主化浪潮的衝擊了。

二○○八年三月十七日

《爭鳴》第366期 2008年4月號

鄧小平帝國三十年（２）

胡耀邦與專政派的根本分歧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到一九八六年九月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是民主派與專政派勝負未決的鄧小平帝國過渡階段。

民主派的主要代表是胡耀邦。粉碎「四人幫」後，胡耀邦復出工作，是一九七七年三月，出任中央黨校副校長；比鄧小平復出工作早四個月。

先是華國鋒找胡耀邦出來工作。胡耀邦說自己是「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對象之一，不停止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難以工作。「華國鋒試圖說服胡耀邦，說「你先出來工作，問題總要解決，急不得」。胡耀邦未被說動。

華國鋒找葉劍英勸胡耀邦。葉對胡說:「你還是出來工作好，也是幫助我啊!讓你當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華國鋒兼校長是掛名），憑你的智慧和才幹，是可以搞出點名堂來的。」胡答應了。

胡耀邦一出手就抓住關鍵

胡耀邦一到中央黨校，就選擇了改變中國歷史命運的兩個「突破口」。

一個是打破思想枷鎖。胡耀邦認為，不打破兩個「凡是」，不把被顛倒的思想是非、理論是非、路線是非再顛倒過來，全國人民的精神得不到解放，中國的命運就無從改變起。

一個是打破組織枷鎖。胡耀邦認為，不平反冤假錯案，不把被顛倒的幹部路線糾正過來，牽涉一億人的親人還在冤獄之中，靠什麼力量改變中國命運？

胡耀邦於一九七七年五月佈置中央黨校三位教師研究、撰寫《把被顛倒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一九七七年十月七日在《人民日報》發表）；一九七七年七月創辦《理論動態》，就是進攻這兩個突破口的戰略部署。

那時尚未恢復工作的鄧小平，也對兩個「凡是」提出批評。一九七七年四月，華國鋒派汪東興和李鑫找鄧小平談話，要鄧小平承認兩個「凡是」，承認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但與鄧無關；以便「創造條件結束批鄧」、讓鄧小平出來工作。

鄧小平說:「兩個〔凡是〕不行。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問題，也說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鄧小平認為:「毛澤東思想是個思想體系。我們高舉旗幟，是要學習和運用這個思想體系，以準確的、

完整的毛澤東思想指導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鄧小平反對兩個「凡是」，是反對以毛澤東的「片言隻語」、「割裂、歪曲、損害毛澤東思想」。

三支思想部隊

於是在「打破思想枷鎖」這一戰場，有三支思想部隊。

一支是「凡是」派，即主張「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主要代表是華國鋒、汪東興、李鑫、吳冷西、熊復、胡繩、張平化、鄭必堅等。當時佔統治地位，實力最強。

一支是「準確、完整」派，由鄧小平個人提出，胡喬木、鄧力群、王震等支持；後來「凡是」派被「實踐」派打敗，大部分「凡是」派轉而依附「準確、完整」派，聯手攻擊「實踐」派。

一支是實踐派，主張「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踐派認為，兩個「凡是」是維護毛澤東的舊權威，不准改變過去的錯誤的東西。鄧小平的「準確、完整」，是樹立新權威，即由新的領袖或理論權威來判決可以改變過去哪些不「準確」、不「完整」的東西，這不過是打開舊枷鎖套上新枷鎖而已。實踐派不依附一切舊的和新的個人權威，把真理交給社會的、科學的實踐來檢驗，從而徹底否定了教條主義和理論專制主義。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發表後，「凡是」派與「準確、完整」派都來壓制。「凡是」派公開攻擊「文章犯了方向錯誤，理論上是荒謬的，思想上是反動的，政治上是要砍倒毛澤東思想這面旗」！「準確完整」派的「第一枝筆」胡喬木打上門來，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日到胡耀邦家中說：「爭論是你在黨校挑起的，爭論下去將造成黨的分裂，要立即停止，不准《理論動態》再登可能引起爭論的文章！」

但真理的聲音已傳遍全國，誰也壓不下去。就在胡喬木威脅「爭論下去將造成黨的分裂」後四天（六月二十四日），《解放軍報》在羅瑞卿大將支持下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給胡喬木當頭一棒。接著周揚在七月二十四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討論會講演中指出：

「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我看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

周揚的講演，在全國產生重大影響；被視為對這場爭論的定論。

針對兩個「凡是」提出兩個「不管」

在另一個「突破口」打破組織枷鎖方面，胡耀邦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兼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後，

立即對平反全國?假錯案採取行動。他針對兩個「凡是」，提出兩個「不管」：

「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搞的，不管哪一級、什麼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改正過來。」

當時有人問：「毛主席批的怎麼辦？」胡耀邦答：「照樣平反！」

一些毛澤東親批的要案、大案，胡耀邦都組織專人複查。不但毛澤東搞錯了的要平反，華國鋒、鄧小平搞錯了的也要平反。涉及幾十萬知識分子命運的反右派案，當時直接主持者是鄧小平和彭真，平反阻力極大。在鄧小平、彭真領導下打了大批右派的蔣南翔等人，竭力阻止為自己打的右派平反；胡耀邦力排眾議，為絕大多數右派都平了反。只因鄧小平堅持「反右派鬥爭有必要，錯在擴大化，」最後不得不象徵性地留下幾個「頭面人物」。這個保留至今帶來後患。

三中全會─實踐派全勝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可以說是實踐派對「凡是」派和「準確、完整」派聯盟的一次勝利。

三中全會的議程本來很簡單:一是討論農業問題，二是通過一九七九、一九八○年國民經濟計劃。鄧小平建議全會前開工作會議，用兩、三天時間討論

一下「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問題。鄧小平讓胡喬木起草的講話稿，是把「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完整準確」地納入「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毛澤東思想體系」。胡喬木寫道：

「全黨全軍經過這兩年對林彪、四人幫的揭批查鬥爭，從組織上整頓了各級領導班子，從思想上清理了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歪曲篡改，恢復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全黨全軍全國各民族的安定團結現在已經有了鞏固的基礎，完全有可能實行工作著重點的轉移。只有這樣做才叫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才叫完整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體系。」

然而工作會議的進程出乎鄧小平、胡喬木們的預料。胡耀邦選擇的兩個「突破口」，平反冤假錯案和真理標準之爭，在分組討論中欲罷不能。各組還議論開了西單民主牆提出的許多歷史是非問題。諸如：天安門事件，彭德懷和廬山會議，陶鑄和中央宣傳部問題，右派是摘帽還是徹底平反問題，劉少奇問題等等。

「凡是」派在會上發動攻擊周揚在真理標準討論中的講演。胡繩說：「有的同志在公開講演中宣佈黨內這種分歧不僅是思想問題，而且是政治問題、路線問題，是關乎國家前途命運的問題。雖然其用語不過是八股老調，但在國內、國際引起人們對安定團結局面的疑慮，其影響是不好的。」

胡繩的挑戰在會上重新燃起戰火，結果以「凡是」派失敗告終。工作會議從十一月十日開始，胡喬木的稿子是十一月十九日完成給鄧小平的。會議開到了十一月三十日，鄧小平發覺不對了，才廢棄胡喬木的稿子，要胡耀邦找人重寫。

中共官方文獻把鄧小平那篇講話定為「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實在是一大諷刺。那篇講話，不如說是在當時會外西單民主牆「大氣候」和會內各小組討論「小氣候」逼迫下的急就章，是在胡耀邦選擇的兩個「突破口」突破之後的必然產物。講話肯定真理標準討論的語言，是照錄被胡喬木指責為「分裂黨」的周揚在社科院講演。這不但是對「凡是」派的否定，也是「準確、完整」派的自我否定。

華國鋒在會議結束時的講話，肯定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對兩個「凡是」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華國鋒說：「由於會議時間有限，這方面的問題不可能花很多時間來解決。中央政治局意見按照葉帥（葉劍英）提議，在三中全會後專門召開一次理論務虛會，進一步把這個問題解決好。」

理論務虛會的鬥爭

於是「打破思想枷鎖」的戰場，就轉移到理論務虛會。

當胡耀邦籌備理論務虛會的時候，胡喬木開始精心策劃一場新的「反右」鬥爭。他到處講話和游說，鼓吹當時出現了所謂「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否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基本觀點」的「三股風」，「形勢比一九五七年右派進攻時更嚴重」！

胡喬木的第一個游說對象是華國鋒（一九七九年一月二日），碰了釘子。華國鋒說：「無論如何不要反右派」！第二天（一月三日）又到中宣部游說。胡喬木說：「三中全會不可避免引起對毛主席全盤否定，連帶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趨勢都出來了。」胡耀邦批評他對形勢看法錯誤，不能說有「三股風」。胡喬木還攻擊《人民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人民萬歲》「只歌頌人民，不歌頌領導，是企圖建立一個民主黨來改造共產黨。」

在組織上，胡喬木收編了汪東興手下的「理論組」，使「凡是」派舊教條主義力量和「準確完整」派新教條主義力量合流，遏阻三中全會後全國蓬勃興起的自由民主潮流。

胡喬木終於在三個月後說動鄧小平，為鄧小平寫出那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在「三股風」之外，加上一股「否定無產階級專政」風，以「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來反對「自由化」。胡喬木後來把他這一勝利，得意地稱之

為「三中全會後的分道揚鑣」。

胡喬木、鄧力群、吳冷西們的專政派（包括「凡是」派和「準確、完整」派），早在那時已蓄意除掉胡耀邦、周揚、胡績偉們代表的自由民主力量，而胡耀邦還毫不在意。

胡耀邦在十一屆三中全會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擔任黨中央秘書長，同時兼任中央黨校、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職務。解放思想和平反?假錯案兩個「突破口」，仍在他領導之下；但愈是深入進行下去，遇到的阻力愈大。胡耀邦感慨地說：「禁錮我們這個民族創造力的，一個是精神枷鎖，各色各樣的教條主義；一個是組織枷鎖，各種錯誤的組織結論，壓得抬不起頭，無法發揮各自的聰明才智。這樣一個精神上、組織上被禁錮、被壓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麼可能與世界上的發達國家進行自由競爭？」

胡耀邦注意力轉向經濟

三中全會後，胡耀邦的注意力轉向經濟方面。胡耀邦說，他做過軍隊工作、組織工作、宣傳工作，現在想專心研究一點經濟問題，從縣一級研究起。中國幅員廣闊，經濟條件千差萬別，解剖一個麻雀，樹立一個典型，像大慶、大寨，全國都來照搬的那個辦法，搞現代化建設看來不行。他要走遍全國省、市、自治區兩千多個縣級單位，進行比較研究，思考國家的發展戰略。

胡耀邦提出進行「三場大討論」的構想：

第一場真理標準討論，思想路線沒有解決。否定了兩個「凡是」，還會有新的「凡是」；破除了舊的個人迷信，還會有新的個人迷信。

第二場生產目的討論，國家的發展戰略，究竟是為生產而生產，為完成國家計劃指標而生產，還是為滿足全國人民的需要？

第三場是人的解放。胡耀邦珍視自由、民主、人道價值，期待中國人民掙脫專制枷鎖，解放成為人。他喜歡引用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那句話：「思想的閃電一旦真正射入這塊沒有觸動過的人民園地，德國人就會解放成為人。」胡耀邦說：「這篇東西是馬克思早期寫的著作，因為當時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德國還是個封建社會，還是農奴制，農民還是奴隸，我們不要把自己降成一個奴隸。」

圍繞生產目的討論的鬥爭

胡耀邦發動生產目的討論，是一九七九年九月。他批了《人民日報情況匯編》一篇文章《斯大林對雅羅申柯為生產而生產觀點的批判》，要《理論動態》結合經濟戰線的思想實際，寫出一篇關於生產目的的文章開展討論。這篇題為《要真正弄清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的文章(一九七九年九月三十

日)發表後，全國有二十個省市自治區的報紙發表文章和座談參與討論，反應熱烈。胡耀邦在十月九日全國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上，再次提出發展速度和生產目的問題。他說：

「與速度直接關聯的是平衡問題。有人對過去幾次比例失調留下太深印象，總怕財政收支、產銷、物資供應的平衡不能保持，主張放慢速度。我們不要用靜止的、凝固的、機械論的觀點來看平衡，只要認真改進死板的財政信貸管理、物資管理等辦法，事情大有可為，要大膽吸收外資，來增加我們的建設資金，不要因為經驗不足吃了一點虧而因噎廢食。」

胡耀邦談到生產目的時引用了斯大林對雅羅申柯的批評:「雅羅申柯同志忘記了，人們不是為生產而生產，而是為滿足自己的需要而生產。他忘記了，跟滿足社會需要脫節的生產是會衰退和滅亡的。」胡耀邦說:「我們黨內相當多人沒有弄清生產目的，把手段當成目的了；為生產而生產，使得我們現在的經濟結構很不合理，是畸形發展的，同社會需要和人民生活需要長期脫節，缺乏活力。」

這場討論對胡耀邦來說，是為國家更好更快發展，並沒有想到觸怒了陳雲為首的計劃經濟官僚集團。胡喬木再次得意洋洋到胡耀邦家中制止生產目的討論，被胡耀邦拒絕。胡耀邦說：「上回喬木來阻止真理標準討論，我有點退卻之意，這一回我告訴他：我毫無退卻之意！」

然而胡耀邦沒有料到，這回從陳雲來的壓力，比上回從華國鋒來的壓力，強大何止百倍。何況上回在關鍵時刻支持胡耀邦的羅瑞卿大將已去世；上回實踐派主角之一、掌控《理論動態》的吳江，這回卻責怪「胡耀邦不懂經濟」！？後來吳江還給胡耀邦寫信，引用《宋史．傅堯俞傳》稱讚堯俞為人「厚重言寡，遇人不設城府，人自不敢欺」；批評胡耀邦「過去說自己在經濟上是打麻雀戰，現在地位變了，麻雀戰的方法怕也得變一變；這方面言寡恐怕要比言多適當一些。」

吳江根本不懂，胡耀邦在經濟領域，早已不是打麻雀戰。他雖然被迫暫時停止生產目的討論（胡喬木自己阻止不成，又搬出余秋里、陳雲，最後把鄧小平也搬出來），但他思考國家經濟發展重大戰略的決心與信心始終不變。他著重研究了國家未來二十年發展的速度問題、生產與消費的互動關係、發展對外經濟關係三大領域，都提出了自己的獨立主張。

現在人們較多看到的是胡耀邦與專政派在政治領域的根本分歧，而較少注意到胡耀邦與專政派在經濟領域的根本分歧。長期以來流傳著一種虛假觀念，類似吳江那樣認為胡耀邦「不懂經濟」，只有陳雲和姚依林他們才「懂經濟」。他們分辨不出胡耀邦研究的是現代市場經濟；陳雲姚依林們「懂」的是教條計劃經濟，對現代市場經濟一竅不通。

在歷史上，胡耀邦同鄧小平的分歧主要在政治領域；而同陳雲的分歧主要在經濟領域。鄧小平帝國三十年的實踐已經證明，不但政治戰場上站在歷史正確一方的是胡耀邦；經濟戰場上站在歷史正確一方的也是胡耀邦。

下面簡要談談胡耀邦在發展速度、生產與消費、對外經濟關係三大領域同專政派的主要分歧。

二○○八年四月十七日

《爭鳴》第367期 2008年5月號

鄧小平帝國三十年（３）

一九八○年八月二十六日，胡耀邦與趙紫陽、姚依林、房維中到武漢向鄧小平匯報經濟發展計劃。當時擔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的趙紫陽主張六五計劃增長速度百分之四點五。

鄧小平問：按此速度，二十年能否翻兩番？（三人不答）

胡耀邦說：二十年翻兩番，每年平均遞增應為百分之七點二。

鄧又問：五十年翻兩番呢？

胡：每年平均遞增百分之二點五。

鄧：那太少了。

胡：經過努力，力爭百分之七不是不可能的。

姚依林：明年只能保四爭五。

胡：如果現在只是保四爭五，二十年翻兩番就是一句空話，我們會把麻煩留給後代，後面的人怎麼工作？

爭論的第一次爆發

「二十年翻兩番」的戰略目標，是胡耀邦在一九八○年初向鄧小平建議的。胡耀邦說：「我們的現代化建設，要有個戰略目標。湖北省委書記陳丕顯提出湖北工農業二十年翻兩番的目標，我們能不能設想從一九八一年到本世紀末的二十年，把我國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人均達到八百美元的小康水平。」

鄧小平當時表示肯定。但在遇到分歧意見時卻不表示明確態度，因為他知道主張「低速度」、「捨發展」的真正後台是陳雲。這場爭論的第一次爆發，是一九八○年十二月十六日至二十五日的中央工作會議。

陳雲集團為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作了精心策劃。

第一，利用波蘭團結工會事件的「國際大氣候」，在政治和經濟兩條戰線全面進攻。

波蘭團結工會事件發生於一九八○年七月。當時胡耀邦認為：「波蘭事件的教訓是必須堅持徹底改革的方針路線，波蘭每一次改革一遇困難和阻力就退回老路，不敢得罪蘇聯，不敢觸動斯大林模式的根本制度，才遭致危機。」鄧小平開始與胡耀邦看法一致，在八月十八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指出歷史上所以犯重大錯誤的根源是政治制度問題，「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面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如果不堅決改革制度，過去出現的嚴重問題今後有可能重新出現。」

然而正當舉國上下熱烈討論制度改革之時，胡喬木於九月二十四日寫了一封《關於波蘭危機》的信，提出中國也可能「爆發」像波蘭發生的那種局勢，「必須像毛澤東在一九五六年發生波匈事件時那樣制定對策。」

這封信先發給胡耀邦。胡耀邦說：「中國不可能發生波蘭事件。第一，我們從來獨立自主，不屈從任何霸權；第二，三中全會以來改革路線得到人民擁護。」

胡喬木在胡耀邦這裡碰了釘子，就去找陳雲。十月九日，中央宣傳部傳達陳雲意見：「經濟搞不好要翻船，宣傳工作搞不好也要翻船。一個宣傳方

面，一個經濟方面，這兩個方面不注意，中國也會發生波蘭那樣的事件。」宣傳部長王任重說：「根據喬木同志建議討論波蘭事件教訓，我們存在與波蘭類似的問題，發展下去也會造成同樣後果。小平同志講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不要再宣傳。」

第二，製造對陳雲的個人迷信。

一九八○年十一月，鄧力群在中央黨校一連作了四次總題目為《學習陳雲同志的經濟思想》的演講。鄧力群提出：歷史上第一個掌握了我國民主革命階段客觀規律的是毛澤東，第一個掌握了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階段客觀規律的是陳雲」。他說：「經濟工作一遇到困難，毛主席就把他請來；困難一過去，又讓他靠邊站。」

鄧力群還佈置中央黨校全體學員學習他編印的《陳雲同志文稿選編（一九五六—一九六二）》，並宣佈書記處研究室將編輯出版三卷本《陳雲文集》供全國學習陳雲經濟思想。

鄧力群雖然提出中國歷史兩階段分別掌握客觀規律的是毛澤東和陳雲，但還不敢公然提「陳雲思想」，只提「陳雲經濟思想」。經中央黨校學員輾轉傳播，傳到鄧小平耳中已是「陳雲思想」。鄧小平還托姚依林轉告鄧力群：「鄧力群在黨校講課，說要學習陳雲思想，這不對嘛，學習仍應是毛澤東思想嘛，叫他以後再不要這樣提了」。

第三，在一九八○年十一月批評華國鋒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陳雲集團把重心轉向經濟工作中的「高指標」、「高速度」和「洋躍進」。

所謂「洋躍進」，就是為了解決全國人民穿衣和出口服裝問題，從國外進口了十三套製造化學纖維的成套設備。這是當時中央討論通過的，葉劍英、鄧小平、胡耀邦都同意了的。

對此胡耀邦在十一月十九日發言中曾替華國鋒緩頰。胡耀邦說：「對於高指標、洋躍進，華國鋒負有一定責任。但確定指標，進口設備，是當時中央討論過的，中央也有責任，不能把責任都算在華國鋒身上。」

第四，在中央工作會議之前的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會議上，迫使鄧小平同意陳雲壓低計劃指標。

陳雲在會上說，「明年計劃要進一步退下來，有人說這樣耽誤了時間。從鴉片戰爭以來耽誤了多少時間，再耽誤三年有什麼了不得？」鄧小平表示：「同意陳雲意見，退得不夠再退。速度百分之五保不住，百分之四也行。」

同時召開的全國計劃工作會議根據陳雲、鄧小平的講話，一九八一年基本建設投資由原來的五百五十億元減為三百億元，比上年減少百分之四十。

工農業總產值增長指標降低到百分之三點七。

一九八○年十二月中央工作會議，是胡耀邦為代表的改革力量在經濟、政治戰線的全面敗退。

陳雲在會上第一個發言，題為《經濟形勢與經驗教訓》，主張「採取緊縮措施，遏制經濟過熱」，強調「退夠」。陳雲說，「有些議論說這樣會耽誤三幾年，不怕。」陳雲發言中讚賞地引用了一位年輕人翁永曦給他的信中提出的「抑需求，穩物價；捨發展，求安定；緩改革，重調整；大集中，小分散」，作為經濟工作的「二十四字綱領」。

趙紫陽、李先念接著講話表示完全同意陳雲意見。趙紫陽指出：「當前的潛在危險，可能爆發經濟危機。」

鄧小平同意陳雲反自由化

鄧小平在會議最後一天（十二月二十五日）講話，題為《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鄧小平說：

「我完全同意陳雲同志的講話，這個講話正確總結了我國三十一年來經濟工作的經驗教訓，是今後長期的指導方針。我也完全同意陳雲同志和紫陽同志的意見，重點是要抓調整，改革要服從調整，有利於調整，不能妨礙調整。

陳雲同志說，經濟工作好不好，宣傳工作好不好，關係很大。我們的宣傳工作對一些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錯誤思想，沒有進行有力的鬥爭。要批判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必須加強人民民主專政，禁止非法組織活動和非法?物的?行。」

鄧力群在他的《自述．十二個春秋》裡，頗為得意地回顧了他當年如何幫鄧小平弄的這篇講話。鄧力群說：

「一篇特別值得提出的重要講話稿，就是小平同志在一九八○年十二月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這個講話是小平同志要我幫他準備的，最後也經過喬木修改。喬木修改得最多的、最重要的是思想工作。這個講話，是鄧小平、陳雲合作最明顯、最確定的一個標誌。鄧對陳提出的方針給予全力支持。」

這個講話不但在經濟領域採納了陳雲「捨發展，緩改革」綱領，而且在政治思想文化領域突出「反自由化」和「加強專政」。這是鄧力群、胡喬木針對改革派的主張有意安下的釘子。在此之前，胡耀邦、周揚等主張對民間團體、民辦?物採取立法手段登記管理。經書記處討論，決定制定《結社法》、《新聞出版法》等，這完全符合「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方針。鄧力群、胡喬木向陳雲告狀，陳雲說：「無論如何不能立法讓他們登記，我們過去就是鑽國民黨《出版法》的空子，今天不能讓他們鑽；必須讓他們處於非法地位

予以禁止。」鄧力群、胡喬木在講話中先安下釘子，接著就進一步於一九八一年初起草了《關於處理非法?物與非法組織和有關問題的指示》，以專政手段取締一切民間團體和民辦?物。

胡耀邦在十二月中央工作會議那種氣氛之下，只能暫時沉默以對。

胡耀邦與陳雲的第二大分歧

胡耀邦與陳雲集團在經濟領域的第二個重大分歧是消費與積累的關係問題。胡耀邦認為：

「過份地刺激消費或提倡高消費是不對的，我們不提高消費的口號；但是要適當地注意刺激人民的消費，引導人民正確地消費，使生產出來的消費品有銷路。這不是說要吃光用光，不是說不要艱苦奮鬥精神了；但是過份地採取節衣縮食的辦法來儲蓄，對於促進生產的發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否合適？值得研究。現在商業庫存有一千一百億元商品壓在那裡，商業部門有沒有惜售的思想？今後我們每年增加二百二十億元消費品是完全可能的。我們要多設商業網點，鼓勵商業人員下鄉，有些商品在城裡賣不掉，在鄉村買不到。」

胡耀邦當然知道他的經濟觀與陳雲的「抑需求，捨發展，緩改革」綱領不相容，必須求助於馬克思。他引用馬克思的話：

「沒有生產，消費就沒有對象。但消費也媒介著生產，因為正是消費替生產創造了主體，產品對這個主體才是產品。產品在消費中才得到最後完成。一條鐵路，如果沒有通車、不被磨損、不被消費，它只是可能性的鐵路，不是現實的鐵路。沒有生產，就沒有消費。但是，沒有消費，也沒有生產；因為如果這樣，生產就沒有目的。」

馬克思又說：

「消費從兩個方面生產著生產：(一)因為只是在消費中產品才成為現實的產品，消費是在把產品消滅的時候才使產品最後完成；(二)因為消費創造出新的生產的需要，消費創造出生產的動力；消費在觀念上提出生產的對象，作為內心的意象、作為需要、作為動力和目的。沒有需要，就沒有生產，而消費則把需要再生產出來」。

胡耀邦在與國家計委、經委、商業部、財政部負責人和經濟學家的座談會上提出他的經濟工作新方向。他說：「學習馬克思這些話，我們做經濟工作不要只從壓縮消費方面打主意，而要多從發展生產來滿足消費方面想辦法，這是一個根本方針。」胡耀邦說：

「當代世界無非三種模式：一種是蘇聯、東歐的高積累，壓縮群眾的消費，生產不是為了滿足人民的需要；第二種是資本主義高度競爭，追逐高額利潤；我們應以人民不斷增長的需要來推動生產的

發展，不是先有第一部類後有第二部類，而是第二部類反過來促進第一部類的增長，人民需要的增長總是走在前頭的。這個問題提請大家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分析我們幾十年的實踐，使我們的經濟工作走出一條新的道路。」

這充分說明胡耀邦當初提出生產目的討論，就是要走出區別於為生產而生產或為追逐高額利潤而生產之外的一條新路。生產目的討論被壓制之後，胡耀邦在發展速度、消費與積累關係、對外經濟關係、特區建設、農村建設等領域繼續調查研究，都是為了探索這條新路。

現在人們往往只看到胡耀邦在真理標準討論、平反冤假錯案等思想政治、組織領域的貢獻，而忽視胡耀邦在經濟領域的重大貢獻。長期以來人們已形成一種偏見，似乎「胡耀邦不懂經濟」，「懂經濟的是陳雲」。這是歷史的顛倒。

陳雲是懂一點經濟，但懂的是「抑需求，捨發展」的舊經濟，同現代經濟格格不入。陳雲是一個半斯大林主義半經驗主義者。他學斯大林主義經濟也只學到「有計劃按比例」那一半，還有一半是中國封建傳統的封閉主義，「肥水不流外人田」。陳雲也做調查研究，也「蹲點」，但只蹲一點，只解剖一個麻雀，以為天下的鳥都是一樣的麻雀。鄧力群吹得天花亂墜的「陳雲經濟思想」，只要陳雲自己的一句話就可以概括：「鳥籠經濟思想」。陳雲思想體系就是半斯大林主義半經驗主義編成的那個

鳥籠。

胡探索現代經濟發展新路

胡耀邦雖然絕對沒有反對陳雲的言行，他是尊重陳雲的，但由於胡耀邦探索的是中國現代經濟發展的新路，所以生產目的、發展速度、消費與積累、對外經濟關係、特區建設等每一個領域，都無法避免同陳雲的「鳥籠經濟思想」發生衝突。

在對外經濟關係領域，胡耀邦跨出的第一步是選擇廣東、福建兩省率先對外開放，在深圳、珠海、澳門建立特區。

一九八○年九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胡耀邦主持中央書記處第五十二次會議，決定在廣東、福建兩省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胡耀邦說：「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目的是充分發揮廣東、福建兩省的優勢，先行一步富裕起來，成為全國四化建設的先驅和排頭兵，為全國探索道路、積累經濟、培養幹部。廣東、福建兩省要有遠大眼光，對外更加開放，面向全國，面向世界，盡快把經濟搞活，闖出一條道路，成為對外聯繫樞紐。」

對特區建設，鄧小平開頭是支持的。但在一九八○年十二月中央工作會議上又一度退縮。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講話中說：「在廣東、福建兩省設置幾個特區的決定，要繼續下去。但步驟和辦法要服從調整，步子可以走慢一點。」

鄧小平當時沒有弄清楚，特區建設靠引進國外資金、技術加快國內建設；國內有財政赤字需要調正放慢時，加快特區建設以更多利用外資投入彌補國內資金之不足，對全國經濟穩定發展有利無弊。胡耀邦看到了這一點，立刻批轉了中央黨校調查組在一九八○年十二月底的一份廣東深圳特區調查報告《特區建設速度應當加快》。當時在特區建設前線的福建省委第一書記項南說：

「澳門特區起步較晚，一九八○年十二月中央工作會議下達，福建省委內部保守力量借口會議要特區建設速度放慢，幾乎使?門特區建設停頓下來；有了胡耀邦批轉的這個報告，我又可以幹了。」

一九八一年四月，調查組到澳門同項南交換意見，寫了《福建澳門的特區建設問題》，提出澳門特區的發展戰略和特區建設的理論問題，主張澳門特區從當時二點一平方公里的湖里地區擴大到澳門島一百二十三平方公里全部領域，在全島實行類似新加坡與香港對外資的開放政策和優惠待遇，把澳門島建設成國際自由港，靠引進外資和現代先進技術、現代管理方式，形成國際性經濟、文化、社會交往高度發展的世界城市，帶動福建和全國經濟發展。

胡耀邦迅速批轉了這份調查報告及所附關於特區建設的理論文章。他在給當時主管特區建設工作的谷牧批示：「此文材料較豐富，觀點也可取，對

中央同志從理論、方向上思考問題很有幫助。請你要經管這方面工作的同志都能放大膽量把這項工作促上去。」

項南當時立即回應：「材料我一口氣讀完了。對於有各種各樣議論的特區，特別需要在理論和實踐上加以探討，加以試驗。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兩份材料比投資還重要得多。」

陳雲攻擊建設特區是賣國

正在主持特區工作會議的谷牧並無反應。他知道陳雲正在部署對特區建設興師問罪，胡喬木、鄧力群編纂了中國歷史上「租界」的材料，攻擊特區就是舊中國「租界」翻版，是「賣國」！還說：「中央領導同志（指陳雲）意見特區要取消！」鄧小平那時也不說話，坐觀陳雲集團對特區建設的攻擊。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陳雲在省、市委書記座談會上針對特區說：「除深圳、珠海、澳門部份地區（指二點一平方公里）試辦，不能增加；國家建設必須全國一盤棋，按計劃辦事。」他雖然沒有說出「取消特區」，但「全國一盤棋，按計劃辦事」的大帽子壓下來，廣東、福建的特殊政策和特區自主權被統統取消，還如何「試辦」下去？

胡耀邦沒有被壓倒。半個多月後，他跳出特區爭議，就他深思熟慮的對外經濟關係發展戰略發表

重要講話。在一九八二年一月十四日中央書記會議上，胡耀邦提出「利用兩種資源—國內資源和國外資源；打開兩個市場—國內市場和國外市場；學會兩套本領—組織國內建設的本領和對外經濟關係的本領」等十條綱領性意見，指明了對外經濟關係的戰略地位。

胡耀邦在講話中引用唐朝陸贄的話，批評了經濟工作中「吝少失多，溺近迷遠」，缺乏戰略眼光的短視傾向。

胡耀邦的戰略遠見來自他的務實態度和創新精神。他勤跑基層，注重實地調查，胸懷全球格局，善於戰略思考。所以他的主張，總是獲得有遠見卓識的第一線領導人（如項南、任仲夷、陳丕顯、雷宇等）的共鳴，互相支持；卻始終橫遭「吝少失多，溺近迷遠」，「抑需求，捨發展」，反改革的陳雲集團的打擊、阻撓、陷害，使國家的改革與發展蒙受巨大損害。

一九八二年後，陳雲集團對全國經濟，進一步強化「全國一盤棋，按計劃辦事」的嚴密控制。項南於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七日反映：「最近北京有關部門的指示、規定紛至沓來，照此辦理，不說特區，連特殊政策也實際上取消了；不說同耀邦同志的十條大相逕庭，同中央前兩年指示大為走樣，連三中全會以來稍稍取得的一點進展也給沖掉了。」

從生產目的、發展速度、消費與積累到特區建

設，陳雲集團同胡耀邦在對內、對外經濟發展問題上的根本分歧，是繼續改革開放，走出一條中國現代經濟發展的新路，還是退回半斯大林主義、半經驗主義老路的重大戰略分歧，也是導致一九八三年陳雲集團對胡耀邦第一次奪權未遂的主因。

二○○八年五月十五日

《爭鳴》第368期 2008年6月號

鄧小平帝國三十年（４）

書記處兩個鬼煽風點火

陳雲集團策劃第一次倒胡在一九八三年三月，爆發點是經濟議題。一九八二年GDP增長百分之八點七，超出計劃指標（百分之四）一倍以上。鄧小平自己也發現了問題。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二日，鄧小平找胡耀邦、萬里、姚依林、胡啟立、張勁夫、宋平等人談話。鄧小平說：

「總結歷史經驗，計劃定得過高，這方面的問題我們已經注意到了；現在要注意另外一個方面的問題，計劃定低了，實際增長速度高出很多，會產生什麼影響？對這個問題，要抓緊調查研究，作出符合實際的分析。總之，制定計劃，應該是積極的、留有餘地的、經過努力才能達到的。」

一月十七至十八日，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鄧小

平提出的計劃問題。胡耀邦說：「要加快能源、交通和某些薄弱環節建設，不從今年加點碼，二十年翻兩番可能落空。不搞高指標，但要經過積極努力，在講求經營效益條件下，爭取今年增長百分之七或更多，不要拿『保四爭五』來擋駕。情況變了，歷史前進了，我們的工作也要跟著前進。」

胡耀邦還提出「放開眼界看投資，把人、財、物的潛力挖出來。」他說：「我們有相當可觀的黃金和外匯儲備，放在銀行裡不生息，還要貼保險費；能不能拋一點，現在銀行錢很多，不會用也不是好事。」

中央書記處裡面有兩個鬼：一個鄧力群，一個胡喬木。他們反對胡耀邦，在會上不講，會後到陳雲那裡挑撥，說「胡耀邦的中心意思就是搞高速度，對『保四爭五』不滿意，要在第一個十年裡翻一番，是衝你陳雲來的。弄得鄧小平也有點坐不住了。」

緊接著，胡耀邦於一月二十日在全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講《四化建設和改革問題》，講了二十八條，中心是「全面改革」。胡耀邦說：「全面而系統地改，就是一切戰線，一切地區，一切部門，一切單位，都有改革的任務，都要破除陳舊的、妨礙我們前進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風，都要鑽研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總結新經驗，創立新章法，堅決而有秩序地改。改革就是破舊創新，要以是否有利於人民的富裕幸福，作為衡量我們各項

改革對或不對的標誌。」

胡耀邦的經濟思想，從「生產目的」，「消費與積累相互促進」，「藏富於民，民富才能國強」，「利用國內國外兩種資源、打開國內國外兩個市場發展對外經濟關係」，「加快與擴大特區建設」，到「二十年翻兩番戰略目標」，是環環相扣的一個完整戰略思想體系。他提出「全面而系統地改革、破舊創新」，就是為實現這個戰略目標。

胡耀邦的經濟發展戰略，在理論上與實踐上，都不可避免與陳雲集團「抑需求，捨發展，緩改革」的半斯大林主義、半經驗主義經濟思想相衝突。因此陳雲集團對胡耀邦「必欲除之而後快」是勢所必致。

首先發難的是胡喬木。二月十六日他把《人民日報》正副總編輯找到家裡，指責胡耀邦的「全面改革」講話不符合「十二大」精神，是「對大家施加壓力」，囑《人民日報》「不要宣傳」。

姚依林隨後給鄧小平寫信，稱「胡耀邦鼓吹突破『保四爭五』是提倡高速度。」胡喬木還到鄧小平那裡告狀，說「胡耀邦對社會主義信念動搖」。一時亂雲滾滾，風暴即至。

對胡耀邦正式發難

正式發難是在三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書

記處會議上，趙紫陽先講了一段話，說：「歷史經驗是，幾年順利發展，就坐不住，高指標，折騰，搞不下去了，再調整。現在有的同志頭腦發熱，又想折騰一次」。

趙紫陽沒有點名，接著李先念也附和了幾句。然後是陳雲長篇發言，指名道姓，列舉胡耀邦九條罪狀，從「高速度」、「高指標」，「高消費」、「搞亂經濟」，一直到「調查研究方法」，全盤否定胡耀邦的經濟戰略思想和從調查研究不同地區的實際條件出發、因地制宜的工作方法；賣弄他那套半斯大林主義、半經驗主義的「綜合平衡」論和「長期蹲一個點、解剖一個麻雀」的老套套、老方法。

會議一結束，鄧力群當天晚上就在事先安排好的《紅旗》雜誌聯絡員會上傳達了「陳雲九條」；接著又在第二天（三月十八日）新華社全國分社會議上再次傳達，並點出「中央最近出了一點麻煩」，要全國分社向所在省、市、自治區黨委「吹吹風」。

與鄧力群公開點火相配合，胡喬木背著胡耀邦、葉劍英、鄧小平等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找陳雲秘密策劃，整理出三月十七日會議記錄，打算召開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傳達和討論「胡耀邦問題」；實現其「倒胡」陰謀。

最有趣的一幕是，三月十八日夜晚，胡喬木與

陳雲謀劃結束後，興奮地跑到胡耀邦家裡，裝出一副同情的模樣對胡耀邦說：「你不當總書記，還可以幹別的，我們友誼長存。」弄得胡耀邦當時莫名其妙。

許多人只看到鄧力群「倒胡」是想取而代之。其實一九八三年那次「倒胡」，鄧力群還沒有那個資格。那次「倒胡」主角是陳雲和胡喬木，所以胡喬木才會情不自禁在胡耀邦家說漏嘴。胡喬木在一九八二年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已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他雖然不是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書記，但經常列席中央常委和書記處聯席會議。而與陳雲胡喬木一起發動「倒胡」的姚依林和鄧力群，一個（姚）只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一個（鄧力群）只是書記處成員之一。

鄧小平：胡趙格局不能變

胡喬木沒有自知之明，自以為鄧小平和陳雲都喜歡他；又看到三月十七日會議上，趙紫陽、李先念、鄧小平似乎都站在陳雲一邊，沒有一個人替胡耀邦說話，而且會議完全按照陳雲主張，把經濟工作的決策主導權由書記處轉到中央財經小組。胡喬木認為自己勝?在握，肆無忌憚地背著鄧小平幹起來了。其實鄧小平雖然在反自由化和使用專政手段等方面支持胡喬木主張，但對胡喬木的整體政治評價「不及格」。當年胡喬木投降江青、積極批鄧；鄧小平原諒了他，說他「不是賣身投靠，是軟骨頭」。

胡喬木沒有料到，他操之過急卻壞了事。鄧力群在《紅旗》聯絡員和新華社全國分社長兩個會議上煽風點火，引發全國強烈反彈。三月十八日夜裡，廣東、上海等省、市紛紛打電話到中央查問：「究竟中央出了什麼麻煩」？「怎麼剛剛撤了華國鋒又要倒胡」？「到底還要不要同心同德搞四化」？廣東省委把鄧力群的講話記錄連夜報送中央。

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習仲?接獲各地反應後，報告了鄧小平和中央政治局常委，鄧小平立即與在廣東的葉劍英通話商量；葉劍英堅決反對召開胡喬木、陳雲策劃中的「倒胡」會議。於是鄧小平把胡喬木、鄧力群找去，要他們把整理的材料「全部封存」；告誡他們「胡、趙格局不能變」！一九八三年三月那場「倒胡」流產政變，到此結束。

鄧力群在他的《自述．十二個春秋》中，對此不無遺憾地回顧道：「一九八三年之前，鄧（小平）、陳之間一直合作得很好，到了一九八三年這件事，鄧、陳分歧開始顯露出來」。

專政派轉向意識形態進攻

陳雲集團第一次倒胡失敗，的確暴露了鄧小平與陳雲在經濟領域的分歧。他們發現，鄧小平與胡耀邦在經濟發展戰略上有相通之處，都主張「二十年翻兩番，需要保持一定的發展速度」，與陳雲的「抑需求，捨發展，緩改革」不相通；因而改變

策略，在經濟領域暫時休戰，轉向意識形態領域發動進攻。他們找到新的「突破口」，是周揚在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週年學術報告會上發表的那篇題為《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探討》的學術報告。

　　這裡需要回顧一下胡耀邦在中央黨校時提出的《三場大討論》和胡耀邦、周揚在思想文化戰線同胡喬木、鄧力群之間分歧的由來。胡耀邦說：

　　「真理標準討論，使人們從兩個『凡是』的教條主義精神枷鎖中解放出來，只是思想解放的第一步。

　　第二步生產目的討論，比真理標準討論更重要，生產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人。人是生產的目的，而不是生產的奴隸，人不能成為物的奴隸，是人支配物，而不是物支配人。

　　第三步人的解放討論，包括物質解放與精神解放。人的物質需要與精神文化需要，應當是統一而不是對立的。人的嘴巴與其他動物嘴巴的區別，就在於不但要吃，而且要說，要表達思想、意見的自由；要使每一人都有主人翁意識，從精神受壓抑的奴隸狀態中解放出來，中國才有希望。所以經濟解放與政治解放、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要協調才能前進。」

　　胡耀邦找過王若水，要《人民日報》發起「人

的解放」討論，但《人民日報》自一九八○年起就已成為胡喬木、鄧力群「反自由化」的重點打擊目標，使這第三場大討論胎死腹中。

那時周揚正在獨立地重新思考「異化和人道主義」問題，與胡耀邦關於「人的解放」的思考正相吻合。一九八○年九月，胡耀邦請周揚來中央黨校演講。周揚講的中心思想，是通過改革，克服社會主義社會在經濟、政治、思想、文化各個領域的「異化」現象，實現人的物質和精神的全面解放。

胡耀邦欣賞周揚的看法，認為與他構想中「人的解放」討論的方向一致，要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把周揚演講的錄音整理發表。周揚起初有點猶豫，說他還在研究探索之中，這次胡耀邦請他來也未準備講稿，只是想到哪裡講到哪裡，不成系統。胡耀邦說，那就先整理出文字稿，送周揚決定。

周揚看了整理出來的稿子很滿意，稍加修飾就同意發表。但那時吳江似乎已察覺胡喬木與周揚之間有分歧，反對在《理論動態》發表。胡耀邦讓了一步，指示「那就作為學術理論研究探討在《中央黨校校?》發表」。就在此事過後的一九八一年一月初，胡耀邦不無感慨地說：「粉碎四人幫後辦了《理論動態》，那時不錯，敢提新問題，發表新見解，現在也不怎麼樣了。」

今天看來，周揚那篇演講發表在《中央黨校校?》而未登《理論動態》，倒是使胡喬木、鄧力群

們向周揚發難推遲了兩年。因為他們身邊的意識形態打手，眼睛只盯著《理論動態》，而懶得去翻《中央黨校校刊》，所以沒有發現周揚早在一九八○年九月，就在中央黨校大禮堂講了「異化與人道主義」問題。而吳江雖「謹慎」也無濟於事，專政派終於還是在《理論動態》挑出一篇無關緊要的《謙虛謹慎與實幹精神》短文，毫無根據地強加以「反陳雲同志」的莫須有罪名，先從中央黨校開刀，先打下黨校再打周揚。

　　周揚早在一九六○年代就研究過「異化和人道主義」，那時他批判過「人道主義」，但認為「異化」合乎辯證法，不能簡單否定。周揚在一九六三年十月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一次講話中，批判了南斯拉夫和蘇聯在人道主義問題上的「修正主義」，同時第一次論及「異化」，肯定了馬克思在《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關於「異化」的論點。那篇講話經毛澤東親筆修改，並加上毛自己的好幾段話；毛也肯定了周揚對「異化」的看法。

　　文革後周揚又讀了好多書，經過認真反思，對「異化和人道主義」有了新見解，一九八○年九月在中央黨校講過之後，仍在繼續研究思考為準備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週年學術報告，周揚請來王若水、王元化、顧驤三位有哲學和文學素養的學者，共同討論後，才產生出這篇《關於馬克思主義幾個理論問題》的大文章。

經濟倒胡、政治打周，雙管齊下

一九八三年三月七日，在中央黨校舉行的「全國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週年學術報告會」上，周揚的學術報告由一位播音員代唸。結束時，全場以長時間掌聲表達熱烈歡迎。那天正是胡喬木與陳雲、姚依林們緊鑼密鼓搜集胡耀邦「鼓吹高速度反對保四爭五」的材料、發動「經濟倒胡」之時，專政派出席報告會的只有王震和鄧力群兩人。王震沒有聽懂，看到全場熱烈鼓掌，走到周揚面前說：「你的報告真好，我很受教益，我想問你『Yihua』是哪兩個字？」周揚在紙上寫了「異化」二字，王震點點頭走了。

鄧力群有「特異功能」，立即嗅出「周揚講人道主義的語言同赫魯曉夫差不多」，「講社會主義政治、經濟、思想都會異化，同過去黨的一貫說法不一致！」當天下午，鄧力群同因策劃「經濟倒胡」上午未到場的胡喬木商定，馬上告知王震，讓王震下這決定，黨校報告會延長會期，各地來京出席會議人員留下，休會兩天再開，在兩天中緊急部署一批人「圍剿」周揚。

這就是當年專政派「經濟倒胡、政治打周」，雙管齊下的戰略部署。許多人至今還沒有弄清楚專政派一九八三年「倒胡」與「打周」之間的關聯。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思想解放運動，周揚一開始就與胡耀邦站在一條戰線，也一開始就遭到專政派的敵視和嫉恨。對胡耀邦發動真理標準討論的經典評

價，就是周揚首先提出，成為歷史定論。接著周揚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和理論務虛會後，繼續發表《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一九七九年五月四日），直接遏阻專政派以《四項基本原則》（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對自由民主派的清算鬥爭。

對專政派來說，胡耀邦是他們在政治、經濟領域全面專政的主要障礙，周揚是他們在思想文化領域全面專政的主要障礙。一九八三年三月「倒胡」、「打周」，同時爆發，絕非偶然，是專政派蓄謀已久的「大戰略」。鄧力群在《紅旗》聯絡員和新華社分社長兩個會議上緊急煽風「中央最近出了一點麻煩」，兼指胡耀邦和周揚。後來「倒胡」因葉劍英堅決反對、鄧小平叫停胡喬木、陳雲策劃中的「第一書記會議」而中止；「打周」卻獲得鄧小平支持而成功，鄧力群還假惺惺地向鄧小平表白：「我講中央出了麻煩是指周揚，下面誤會我指的是胡耀邦。」

鄧小平的思想本質

鄧小平在一九八三年「倒胡」、「打周」事件中的表演，充分暴露出他的「半毛澤東主義半實用主義」思想本質。胡耀邦、周揚主張思想解放，是關注中國的前途命運，通過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的全面改革實現每一個中國人的物質和精神的解放。而鄧小平和專政派的「思想解放」，只為奪取和鞏固自己的權力。所以十一屆三中全會，對胡耀邦、周揚和中國人民來說，是思想解放的起點；而

對鄧小平和專政派來說，是「思想解放」的終點。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三個月，鄧小平和專政派就亮出了「四項基本原則」，鎮壓思想解放運動，取締民主牆，逮捕魏京生。鄧小平要的「準確、完整的毛澤東思想體系」，只取其「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一半：「四項基本原則」；而拋棄另一半「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哪有什麼「準確、完整」？只能稱之為「半毛澤東主義」。那另一半是「半實用主義」，對打擊政敵有利時，「群眾貼大字報是我國形勢穩定的表現」；當大字報批評到自己時，就成了「資產階級自由化」、「動亂因素」，「不但要講，而且要專政手段」了。

專政派正是利用鄧小平搖來擺去的「半實用主義」，以謊報軍情、挑撥離間等陰謀手段，將改革力量各個擊破。鑑於「經濟倒胡」因過於急躁，未得鄧小平支持而受挫，且導致鄧、陳分歧暴露；他們對「政治打周」格外嚴密策劃，特別在取得鄧小平支持上面下功夫，必欲對周揚徹底孤立而殲滅之，採取的是極其黑暗、殘酷的陰險戰術。

陰險虛偽的胡喬木盡幹壞事

許多人至今不認識胡喬木的虛偽、陰險性格。真正深刻了解胡喬木的是歷史學家黎澍。黎澍說：「毛澤東的知識分子改造，就是裝造偽君子。毛澤東把胡喬木立為標兵，稱他『改造最好，靈魂最美』。胡喬木虛偽的雙重人格，就是在毛澤東身邊塑造的。」

胡喬木嫉恨周揚、陸定一由來已久。早在文革前老中宣部，胡喬木就常在毛澤東面前挑唆周揚、陸定一的「不是」。胡喬木此種陰暗心理，第一，來自「妒」。在共產黨內，周揚和陸定一讀書多，有學問，有思想，下筆有文采，理論和思想文化方面曾獲得毛澤東讚賞。胡喬木雖也讀了些書，但他是教條主義讀法，同陳雲一樣；寫文章枯澀死板，缺乏創意。第二，胡喬木緊跟毛澤東的秘訣，是跟左不跟右；還暗中窺探周揚、陸定一的「右」，向毛告狀。毛倒並不完全聽信。

那時胡喬木與陸定一、周揚在老中宣部的重大分歧，一個是「學習蘇聯」，一個是「雙百方針」。五十年代初，胡喬木要把蘇聯斯大林教條主義那套「宣傳網」照搬到中國來，從中央到基層嚴密控制輿論，遭到陸定一、周揚反對。那次毛澤東也反對胡喬木的主張，支持陸定一和周揚，胡喬木懷恨在心。一九五六年毛澤東提出「雙百方針」，陸定一、周揚支持。陸定一在學術領域提出「兩個萬歲」：唯物主義萬歲，唯心主義萬歲。主張大學開設唯心主義課程。胡喬木先是消極觀望，暗中壓制，讓《人民日報》不登支持「雙百方針」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陸定一、周揚主持）消息，而登反對「雙百方針」的陳其通文章。毛澤東對此提出批評時，胡喬木諉過於鄧拓（《人民日報》社長）；事實上鄧拓支持「雙百方針」，被胡喬木壓制、還要代胡喬木受過。後來毛澤東轉向反右，胡喬木立刻緊跟，幫毛澤東擬出那「六條政治標準」

，同後來幫鄧小平擬出「四項基本原則」如出一轍。

文革時胡喬木藉口身體差，毛澤東讓他在南池子原波蘭大使館一座豪宅休養；他頻頻接受來訪揭發陸定一，誣陷陸定一同毛澤東在陝北行軍時遭敵機轟炸是陸定一提供敵方情報，何等陰險惡毒！當時任中央宣傳部長的陶鑄認為是「胡說」，囑專案組不用理會。

文革後陸定一率先在《人民日報》撰文翻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反右傾的案，指出彭德懷的意見書「方式是對的，內容也是對的；毛澤東對彭德懷的打擊是完全錯誤的。」胡喬木立刻到鄧小平處挑撥說：「中央沒有作歷史結論，陸定一擅自批評毛澤東已引起國外輿論視作『非毛化』的新動向。」

鄧小平聽了胡喬木的讒言，從此「彭、羅、陸、揚」一案四人，兩個專政派彭真、楊尚昆俱受重用，官至人大委員長、國家主席；兩個改革派羅瑞卿過早去世、陸定一終身被打入冷宮，何其毒也！

一九八三年胡喬木利用周揚「異化與人道主義」一案，再次把鄧小平拉到專政派一邊，發動全國清除精神污染等一系列意識形態鬥爭，從「打周」到「二次反自由化倒胡」，終於達到了在共產黨內清除自由民主改革力量的戰略目標。

二○○八年六月十五日

《爭鳴》第369期 2008年7月號

鄧小平帝國三十年（５）

「專政派」對周揚步步進攻

選擇周揚的「人道主義與異化」理論開刀，發動全黨全國全軍「清除精神污染」，這是專政派「反自由化」大戰略的一場關鍵戰役。表面上看，「清污運動」是一場災難，全國雞飛狗跳、國際形象

受損、改革開放中斷。但對鄧小平和專政派來說，不但除掉了一個「自由化祖師爺」周揚，而且給胡耀邦貼上「渙散軟弱，反自由化不力」的政治標籤，讓這個總書記從此無力推行他的「全面改革」大

戰略。

專政派「反自由化」大戰略對抗胡耀邦「全面改革」大戰略的進程大致如下：

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日，全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會議，胡耀邦提出「全面改革」。

一九八三年三月七日，全國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學術報告會，周揚在報告中提出「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中心思想是「以改革克服社會主義

異化」。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日，胡喬木到周揚家中發難，但言辭閃爍。周揚聽不懂他在說什麼，問他：「我講了異化，說明改革的必要；把改革當做克服異化的重要手段，你認為怎樣？」胡喬木避不回答。

原來他只是聽了鄧力群說辭打上門來，自己毫無準備。等回去查了一通馬克思語錄，才給中宣部郁文打電話說：「異化問題我忘記談了，我想馬克思早期說的異化和晚期說的不一定一樣，把它不加區別應用到社會主義是不妥當的。」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二日，鄧力群組織北京大學教授黃楠森等四人在中央黨校會議批評周揚。黃楠森說：「異化就是矛盾，無處不在，無時不在，不用說社會主議社會，在共產主義社會也將充滿矛盾

」，但又說周揚「濫用異化概念」，自相矛盾。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六日，《人民日報》發表周揚《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會議，專政派發動「經濟倒胡」。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九日，葉劍英、鄧小平阻止「經濟倒胡」，封存胡喬木、鄧力群彙整的「倒胡」材料。

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日，鄧力群起草給中央的報告《中宣部關於〈人民日報〉不聽招呼發表周揚講話的情況和處理意見》，送交中央書記處。鄧力群的報告建議撤銷王若水《人民日報》副總編輯職務、並建議中顧委找周揚談話，要周揚做自我批評。

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一日，中央書記處討論鄧力群報告。胡耀邦說，報告涉及具體事實應與本人核對，書記處不做結論。習仲?明確反對鄧力群要周揚認錯。

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六日，胡喬木主持中宣部開會，核對鄧力群報告中的「事實」。周揚當面批評胡喬木撒謊：「你這個人講話，從來都是今天一個說法，明天又是另一個說法，我不知道究竟信你哪個？」周揚還說：「你的做法不正派，我是反對你個人，怎麼你就是中央？」周揚在中宣部會後寫信給胡耀邦，說明鄧力群報告如何歪曲事實。

四月二十日，鄧力群把修改後的報告再度送中央書記處，胡耀邦不予理會。

但專政派並不罷手。一九八三年三月「經濟倒胡」失敗，使專政派得到三點教訓：第一，「倒胡」必須取得鄧小平、陳雲兩邊支持，只靠陳雲一邊搞不倒胡；第二，為取得鄧、陳兩邊支持，光抓經濟問題也搞不倒胡，必須把重心轉向政治問題，

通過打周揚強化鄧小平的「反自由化」大戰略；第三，為防止地方反彈，還必須找幾個「自由化」的地方領導人開刀，殺雞儆猴。

一九八三年四月以後，鄧力群編製「七種研究材料」（包括《馬恩列論異化》、《社會主義國家持不同政見者論異化的文章》、《中國已發表的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的文章》等），仍從周揚的「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下手，把「政治打周」作為「政治倒胡」的第一步，爭取得到鄧小平的支持。這一步成功了。

鄧力群的「七種材料」不但送鄧小平、陳雲，還送給王震、李先念、彭真、薄一波、楊尚昆、宋任窮、王鶴壽等一批專政派老人，讓他們在鄧小平周圍製造「反自由化」空氣。

一九八三年八月，鄧小平已經胸有成竹。他既看了鄧力群的「七種材料」，聽了專政派老人的「輿論」；又收到周揚來信，周揚在信中談到毛澤東對「異化」的看法，還附上十八條「馬克思論異化」的語錄。這時他找胡喬木來聽取「?報當前思想領域情況」，然後對胡喬木說：

「最近看了一些材料，覺得思想界問題不少，有的問題相當突出。我準備在二中全會講一講，以『靈魂工程師的責任』為題」。

胡喬木建議題目要「更放大」，講「思想戰線

的形勢和任務」。

一九八三年九月七日，鄧小平又找鄧力群談二中全會講話稿，提出「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

鄧小平對「異化」問題開金口

一九八三年九月三十日，鄧小平的講話稿由鄧力群起草、胡喬木修改後送給鄧小平，當天鄧小平找鄧力群講了一篇話：

「早已收到周揚為他文章辯護的信和附上的馬克思講異化的十八條論述。周揚講毛主席一九六四年贊成他講異化的文章，毛主席是不是吃了他的虧啊？那時候滿腦子蘇聯變質，聯繫說到我們自己也變質，提出走資派，資產階級就在黨內，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只在中央打，各級領導都打。是不是異化思想導致的啊？

也怪，怎麼搬出這些東西來了。實際上是對馬克思主義、對社會主義、對共產主義沒有信心。既然社會主義自身要異化，還到什麼共產主義呢？在第一階段就自己否定自己了。否定到哪裡去？社會主義異化到哪裡去？異化到資本主義？異化到封建主義？總不是說社會主義異化到共產主義嘛！當然，也說了社會主義自身有克服異化的力量。

這些觀點，說它『打?馬克思主義旗幟』，可能

太重了，可以說它是『以馬克思主義的面目出現』。這不是馬克思主義。這是對社會主義沒有信心，對馬克思主義沒有信心。馬克思主義者要出來講話。」鄧小平這篇話，使專政派如獲至寶。鄧力群在他的《自述·十二個春秋》裡寫道：

「鄧小平這篇話講得非常好，非常重要。這一篇話使我、使喬木都有了一個提高。聽了這次談話，我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大大地提高了。有了這篇談話，才能有我在二中全會西南組批評王若水錯誤的長篇發言。胡喬木看了這談話，他的《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文章才可能寫得這樣好。王若水講，後來問題發展得這麼嚴重，是胡喬木送了材料。實際上，是周揚送了十八條語錄，才使鄧小平在異化問題上發表了這麼高明的意見。」

這的確是鄧小平思想的一個重大轉折。僅僅半年以前，專政派「經濟倒胡」期間，胡喬木講「胡耀邦對社會主義信念有所動搖」，鄧小平對胡喬木表示生氣，指責他「這樣講過頭了」。這回鄧小平自己講出「對社會主義沒有信心」，雖然語氣直接指周揚，心中也包括胡耀邦，當然還有毛澤東。因為周揚點出毛澤東與鄧小平在異化問題上的分歧，打中鄧小平的要害：在思想文化領域鄧小平比毛澤東更「左」。

鄧比毛更斯大林主義

鄧小平與陳雲、胡喬木、鄧力群、姚依林們的

分歧在經濟領域，政治思想領域他們都是專政派，都比毛澤東更斯大林主義。

一九五六年毛澤東提出「十大關係」、「雙百方針」批斯大林的「左」（教條主義），鄧小平、胡喬木都消極觀望。等到一九五七年毛澤東反右，批赫魯曉夫的右（「修正主義」），鄧小平、胡喬木緊緊跟上，而且表現得比毛更「左」。

這回周揚給鄧小平的信，點出毛澤東一九六四年贊成他講異化的文章；鄧小平聯想到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說出「毛主席是不是吃了他的虧啊」？意思是周揚的異化論「導致」毛的文革。而鄧小平口中的「文革」，與我們大家認識的「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包括思想文化領域的全面專政」完全不同，指的是「大民主」、「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並且總是連帶「西方民主」、

「議會制」、「三權分立」等放在一起批。實際上是藉口否定「文革」來否定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等人類普世價值。而對「包括思想文化領域的全面專政」，鄧小平不但不「否定」，還要「堅持」。

「清污」為名，除周倒胡為實

一九八三年十月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原來會議主題是討論《中央關於整黨的決定》，準備自一九八三年冬季開始，用三年時間，對黨的思想、作

風、組織進行一次全面整頓，以適應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全面改革」使命。

但鄧小平講話（十月十二日）把會議重心轉移到「清除精神污染」和批判周揚。鄧小平說：「精神污染危害很大，足以禍國誤民，腐蝕人們的靈魂和意志。有一些同志熱衷於談論人的價值、人道主義和所謂『異化』，說社會主義存在異化，經濟領域，政治領域，思想領域都存在異化。他們還用克服這種所謂異化的觀點來解釋改革，使人們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失去信心，可見理論界思想混亂到什麼程度！」這一段是針對周揚的。還有一段說：「有些同志對精神污染不聞不問，採取自由主義態度，甚至認為是生動活潑，是雙百方針的體現」。這是針對胡耀邦的。據鄧力群在《自述．十二個春秋》中所述，針對胡耀邦的這一段，是王鶴壽看了鄧力群替鄧小平起草這篇講話後建議加進去的。可見胡耀邦的這位在延安時期「推心置腹」的老朋友，一九八三年就準備對朋友「落井下石」了。

二中全會後，鄧力群得意忘形，他和吳冷西通過他們控制的中宣部和電視廣播系統，敦促各省、市、自治區領導人和知名學者、專家、公眾人物，每天輪流三、四個省，在全國聯播節目表態，聲討「精神污染」和「人道主義、異化」等「資產階級自由化」言論；從而把「清污運動」從思想、政治領域迅速擴大到全國城鄉機關、學校、科研單位、工礦企業、農村、部隊，在社會上造成種種緊

張、混亂現象，嚴重衝擊全國經濟和人民生活，引起國際輿論關注，以為「文化大革命又來了」。

鄧小平師承毛澤東耍兩面手法

鄧力群部署「清污」造成全國混亂，遭到習仲勛、萬里、方毅等人反對。萬里提出「農村不能搞清污」，方毅提出「科技部門不搞清污」。胡耀邦也聽到地方上的反彈，在出訪日本前夕（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給二十八個省、市、自治區打了電話，要各地注意停止推行鄧力群、吳冷西部署的「不叫運動的運動」（鄧力群語）那種做法。後來鄧力群攻擊胡耀邦「抵制清污，二十八天就剎車」，就是指十月二十五日鄧力群、吳冷西部署「清污運動」到胡耀邦「叫停」為止的二十八天。

鄧小平則態度曖昧。他自己在二中全會點的火，鄧力群把火燒大了，他又怕影響自己的國際信譽，怕影響全國經濟；一度對胡耀邦表示「清除精神污染名譽不好」，他那篇二中全會講話不要收進《鄧小平文選》，還想撤掉鄧力群的中宣部長。接見外賓時，鄧小平說「天塌下來胡耀邦、趙紫陽頂?！」另一面，鄧小平又叫胡喬木逼周揚「做自我批評」。鄧小平說：「周揚寫了一兩萬字的文章登在報紙上，應該公開作書面的自我批評」。

鄧小平用兩面手法對付胡耀邦，同毛澤東在一九七五年對付鄧小平如出一轍。毛澤東既要靠「四人幫」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又要靠

鄧小平「整頓」經濟，所以忽而支持鄧小平批「四人幫」的「左」，忽而支持「四人幫」批鄧小平的「右」。鄧小平師承毛澤東，忽而支持胡喬木、鄧力群那種「馬克思主義者」出來倒胡打周清污；鬧到天要塌下來時，又要胡耀邦、趙紫陽去「頂?」。

專政派看透了這一點，只要政治上不斷去挑撥胡耀邦同鄧小平的「分歧」，不怕打不倒胡耀邦。鄧小平自己心裡也很清楚，他在政治上支持專政派打擊改革派，可以無所顧忌；因為黨國元老絕大多數都站在「反自由化」即反改革一邊。而在經濟上支持改革派，鄧小平卻顧慮重重，忽進忽退；因為以陳雲為首的一大幫黨國元老並不站在改革開放一邊。

二○○八年七月十五日於美國

《爭鳴》第370期 2008年8月號

鄧小平帝國三十年（６）

陳雲力阻開放沿海城市

一九八四年一月，胡耀邦剛剛平息鄧力群的清污風波，鄧小平到廣東深圳、珠海，福建廈門三個特區視察，表示支持項南把廈門島全部搞成特區。這是三年前胡耀邦送給鄧小平的調查報告中早已提出的方案，鄧小平當時未予理會。

三月，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召開進一步開放沿海港口城市會議，提出開放大連、秦皇島、天津、煙台、青島、連雲港、南通、上海、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北海等十四個沿海港口城市。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都參加了這次會議，唯獨陳雲拒絕參加，陳雲還揚言他「絕不去特區」。鄧小平在會上講話，特別提到「請姚依林向陳雲報告這次會議的決策」。

那次會上，胡耀邦再度關注開放上海。早在三年前討論擴大廈門特區規模時，胡耀邦就主張開放上海，因為上海基礎好，人才充足，歷史上就有開放傳統，開放上海可以有力推動全國改革開放。這次胡耀邦找代表上海來開會的阮崇武副市長談了一上午，請他在會上講一講開放上海的構想。阮崇武中午打電話請示上海市委書記陳國棟，陳國棟說了一句話：「上海不為天下先」。阮崇武只好沉默不語。這就使上海的開放又拖後八年，到鄧小平「九二南巡」才解決。

十四城市開放會議之後，胡耀邦主持起草十二屆三中全會《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進一步，貫徹執行對內搞活經濟、對外實行開放的戰略方針，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雖然陳雲集團通過他們控制的計委、紀委百般阻撓，一九八四年工農業總產值增長百分之十四點二，其中農業總產值增長百分之十九點五，遠遠超過陳雲、姚依林的「保四爭五」，也

超過被他們批判「胡耀邦搞高指標、高速度」的百分之七。這就使陳雲集團警覺到必須剎住地方上主動改革開放的巨大衝擊力，尤其是沿海地區。陳雲決定拿支持胡耀邦改革開放最有力、被譽為「全國改革開放排頭兵」的廣東、福建兩省開刀。

一九八五年上半年，陳雲親自策劃、部署中央紀委、中央計委、中央組織部派出調查組到福建、廣東兩省調查處理「違反紀律」、「違反計劃」、「違反組織原則」的「大案、要案」。

大規模調查的結果，是查出福建普江地區晉江縣涵口村一些個體專業戶製造銀耳沖劑的「福建假藥案」和「廣東汽車走私案」。

所謂「福建假藥案」，是福建晉江地區一九八四年銀耳大豐收，涵口村一些專業戶小作坊把銀耳加工成銀耳沖劑，是一種營養食品。當地診所醫生有時在給病人用藥時附帶開給這種銀耳沖劑。這樣一樁區區小事，竟被陳雲列為「大案、要案」。就因這個「福建晉江假藥案」，不但免去對福建改革開放立了大功的項南省委書記一職，還給他一個「黨內警告」處分！

所謂「汽車走私」案，是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調他的秘書雷宇到海南島開發經濟。因為缺乏資金，獲得國務院總理趙紫陽批准，從海南進口一批汽車出售以籌措資金。當時中央各部都爭著伸手向海南要汽車。雷宇將資金全部用於海南建設，政績

卓著，獲得海南人民普遍肯定。陳雲的調查組「上窮碧落下黃泉」，查不出雷宇一分一毫的浪費或貪污；陳雲竟將汽車走私擅行定性為「大案、要案」，免去任仲夷省委書記和雷宇海南專員的職務。陳雲及其手下專政派打手群的橫暴恣肆，由此二案的製造可見一斑。

鄧小平不久前才到過廣東、福建，親見這兩省開放的努力和艱辛，明知陳雲謀劃除掉任仲夷、項南的用心，卻不置一詞。胡耀邦已被視為項南、任仲夷、雷宇等改革開放派的「後台」，感歎「日子難過」，下一步將輪到自己被「清算」了。

鄧對胡猜忌日深逐步削胡權力

從周揚「人道主義與異化」一案開始，鄧小平在政治上依靠胡喬木、鄧力群發動「清除精神污染」；胡喬木、鄧力群乘機挑撥胡耀邦與鄧小平之間的政治分歧，上了不少「奏章」，意思是胡耀邦發表與鄧小平「相反」的言論，是「企圖在國內外樹立自己的開明形象」；使胡耀邦在政治上失去鄧小平的信任。

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八日，鄧小平單獨找胡啟立談胡耀邦，指責「胡耀邦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上表現軟弱；作為總書記，這方面的軟弱是根本性的缺點」。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四日，鄧小平又找胡啟立和

喬石兩人談話，再度責怪胡耀邦對反自由化軟弱，批評胡耀邦與香港記者陸鏗談話「不得體，完全是迎合。」鄧小平說：「陸鏗的手法就是恭維胡耀邦，打著胡耀邦的旗幟，反對我們的內外政策」。

鄧小平談話中雖向胡啟立表示「你同胡耀邦比較熟，可以隨時注意提出你的意見和建議」，但實際是向胡耀邦周圍的人「打招呼」，暗示對胡已失去政治上的信任。

一九八六年五月，鄧小平當面「試探」胡耀邦，他說：「我、陳雲、先念都全下，你要下就半下，不再當總書記，再當一屆軍委主席或國家主席」。胡耀邦信以為真，表示「由衷贊成」。鄧小平居然對萬里說：「胡耀邦為什麼讓我下？他是要取而代之！」

自一九八三至一九八六，鄧小平對胡耀邦猜忌日深，總認為「胡耀邦在樹立自己的開明形象」，唯恐在國內外胡耀邦的威望超越自己。雖然一九八三年曾阻止陳雲集團倒胡（主要由於葉劍英堅持反對陳雲做法），事實上鄧小平已在逐步削去胡耀邦的權力：先把經濟工作主導權從中央書記處轉移到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把胡耀邦排除在外；後來又把政治體制改革交給趙紫陽的「政改辦」，也把胡耀邦這個總書記排除出來。因為鄧小平後期的「政治體制改革」，已經喪失「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靈魂，只剩下「解決黨如何領導、中央與地方關係、精簡機構、提高效率」等一黨專政下的「政治體

制」，當然不能由「反自由化軟弱」的胡耀邦插手。對於陳雲集團翦除支持胡耀邦的地方和中央部門領導人，鄧小平不是直接支持，就是間接默認，從未表示異議。所以葉劍英去世以後，胡耀邦在中央領導核心中處境日益孤立。葉劍英認為胡耀邦為人光明磊落、品質優異，生前對鄧小平、陳雲的不正派作法，深不以為然。

鄧小平與胡耀邦的最後決裂

鄧小平與胡耀邦的最後決裂，貫穿於胡耀邦主持起草「精神文明決議」的全過程。這是一場波雲詭譎、異?迭起，交織著價值觀分歧與權力衝突的複雜鬥爭。

如前所述，從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八日鄧小平同胡啟立個別談話開始，已明白顯示鄧小平對胡耀邦的信任發生動搖。據胡啟立說，他把鄧小平談話「原原本本報告胡耀邦，胡耀邦聽了之後，沒有向書記處其他同志談一談，徵求同志們的批評和幫助」。這表明胡耀邦因問心無愧而不以為意，繼續做他應做之事。

胡提出各地不同的發展戰略

在鄧小平一方，雖對胡耀邦已生猜忌之心，但實際工作還不能沒有他。從農村到城市，從經濟到文化，從內政到外交，胡耀邦工作的勤奮努力和開創精神，人所共見。即使鄧小平、陳雲把胡耀邦排

除出中央財政經濟領導核心之外，胡耀邦仍堅持走遍全國，從沿海到邊遠艱困山區，通過深入調查研究，提出符合各地不同條件的發展戰略。胡耀邦說：「過去決策上的主要失誤，就是不看各地條件，全國以糧為綱，以鋼為綱，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全國學解放軍，不只是強人之所難，而是強人之不可能。那些深山區，高寒區，森林區，荒原區，祖祖輩輩並不是靠種糧食解決溫飽。他們的主要勞動對象是什麼？你強迫他種糧食，不讓他開礦、搞林業，不僅剝奪了他的經濟自主權，還剝奪了他的主要勞動對象。生產三要素中，一個是勞動對象。你把勞動對象都剝奪了，違背了政治經濟學的常識，他怎麼能夠溫飽？」

　　胡耀邦以雲南、貴州、廣西為例，他說：「第一，三省、區有豐富的黑色金屬、有色金屬和非金屬礦產資源，開發這些資源對全國經濟發展有重大意義；第二，三省、區南部低熱河谷區，是亞熱帶經濟作物帶，可以發展糖料作物、亞熱帶水果、名貴中藥材及香料作物等；第三，大面積高寒山區和草場，能常年生長林木、牧草，可以發展林、牧業，放牧牛、馬、羊。三省區應立足於本地資源，採取切實措施和靈活政策，努力引進和發展新技術，開拓新產業，把自己的優勢發揮出來。」

　　胡耀邦關注農業發展和農民生活，堅持農村工作不能受鄧力群、胡喬木之流「反自由化」與「清除精神污染」等干擾；辦法是規定每年一月一日，發佈中央一號文件，部署當年的農村工作及有關政

策、措施。這一點與主管農村工作的萬里、杜潤生等均有共識，所以能堅持到胡耀邦下台為止。直至一九八七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才變成《鄧小平同志關於當年學生鬧事問題的講話要點》，也就是「倒胡一號文件」。從「農村一號文件」到「倒胡一號文件」，標誌了中國農村和農民命運的轉折點。

制定《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

胡耀邦制定的最後一個獲得鄧小平稱讚的重要文件，是一九八四年十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那是胡耀邦在陳雲集團竭力阻撓改革開放的艱難處境下獨力完成的。

鄧力群在他的《自述·十二個春秋》中，提到「胡耀邦親自組織起草」的這個文件時說：「自始至終，胡耀邦沒讓胡喬木參加，我只是參加一般討論，提提意見而已。」鄧力群對《決定》中「放權讓利的十條措施」所提反對意見，也未被胡耀邦採納。但鄧小平卻對這個決定給予高度評價。他說：「這個決定，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是一大發明、一大創造。」可見鄧小平雖然政治上疑忌胡耀邦，經濟上胡耀邦也被擠出決策核心；但一旦陳雲集團阻撓改革開放時，還需要胡耀邦來挽救。這就是鄧小平的自我矛盾。

一九八四年是鄧小平最風光的一年，年初巡視廣東、福建，發表擴大廈門特區和增加開放城市的

講話；三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進一步開放全國十四個沿海港口城市會議；十月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國的變化，使鄧小平揚名國際。那年十月一日北京舉行了建國三十五週年慶典，民眾在遊行隊伍經過天安門時，自發打開「小平您好」的橫幅標語，向全世界表明那時鄧小平的確深得人心。

鄧小平又向左轉

過去人們批評毛澤東，經濟形勢好一點，就要反右。鄧小平也一樣，一九八四年全國經濟形勢好一點了，一九八五年鄧小平又向左轉了。一九八五年鄧小平對內對外講話，都強調「反自由化」和「四項原則」。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日會見台灣陳鼓應教授時，鄧小平說：

「中國在粉碎四人幫後出現一種思潮，叫資產階級自由化，崇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會主義。這不行。中國要搞現代化，絕不能搞自由化，絕不能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對搞資產階級自由化並且觸犯了刑律的人，不嚴肅處理是不行的。因為他們搞的這一套無非是大鳴、大放、大字報，出非法刊物，實際上是一種動亂，是文化大革命遺留下來的做法，不能讓這股風刮起來。那些崇拜西方民主的人總想搞這個『四大』（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自由化思想前幾年有，現在也有，不僅社會上有，我們共產黨內也有。」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會見津巴布韋總理穆加貝時，鄧小平又說：

「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是四項基本原則。如果不堅持這四項基本原則，糾正極左就會變成糾正馬列主義、糾正社會主義。」

一九八五年九月全國黨代表會議前，鄧小平找「左王」鄧力群幫他起草會議講話稿，鄧小平對鄧力群說：

「關於四項原則，我有點新的意思。這個意思是：四項原則是黨中央決定內外政策的基礎，各種政策既來源於四項原則，又有利於四項原則；如果不講四項原則，糾左就會糾到社會主義，糾到馬克思主義。」

鄧小平向左轉，專政派感到「揚眉吐氣」，使一九八五年九月全國黨代表大會從一九八四年十月的《經濟體制改革決定》急劇後退；陳雲親自動筆寫出的講話，重申他的一貫教條：「我們是共產黨，共產黨幹的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經濟就是有計劃、按比例。」

會後，專政派控制的「計劃委員會」和「紀律委員會」按照陳雲的「有計劃按比例」鳥籠標準，派出調查組到全國各地查處「違反計劃」「違反紀

律」飛出鳥籠的地方和企業領導幹部，造成一九八五年底、一九八六年初全國一大批改革派隨著項南、任仲夷等改革派領導人「紛紛中箭落馬」。

二○○八年八月十五日於美國

《爭鳴》第371期 2008年9月號

鄧小平帝國三十年（7）

胡用精神文明建設來「緩衝」

胡耀邦此時在想什麼？他說：「現在政治體制改革沒有研究透，下不了馬；經濟體制改革雖然通過了決議；還是受到百般抵制改不動，影響經濟發展。阻力這麼大，我想只能緩衝一下，從觀念形態的東西著手，搞個精神文明決議。」但他又說：「老人家也不會滿意，但憑他對我的信任，可以通過。」

胡耀邦於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組成起草小組，開始著手起草精神文明決議。

那時他認為老人家（鄧小平）還是信任他的。其實一九八五年六月三日陸鏗發表《胡耀邦訪問記》後，鄧小平對胡耀邦的信任已更加動搖，認為「胡耀邦在樹立自己的形象」。但鑒於九月全國黨代表會議後，陳雲集團在經濟戰線向全國改革派大舉進攻。全國各地，計委收權，紀委抓人，在一

九八五年底到一九八六年初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計委下達指令，干預包括特區在內的一切經濟活動；紀委不但任意處置黨內各級幹部，還下令逮捕、槍斃非黨人士。這些倒行逆施，使改革開放嚴重受挫，導致一九八六年上半年全國經濟發展停頓。

鄧小平又坐不住了，開始從左向右擺回。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八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講話，批評了紀委和計委。鄧小平說：「紀委管黨內紀律問題，法律範圍的問題應該由國家政府管，黨的紀委去管不合適。黨和政府關係，是一個政治體制問題。」又說：「你提倡放權（指十二屆三中全會決議放權讓利十項措施），他（計委）那裡收權，你有什麼辦法？看來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動，因為首先遇到人為障礙」。但怎麼改？鄧小平又拿不定主意。他會見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竹義勝時說：「政治體制改革觸及許多人的利益，太困難，太複雜，究竟從哪一點開始著手，我們還沒有拿定主意。」

在如此困難複雜的全國形勢與相對孤獨的個人處境中，胡耀邦選擇從「精神文明建設」的角度來「緩衝一下」，試圖在意識形態上重新扭轉改革開放的不利形勢，不失為一種擺脫困境的積極思路。

按照胡耀邦的思路，在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方面，他同專政派的根本分歧當時無法解決。經濟體

制改革通過了中央決議都不管用，專政派照舊抵制決議，把改革派整掉。政治體制改革鄧小平又拿不定主意，交給趙紫陽成立「政改辦」去「研究」了。胡耀邦能夠做的，是在精神文明建設的理論與實踐結合上有所突破。因為他始終沒有放棄思考「人的解放」問題，在胡耀邦看來，建設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目的都是「人的解放」。

人們有一種錯覺，以為胡喬木、鄧力群這些「秀才」、「筆桿子」，是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其實他們只是抓住「四項基本原則」之類的教條當做棍子，糾集一幫打手用來打人。真正用心讀書，認真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倒是胡耀邦、周揚、陸定一和一些「自由化」知識分子。

胡耀邦、周揚從文革教訓中深刻體會到專制制度迫害人、蔑視人、不把人當人的危害，使他們重視研究馬克思關於「人的解放」的思想。

在「生產目的」討論中，胡耀邦就注意到馬克思《一八五七至一八五八年經濟學手稿》中的一段話：

「古代的觀點和現代世界相比，就顯得崇高得多。根據古代的觀點，人，不管是處在怎樣狹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規定上，畢竟始終表現為生產的目的。在現代世界，生產表現為人的目的，而財富則表現為生產的目的。」

胡耀邦與專政派在生產目的討論中的分歧就在這裡。胡耀邦把人視為生產的目的，而專政派把人視為實現生產的工具、手段。用陳雲的話來說，叫做「國家拿大頭，集體拿中頭，個人拿小頭」。他們認為生產的目的是財富，而創造財富的生產者個人，只能拿到一點點「小頭」，以維持再生產的生命；財富的絕大部分，都被「國家」和「集體」的怪獸吞噬了。

這也就是周揚在他的論文中指出的「蔑視人的價值、人的幸福」的異化現象。周揚認為改革就是要克服這種異化現象。周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打中了專政派的要害，故而遭到專政派的致命打擊是不可避免的。胡耀邦說：「胡喬木、鄧力群二人，一直反對周揚、夏衍、巴金，認為他們三人是搞自由化的頭頭，影響太大；我一直頂著，認為這三個人決不能整。」結果胡耀邦還是沒頂住，因為胡喬木、鄧力群後面還有二人：鄧小平和陳雲。

鄧小平和陳雲在經濟開放政策上有重大分歧，但在一黨專政理論上是完全一致的。而且鄧小平一貫主張：「經濟問題上不一致可以讓，政治問題上不一致不能讓」。

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兩種態度

從真理標準、生產目的，到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爭論，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內對待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兩種態度。

一種是胡喬木、鄧力群等自封為「馬克思主義權威理論家」的「左王」們，他們把自己說的話叫做「馬克思主義者出來說話」。他們的唯一專長，就是把「四項基本原則」同人權、人性、人的價值、人道主義、人文精神、人的解放和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等普世價值對立起來，把他們的「馬克思主義」歸結為「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堅持黨的領導」、「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幾條專門用來打擊別人、抬高自己的教條主義棍子。

文化大革命時，江青曾經表揚張春橋、姚文元是「馬克思主義」的「金棍子」和「銀棍子」。在鄧小平時代，胡喬木、鄧力群也成了「馬克思主義」的「金棍子」和「銀棍子」。也可以說，鄧小平、陳雲讓胡喬木、鄧力群扮演的角色，正是當年毛澤東讓張春橋、姚文元扮演的角色。

與胡喬木、鄧力群們不同，胡耀邦、周揚不以「馬克思主義理論權威」自居，他們只是馬克思理論的「研究」者、「探討」者。他們主張馬克思的理論與當代實踐結合，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從馬克思到毛澤東，他們都不採取全盤肯定、全盤否定的態度。胡耀邦和周揚，都曾表示要把毛澤東同他們的多次單獨談話以回憶錄的形式寫下來，因為其中有些值得重視的觀點，在發行的毛澤東著作中並未收入。周揚舉例說，從延安到北京，毛澤東同他談對人性和異化問題的看法，就同胡喬

木、鄧力群們的流行說法不一樣。周揚很不認同胡喬木、鄧力群自封「馬克思主義」的裁判者和他們對待馬克思和毛澤東的那種選擇性的教條主義態度。他曾引用恩格斯給拉法格信中的話：

「所有這些先生們都在搞馬克思主義，然而他們屬於十年前你在法國就很熟悉的那一種馬克思主義。關於這種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曾經說過：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大概會把海涅對自己的模仿者說的話轉送給這些先生們：『我播下的是龍種，收穫的卻是跳蚤』。」

事實上在馬克思那裡，無產階級專政這些東西，不過是為實現人的解放，為實現「每一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的未來社會，在特定歷史條件下（例如反動勢力使用軍事暴力屠殺人民）可供選擇的工具、手段，既非目的，也非「基礎」；人的解放才是目的。

這種分歧，在馬克思時代就存在。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十分明確地把「霍布斯那種敵視人的唯物主義」與「同人道主義相吻合的唯物主義」區別開來。馬克思自己屬於「同人道主義相吻合的唯物主義」，也就是以人的解放為目的的歷史唯物主義。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指出：「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後要研究在每個時代歷史地發生了變化的人的本性」。在胡耀邦看來，離開人的命運、人的解放的思考，就不是馬克思。

胡起草文件愛用「提神」二字

對胡耀邦主持起草《精神文明決議》，「馬克思主義跳蚤」們當然不會坐視。但胡耀邦起初還頗有信心。

其一是因為鄧小平肯定過胡耀邦的一九八四年經濟體制改革決定。胡耀邦說：「小平同志說經濟體制改革決定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精神文明議》要寫成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倫理學。首先要寫清楚精神文明的戰略地位。社會主義社會是個新社會，沒有高度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不成熟、不鞏固的。什麼是精神文明？就是人的素質、人的知識程度、人文素養、人與人的關係，各種不同職業的人之間、各民族之間，從社會到家庭，形成空前的互助、和睦、和諧的新型關係。這一部分很重要，要提神。」胡耀邦愛用「提神」二字，指文辭要有新意、寫出新的思想，讓人精神振奮，「唯陳言之務去」，不要用陳辭濫調。對此鄧力群曾在鄧小平面前挑撥道：「胡耀邦的最大特點，是心思用在怎麼讓他所講話、他的意見把人們的情緒調動起來、激動起來」。其實這就是胡耀邦的「提神」，是以「調查新情況，研究新問題，提出新思想」，振奮人的精神去建設新社會的新文明。鄧力群卻對此扭曲為「胡耀邦為自己贏得掌聲，要樹立自己形象」；鄧小平也附和道：「這是胡耀邦的老毛病，一向如此」。

其二是鄧小平對胡耀邦講過兩句話：一句是，清除精神污染的名譽不好；另一句是，思想政治工作決議三年不作。胡耀邦認為鄧小平已經看到專政派對清除精神污染和思想政治工作的粗暴做法嚴重衝擊到全國改革開放和經濟成長。此時正面提出精神文明建設，應當有助於開放與發展。

胡趙聯手對付專政派

後來事態的演變卻比胡耀邦預期的複雜、詭譎得多。

第一，對胡耀邦主持起草《精神文明決議》的全過程，「馬克思主義跳蚤」們始終嚴陣以待，伺機進攻。胡喬木、鄧力群鑒於一九八三年「經濟倒胡」失敗，是由於操之過急，沒有在中央聚集充分的專政派力量，過早向下製造輿論，引起地方反彈，導致鄧小平與葉劍英聯手，迫使陳雲集團策劃中的倒胡會議流產；這回接受歷史教訓，採取步步為營、充分動員專政派老人的力量，迫使鄧小平站到專政派一邊。胡喬木、鄧力群傚法一九六九年中共九大文件起草時，康生、張春橋打敗陳伯達的手段。毛澤東讓陳伯達起草九大報告，康生、張春橋另行起草與陳伯達對立的九大報告稿，成功導致毛澤東拋棄陳伯達，採用他們的稿子。胡喬木、鄧力群以同樣手法，另行起草針對胡耀邦《精神文明決議》稿的《修正稿》，在專政派老人中廣為散發，爭取支持；還發給專政派的打手王忍之、何東昌等一群人，企圖以他們的稿子取代胡耀邦。鄧力群很

快就得到了兩個政治局常委陳雲和李先念的批示，「同意」胡喬木、鄧力群的稿子。

第二，胡耀邦在起草過程中，察覺反對力量已經集結，形勢嚴重；必須同趙紫陽聯手爭取鄧小平的支持（那時葉劍英已辭去政治局常委職務，常委五人是胡耀邦、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陳雲）。正好那時胡喬木批轉社科院秦柳方收集來的「經濟理論上的自由化」材料，引起趙紫陽的警惕。趙紫陽批示：「批判經濟理論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現在更需要的是大膽探索」。胡耀邦也立即批示：「同意紫陽同志意見，請厚澤同志將紫陽同志批語轉告喬木同志。」這件事促成胡耀邦與趙紫陽在決議起草過程中站到了一起。

第三，胡耀邦和趙紫陽針對胡喬木、鄧力群的《修正稿》，聯名發出一封給中央常委的信。信中就胡喬木、鄧力群指責決議稿未沿用十二大「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精神文明建設」的提法作了詳盡說明。鄧小平閱後立即批示：「耀邦、紫陽的意見很好，我完全贊同」。李先念也跟著批示：「同意小平意見」。鄧小平當時已知道鄧力群把自己的《修正稿》發給了二、三十人，意在挑起爭論。鄧小平對胡耀邦說：「不要緊，實在要挑明就挑明，可以採取表決方法解決問題，少數服從多數。鄧力群的修改稿打的是我的牌子，實際是想把我們拉向左，這個不能聽。我們的政策還是要放，而不是收。」這一回合胡耀邦、趙紫陽暫時擊敗胡喬木、鄧力群和他們背後的陳雲。但事情正在起變化。

毛澤東請鄧復出，送鄧八個字

鄧小平在一九八六年面對的形勢，很像毛澤東在一九七五年。那時鄧小平和葉劍英站在一邊，整頓經濟，整頓軍隊，使全國形勢漸趨穩定。而站在另一邊的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等一夥，認定鄧小平、葉劍英這些人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毛澤東把鄧小平找回來工作是對他們奪取最高權力的障礙。

這裡要順便糾正一個史實。有些歷史著作誤稱「柔中寓剛，綿裡藏針」是毛澤東找鄧小平出來工作時的肯定評語，並以此八個字概括鄧小平的個人性格。事實恰恰相反。

毛澤東把鄧小平請出來工作時是這樣說的：

「現在請來了一個軍師，叫鄧小平。發了通知，當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我想政治局添一個秘書長吧，你（指鄧小平）不要這個名義，那就當個參謀長吧。

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辦事比較果斷。他一生大概是三七開。你們的老上司，我請回來了，政治局請回來了，不是我一個人請回來的。

你呢（指鄧小平），人家有點怕你，我送你兩句話：柔中寓剛，綿裡藏針。外面和氣一點，內部

是鋼鐵公司。過去的缺點，慢慢地改一改吧。」

　　毛澤東的意思很明白，要鄧小平「改一改」讓人家害怕的那種過硬性格；送給鄧小平的兩句、八個字，正是針對鄧小平個人性格中的弱點，勸他以後對人和氣一點，做到外柔內剛。事實證明鄧小平後來也沒有做到。

二○○八年九月十五日，於美國。

《爭鳴》第372期 2008年10月號

鄧小平帝國三十年（８）

　　鄧小平與「四人幫」的鬥爭

　　在一九七五年鄧小平同江青們的鬥爭中，毛澤東開始站在鄧小平一邊批評江青。那時毛的注意力放在「安定團結」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他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

　　那時毛澤東和周恩來都已病重，毛把鄧小平請出來，召開中止十一年之久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四個現代化」目標，就是要結束文化大革命，團結全黨全軍把經濟搞上去。

　　所以江青與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結合起來反對周恩來、鄧小平，毛澤東認為他們搞分裂，目

的是要奪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毛澤東指出：「江青有野心。他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員長，她自己做黨的主席。」還警告他們「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不要搞四人幫，為什麼不和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搞團結？」

在毛澤東看來，江青他們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功」，但治不了國。林彪垮台後，毛澤東把鄧小平請回來，是有意讓鄧小平接自己的班；並期待鄧小平能同江青他們合作，在繼承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路線的基礎上治理好國家。但這是一個無法調和的矛盾。

第一個回合，鄧小平在毛澤東支持下打敗了「四人幫」。一九七五年上半年，政治局會議批評了江青等人，毛澤東表示高興。毛對鄧小平說：「他們幾個人現在不行了，反總理、反你、反葉帥。現在政治局的風向要轉了。你要把工作幹起來。」鄧小平回答：「我有決心，但反對的人一定會有」。毛澤東笑道：「木秀於林，風必摧之。無非是挨罵，我歷來就是挨罵的。」

一九七五年六月下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被派往浙江、上海「幫助工作」，江青寫了一份書面檢討，幾個月未公開露面。鄧小平從一九七五年七月開始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和中央日常工作。

三個月後，一九七五年十月，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擔任中央政治局與毛澤東之間的聯絡員。鬥爭進入第二個回合。

鄧不肯違心肯定文革

毛遠新與江青一派政治上一致。江青他們見不到毛澤東而毛遠新隨時可見。頗有心計的毛遠新，看出毛澤東最不放心鄧小平的，是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所以就在這個要害問題上進言。毛遠新對毛澤東說：「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講話，他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提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社會上有股風，就是對文化大革命怎麼看，是肯定還是否定，成績是七個指頭還是錯誤是七個指頭，有分歧。這股風比一九七二年批極左時還兇些。」

正好這時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給毛澤東寫信，告遲群和謝靜宜的狀。毛澤東認為劉冰寫的信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賬，矛頭是針對他，因為謝靜宜是毛派去清華的。十一月二日，毛澤東對毛遠新說：

「有兩種態度，一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你告訴小平注意，不要上當，小平偏袒劉冰。清華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你找小平、東興、錫聯談一下，把你的意見全講，開門見山，不要吞吞吐吐。你要幫助他（指鄧小平）提高。」

然而當毛遠新同鄧小平、汪東興、陳錫聯一起談的時候，鄧小平完全忘了毛澤東教他「柔中寓剛、綿裡藏針」，一下子就頂起來。鄧小平說：「你的描述中央是執行了修正主義路線，這話不好說。我主持中央工作三個多月是什麼路線，全國形勢好一點還是壞一點，實踐可以證明。」

對於這個局面，毛澤東還是希望由鄧小平來解決。他說：「討論限於文化大革命問題，由鄧小平主持，對文化大革命做個決議。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現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

但被鄧小平拒絕。鄧小平說：「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適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不了解。」

鄧榕在《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寫到這一點時說：「最根本的，他不願意違心地主持寫一個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不過在鄧小平爭取復出時寫的檢討中，不但肯定文革，而且肯定文革對他的批判，表示「永不翻案」。所以才有後來毛澤東的「永不翻案，靠不住吧」一語。這是毛澤東同鄧小平最後決裂的關鍵。

毛終於棄鄧而選擇華國鋒

毛澤東最終拋棄鄧小平時已是風燭殘年，距離

去世只剩幾個月。他對周圍的人，對中國未來已無把握。該把政權交給誰？他找回鄧小平，原本是讓這個「鋼鐵公司」與江青們那個「鋼鐵公司」取得平衡。現在鄧小平拒絕做肯定文革的決議；不能用了。但毛澤東又很清楚棄鄧而把政權交給江青們，天下必亂。於是周恩來去世後，毛澤東指定華國鋒代總理並主持中央工作，也就是成為毛的最後一個接班人。這已經是「無可選擇的選擇」，毛說：「華國鋒為人老實忠厚，辦事公道不蠢。人家說他水平低，我就選這水平低的。」

　　當時江青集團打算讓張春橋當總理，王洪文當全國人大委員長，江青當黨主席。毛澤東一個都不讓他們當。但對華國鋒究竟能不能站得住，毛是無把握的，所以才有那篇可以視為政治遺囑的話：

　　「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麼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麼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麼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麼交？和平交不成就動盪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

　　這是毛澤東對華國鋒的當面交代。毛臨終時還有一幕：當葉劍英告別他走到門口，毛又示意招回，握住葉的手盯著葉看，嘴唇微動說不出話。葉的

感覺似有囑他幫華國鋒安定政權之意。

葉劍英雖然幫華國鋒粉碎了江青集團，但政權最後落到鄧小平手中。葉劍英去世前的最後歲月，對鄧小平獨斷專行深表不滿，憤而辭去政治局常委職務。

關於精神文明決議的爭論

在一九八六年胡耀邦同胡喬木、鄧力群們的鬥爭中，鄧小平開始也站在胡耀邦一邊批評胡喬木和鄧力群。那時鄧小平的注意力在排除陳雲集團的干擾，繼續改革開放。胡耀邦的精神文明決議稿把精神文明建設同改革開放密切聯繫在一起，獲得鄧小平的肯定。

一九八六年八月二日，胡耀邦到鄧小平在北戴河的住處，徵詢鄧小平對精神文明決議（第二稿）的意見。一進大門，鄧正在那裡散步，遠遠看見胡耀邦就說：「文件不錯，可以印發大家討論了。」

八月八日，胡耀邦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精神文明決議稿。鄧力群作了一個多小時長篇發言，指責決議稿「一個後退」、「三個不夠」。「一個後退」指的決議稿未提「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是從中共十二大「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後退」。「三個不夠」主要指「體現中央領導同志講話精神」不夠，也就是決議稿中沒有引用陳雲、鄧小平關於反「自由化」和「精

神污染」的言論。鄧力群說：「陳雲同志短短的一篇話，十六次講社會主義，說我們幹的是社會主義事業，最終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他反覆強調堅定地保持共產主義的純潔性，同一切違反共產主義理想的錯誤言行進行堅決鬥爭。」

胡耀邦沒有理睬鄧力群的指責。他說：「『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這個問題不爭清楚，『左』的東西就會從這裡出來。全國人民怎麼能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四項基本原則不能天天念經的樣子去講，那就解放不了思想。」

八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原則通過精神文明決議稿，印發給黨內二千多人、黨外二百多人討論，廣泛徵求修改意見。

修改意見集中於兩點：一是認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概念不科學，有十九個省和部、委，以及陸定一等領導人要求取消這一提法；二是堅持寫上「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

九月七日，鄧力群把他和胡喬木的決議修正稿印發給政治局常委和王震、薄一波、楊尚昆、彭真、何東昌、王忍之等人。

九月十日，陳雲和李先念批示「同意」胡喬木、鄧力群的稿子。

九月十四日，針對鄧力群和胡喬木的決議修正稿，胡耀邦和趙紫陽聯名發出給中央常委的信《關於決議稿中未沿用十二大的「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精神文明建設」的提法的一點說明》。當天鄧小平批示「贊同」胡耀邦、趙紫陽的意見，李先念也轉回來表示「同意小平意見」。

九月十六日，鄧小平辦公室告知胡耀邦：小平同志又看了一遍耀邦、紫陽給常委的信，說「還是照他們兩位意見辦」。

兩鄧談話，鄧力群態度強硬

九月十八日，鄧小平找鄧力群談話。那時胡喬木觀察形勢，已閉口不語。鄧力群說：「看來胡喬木意見很多，但公開場合不說，私下跟我說，這個文件比十二大報告倒退很多啊！現在的釘子，就只剩下鄧力群了，別人拔不動，就讓鄧小平來拔這個釘子罷。」

這次談話鄧小平和鄧力群各說各的。

鄧小平：文件第十一頁你的修改意見幾句話（指「資本主義剝削制度在中國也有約百年的歷史，在某種條件下也並非絕對沒有捲土重來的可能，這是中央領導同志所再三警告過的」），是誰提的？

鄧力群：喬木同志提的。

鄧小平：我圈掉了。

鄧力群：我同意喬木同志的意見，也認為有那種可能。

鄧小平：你們那個書面意見，一條一條分開看，每一條都是好的，但是匯總起來就給人一個印象：黨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方針、政策改變了。你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

鄧力群：我不同意這種看法。我們書面意見中的每一條意見，都不是我個人發明的，都來自中央過去的決定，包括你的講話。

鄧小平：你和胡喬木不要擴大我和陳雲同志之間的分歧和矛盾。

鄧力群：小平同志，你們兩位之間在有些問題上有不同意見，我看出來了。我一向採取的態度和方法，不是擴大分歧，而是縮小分歧或者迴避分歧。陳雲同志的主張，我宣傳過，這是事實，也不止一次；你的主張，我也宣傳過。我可以向你報告，宣傳你的主張比宣傳陳雲同志的主張多得多，多好多倍。我自己的講話、自己的文章，我批閱的文件，件件都在，如果需要審查，可以全部拿來，看看究竟是宣傳你的主張多，還是宣傳陳雲同志的主張多。

鄧小平：明天開會，你就講一句話，完全贊成

這個稿子。

鄧力群：不講話可不可以？

鄧小平：當然也可以。

鄧力群：我不講。

鄧小平：你不講，別人會講。

鄧力群對李鵬、耀邦、紫陽等人的評價

往下的話題，轉到鄧小平問鄧力群對一些人的觀察，雙方相當一致。

鄧小平：我問一下你對一些人的觀察。胡啟立怎麼樣？

鄧力群：政治上沒有把握，不穩當。在耀邦同志面前不敢講不同意見。至於王兆國，……

鄧小平：王兆國不必提了。李鵬怎麼樣？

鄧力群：這幾年參加書記處會議，就這麼點接觸。從他的歷史來看，留過蘇，在蘇聯那種教育制度下，受過馬克思主義的系統教育，專業學得好。回國以後從基層幹起，是一步一步上來的。據我看，他管工業是有經驗的。在書記處政治生活中間，給我的印象，他能夠提出一些不同意見。

鄧小平：喬木怎麼樣？

鄧力群：他沒有搞政法工作以前，我的印象在書記處會上的表態，基本上是隨聲附和。到了政法小組工作以後，有一點變化。可能是因為政法工作比較複雜，不能不謹慎。

鄧小平：這就是進步啊。

鄧力群：是。

鄧小平：你對耀邦同志和趙紫陽的看法。

鄧力群：和耀邦同志共事多年，同趙紫陽比，他學習是用功的，讀馬列的書，讀中國的古代文學，都很用功。這方面紫陽同志不如他。據我觀察，也聽到別的同志說，趙紫陽讀馬列的書很少。在書記處的會上，對於不同意見，耀邦同志還能夠讓人家講出來。你講完了，開完會，他自己還是幹他自己的。如果在會上對趙紫陽提出不同意見，他是聽不下去的；一定找各種各樣理由把你駁倒，強詞奪理，盛氣凌人，非把你壓倒不可。他的意見碰到釘子行不通了，他也會說，原來我沒聽你的意見，現在證明你的意見對。耀邦同志最大的特點，心思用在怎麼讓他的講話、他的意見，把人們的情緒調動起來，激動起來。贏得掌聲愈多，他愈高興。他的精力主要用在這方面，而沒有或者很少用在使他的意見符合實際。

鄧小平：這是他的老毛病，一向如此。

鄧力群：趙紫陽同志做經濟工作，從基層搞起，縣、地、省到中央，有經驗，對經濟工作中的問題比較敏感，也有辦法。我最擔心兩件事。一是我聽起草一九八五年政府工作報告的同志講，趙說馬克思主義是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的，我們搞社會主義建設，他那個東西對我們不管用。二是他搞經濟工作，熱衷於移植西方資本主義那一套。這兩條對於高級幹部來說，都是大毛病。像趙這樣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有這樣的毛病，實在讓人擔憂。

這是一次充分反映鄧小平內心思想的重要談話。鄧力群在回顧這次談話時說：「一個多小時的談話，言辭之尖銳，在我一生中是從來沒有過的。我走的時候，鄧還起來把我送到門口。這就是政治家的涵養啊！但是很明顯，這次談話給鄧小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王震後來告訴我，在一個少數人參加的會上，鄧小平說：鄧力群要把我們往左的方面拉。所以，在這次起草《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過程中，胡、趙的一致，很明顯是得到鄧小平的支持。」

二○○八年十月十五日，於美國。

《爭鳴》第373期 2008年11月號

鄧小平帝國三十年（９）

鄧雖支持胡趙，但暗許力群

鄧力群的判斷沒有錯。

第一，鄧力群拒絕鄧小平的要求，拒絕「講一句話」贊成鄧小平認可的決議稿，表明鄧力群要把黨的方針、政策「往左的方面拉」，迫使鄧小平必須與他保持距離。但鄧小平對於鄧力群「反自由化」的堅定立場是欣賞的（如毛澤東欣賞江青的左派立場又必須與她保持距離一樣），肯定他那個書面意見「一條一條分開看，每一條都是好的」；只是圈掉胡喬木引那段「中央領導同志（即陳雲）警告資本主義剝削制度可能捲土重來」的話。

第二，當時全國改革開放受阻，計委收權、紀委整人，包括任仲夷下台、項南受處分，鄧小平明知背後是陳雲，因避免擴大與陳雲的分歧不願明言。但為了挽救經濟，又迫使鄧小平在那樣一種形勢下支持胡耀邦、趙紫陽繼續推進改革開放。

第三，鄧小平雖然贊成通過胡耀邦的精神文明決議，並不表明他恢復了對胡耀邦的信任。二鄧對話的下半段，鄧小平徵詢鄧力群「對一些人的觀察」，提出胡啟立、李鵬、喬石、趙紫陽，都是他心中考慮取代胡耀邦的人選。二鄧對這些人的看法相當一致。但當時鄧小平還不想立刻換掉胡耀邦，是為一年後的十三大打算。

九月二十日，政治局擴大會議原則通過精神文明決議草案，提交十二屆六中全會討論。由於鄧小平明確支持胡耀邦、趙紫陽聯名信，拒絕胡喬木、鄧力群修正稿，原來支持過胡喬木、鄧力群修正稿的專政派、包括胡喬木自己，都發言表示肯定決議稿，唯鄧力群一言未發（鄧力群列席政治局擴大會議，無表決權）。

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爭持不下

九月二十八日，十二屆六中全會爆發了一場出乎鄧小平意料的爭論。當時胡耀邦主持會議，工作人員讀完決議草案後，胡耀邦問：同志們有意見沒有？

陸定一站起來說：「我對這個決議很贊成，這個決議寫得很好。有一點意見講一講。在起草這個決議過程中今天第四次提這個意見了：第十四頁第十二行有一句話，『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等等，我主張『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這幾個字刪掉。這個『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來歷，是一九五六年我們黨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時，蘇聯方面說我們這個方針是資產階級自由化。以後到了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有一個文件，題目是兩個字：《通知》，說『二月提綱』是彭真一個人搞的，是背?康生和其他人搞的，是資產階級自由化，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放，就是只讓資產階級放，不讓無產階級放。一九六七年，《人民日報》登了一篇大文章，是反對我的，

批判我資產階級自由化，證據是我在中南海懷仁堂對科學家、文藝界講『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講了好幾個自由：批評的自由，反批評的自由，保留意見的自由，信教的自由，不信教的自由等等，這個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經過情況就是這樣。我覺得文件去掉『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這幾個字，對於這個決議絲毫沒有損害。只有一個好處，就是不同那些錯誤的東西混淆在一起。」

胡耀邦對決議稿中保留這幾個字作了解釋，說明是按照鄧小平的定義，「資產階級自由化」指「否定四項基本原則，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個範圍。

接?萬里發言贊成陸定一意見，主張取消這幾個字。陸定一、萬里發言都博得會場一部分人掌聲支持。

然後，楊尚昆、薄一波發言，反對去掉這幾個字，也博得會場另一部分人掌聲支持。

這時鄧小平說話了。鄧小平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為什麼？現在群眾中有一種思潮，這種思潮就是自由化。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們第一件做了什麼事？就是人大通過決定取消憲法的一條，叫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為什麼首先做這件事？就是說明現在有一股思潮，如果搞自由化，就不可能有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搞自由化本身要破壞我們安定團結局

面的。看來，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管什麼這裡用過，那裡用過，無關緊要，現實政治要求我們寫這個。」

鄧小平講完，政治局常委趙紫陽、陳雲、李先念均發言主張保留。

胡耀邦說：「保留對我們當前局勢有利，以後實踐證明這個名詞不恰當，再重新考慮」。最後胡耀邦提請全會表決，一致通過。

鄧反自由化講話標誌與胡決裂

鄧小平這篇反「自由化」講話導致中國政治氣流的大變動。原來鄧小平的注意力，在防止鄧力群代表的思潮把中國政治氣流往左拉，阻滯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陸定一的發言使鄧小平的注意力轉向「自由化」思潮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而在鄧小平看來胡耀邦對「自由化」思潮的「軟弱」比鄧力群的「左」更危險。

這篇講話也是鄧小平與胡耀邦最後決裂的標誌。鄧小平在他的講話中提出了一個重大政治原則問題：

—粉碎四人幫以後第一件做了什麼事？

對胡耀邦來說，這第一件事，就是真理標準討論，終結「兩個凡是」。糾正冤假錯案，糾正歷史

錯誤。

而對鄧小平來說，這第一件事，已變成「決定取消憲法的一條，叫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

如果當初真是鄧小平說的那樣，華國鋒、葉劍英在「粉碎四人幫以後第一件事」就是決定取消「四大」，恐怕就沒有後來的真理標準大辯論，沒有後來的西單民主牆，沒有後來的糾正歷史錯誤，也沒有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轉折和鄧小平復出掌權了。

一九八六年底的鄧小平已經自己否定了自己。鄧小平的「四項原則」，就是華國鋒的「兩個凡是」。差別只在華國鋒搞毛的「凡是」，可以糾正；鄧搞自己的「凡是」，同毛一樣無法自己糾正。這就是鄧小平的悲劇。

胡耀邦下台後，陸定一曾對他的發言產生的後果向胡耀邦表達歉意。胡耀邦對陸定一說：「我是由衷贊成你的主張的，只是在那個場合，不便多說」。

中國人民的命運悲劇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上那場意料之外的大辯論引發出鄧小平一篇「反自由化」的即席講話，改變了全黨、全國的政治氣

流。《精神文明決議》剛一誕生，生命即告終結。一場比「清除精神污染」更大規模、影響更深遠的「反自由化」之戰，已蓄勢待發。

胡耀邦主持起草《精神文明決議》，原來準備避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提法。胡耀邦想出了「一個中心，三個堅定不移」的新提法：「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定不移地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堅定不移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堅定不移地加強精神文明建設。」

《決議》強調精神文明建設的開放性，指出：「拒絕接受外國的先進科學文化，任何國家任何民族要發展進步都是不可能的；必須下大決心用大力氣，把當代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先進科學技術、具有普遍適用性的經濟行政管理經驗和有益文化學到手，並在實踐中加以檢驗和發展；不這樣做就是愚昧，就不能實現現代化；對外開放作為一項不可動搖的基本國策，不僅適用於物質文明建設，而且適用於精神文明建設。」這就實際否定了「清除精神污染」。

《決議》突出了政治民主化的主題，指出「高度民主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體現」；肯定了「在人類歷史上，在新興資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反對封建專制制度鬥爭中形成的民主和自由、平等、博愛等觀念，是人類精神的一次大解放。」強調對待學術和藝術問題，「要遵守憲法規定的原則，實行學術自由，創作自由，討論自

由，批評和反批評的自由。」

由於《決議》草稿在北戴河討論時遭到王震、薄一波、鄧力群、胡喬木等專政派的圍剿，胡耀邦為聯合趙紫陽爭取鄧小平支持，不得已在第五部份加進那句引起陸定一堅決反對的話：「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主張資本主義制度，是根本違背人民利益和歷史潮流、為廣大人民所堅決反對的。」

加進這句話，是一種妥協，目的是爭取鄧小平的支持。因為只有鄧小平能封住鄧力群、胡喬木和其他專政派的嘴，讓《決議》在全會通過。胡耀邦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認為只要決議通過，就可以借助整個決議的改革和開放精神，在中國實現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等人類普世價值，克服專制制度下人的不自由狀態（也就是周揚講的「異化」），使中國人解放成為「人」（自由的人，社會的主人，國家的主人，自己的主人）。這是建設物質和精神文明的根本目的，也就是實現馬克思講的未來社會目標：「自由人的聯合體」。

不同結果的兩種抉擇

胡耀邦的理想主義並非沒有根據。那時正是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洶湧澎湃，從南歐經過拉丁美洲、非洲、湧向亞洲之際。

就在這一年，蔣經國於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九日）提出「政治革新」案。就在同一年，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民主進步黨在台北圓山大飯店成立，國民黨專政派要禁，蔣經國指示李登輝「採取溫和態度，以人民、國家安全為念，在不違反國策、憲法規定範圍內，研究組黨的可能性。」緊接著，十月五日，蔣經國在國民黨中常會上說：「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因應這些變遷，執政黨必須以新的觀念，新的作法，在民主憲政的基礎上，推動革新措施。」十月七日，蔣經國接見《華盛頓郵報》發行人凱薩琳·葛蘭漢（Katherine C. Graham）時說，「台灣決定解除戒嚴。」

當時總統府秘書長沈昌煥，提醒蔣經國：「解除黨禁有一天國民黨要失去政權的。」蔣經國回答，「天下沒有永遠的執政黨。」

在歷史浪潮面前，順應浪潮前進，還是逆著潮流倒退？亞洲台灣海峽兩邊的黨國各自作了不同的選擇。蔣經國的國民黨黨國選擇了順應歷史潮流前進，鄧小平的共產黨黨國選擇了逆著歷史潮流倒退。因此蔣經國和他的繼承者李登輝，從一九八○年代到一九九○年代完成了台灣的民主制度轉型；而鄧小平拋棄了他選擇的改革派繼承者胡耀邦和趙紫陽，使中國成為抵制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最後一個共產專制堡壘。這不只是胡耀邦、趙紫陽的命運悲劇，也是中國人民的命運悲劇。

鄧怒稱反自由化要追加**50**年

十二屆六中全會之後，專政派包圍了鄧小平，在鄧小平支持下再度發動倒胡。一九八六年十月，鄧小平指定薄一波、楊尚昆、王震、姚依林、宋任窮、伍修權、高揚七人小組，以徵詢十三大人事安排為名，向各地搜集胡耀邦「對四項基本原則有時講有時不講」、「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等材料。七人小組是背著胡耀邦幹的，胡耀邦完全不知情。在北京舉行的社會科學規劃會議上，胡耀邦還說：

「這幾年，棍子在頭上揮舞了一下，總算沒有打下來。」

李洪林插話：「怎麼沒有打下來？有人被開除黨籍。」（指阮銘）

吳明瑜插話：「還有被撤職的哩！」（指王若水）

蘇紹智插話：「還有人被趕出北京！」（指郭羅基）

胡耀邦說：「好，你們打報告來，我來批！」

胡耀邦不知道，棍子已經在他頭上舉起，正要打到他自己了。

專政派的政治嗅覺比理想主義者胡耀邦靈敏得

多。他們從九月二十八日十二屆六中全會那場爭論中，嗅出鄧小平像在一九八○年十二月中央工作會議時一樣，又搖擺到他們一邊來了。他們早已把《精神文明決議》摔到一邊，決心再次煽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高潮。他們推舉曾被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稱做「一門炮」的王震發難，率先在中央黨校印發鄧小平九月二十八日那篇「反自由化」講話，人手一份。然後在全校大會講話。

王震說：「十二屆六中全會的精神，就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小平同志的重要講話。有人故意不傳達，想隱瞞。力群、喬木同志向小平同志作了匯報。小平同志說，我在六中全會講反自由化要反二十年，有人不愛聽，現在再加五十年，一共七十年，反到下世紀中葉。」

王震這門炮通過來自各地的黨校學員，向全國發出倒胡信號。王震說的「有人」，就是指胡耀邦。胡耀邦向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佈置傳達十二屆六中全會時，強調主要傳達全會通過的《精神文明決議》精神，不必將會上的爭論下達，既不必傳達陸定一的意見，也不必傳達反對陸定一的意見，避免分歧繼續擴大，以便集中精力討論決議本身。

鄧力群、胡喬木正好利用這一點，向鄧小平「匯報」胡耀邦「故意不傳達」鄧的「反自由化重要講話」。鄧小平果然怪罪胡耀邦：你「不愛聽」我反自由化嗎？我「再追加五十年，反到二○五六年」！

接著，上海、南京、合肥、武漢、杭州、北京等地相繼發生學生運動。開始起因是對學校領導和教學、生活方面的不滿，逐步發展到提出政治改革和民主化、反腐敗等訴求。專政派看到時機來臨，蓄意將學生運動同胡耀邦和「自由化知識分子」放到一起打。

鄧下決心提前倒胡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鄧小平召集薄一波、楊尚昆、王震、鄧力群、胡喬木、彭真、余秋里七人到家中開會，「分析學潮」；一致認為是「胡耀邦姑息自由化思潮，領導渙散軟弱」的結果。

鄧小平原來打算到「十三大」時換下胡耀邦，此時下決心立即倒胡了。十二月三十日，鄧小平把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李鵬、何東昌找到家中，藉學生上街遊行發表嚴厲講話。鄧小平說：「學生鬧事，從問題的性質來看，是很重大的事件。凡是衝天安門的，要採取堅決措施。這不是一個、兩個地方的問題，也不是一年、兩年的問題，是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朝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

方勵之這樣的人留在黨內幹什麼？要開除！上海的王若望，早就說要開除，為什麼一直沒有辦？上海群眾中傳說中央有個保護層，從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論戰線上是軟弱的，喪失了陣地，對於資

產階級自由化是個放任的態度。

四項基本原則必須講，人民民主專政必須講。不能搬用資產階級的民主，不能搞三權鼎立那一套。我經常批評美國當權者，說他們實際上有三個政府。這種辦法我們不能採用。沒有專政手段是不行的。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當然，使用時要慎重，抓人要盡量少。但是如果有人要製造流血事件，你有什麼辦法？我們的方針，是首先揭露他們的陰謀，盡量避免流血，不下決心是制止不了這場事件的。

在六中全會上我本來不準備講話，後來我不得不講了必須寫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那一段話，看來也沒有起什麼作用，聽說沒有傳遞。」

鄧小平這篇講話，一是逼迫胡耀邦下台；二是主張對學生運動採取鎮壓手段，否定胡耀邦的疏導方針。

王震聞風而動，第二天（十二月三十一日）在中央黨校全校大會上講：「你有三百萬大學生，我有三百萬解放軍，我要砍他媽的一批腦袋！你們知道我是誰嗎？我就是關帝廟中那個拿大刀的周倉，不信來試試看！」王震講話中還痛罵知識分子，稱巴金是「民族敗類，社會渣滓。」

二○○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爭鳴》第374期 2008年12月號

鄧小平帝國三十年（１０）

那次學運避免了流血，是由於胡耀邦採取了最後措施。那時鄧小平說：「誰敢到天安門廣場，來一個抓一個！」一九八七元旦公安部門抓了到天安門廣場的學生，當晚學生又冒大雪進入天安門廣場要求放人；公安部門迅速釋放被捕學生，把遊行的學生也用卡車送回學校，使事態得以和平結束。

胡耀邦做完這最後一件事，第二天（一月二日）寫信給鄧小平提出辭職。

鄧交權紫陽是權宜之計

一九八七年一月四日，鄧小平忘了是星期日。一早起來，催子女去上班，子女說星期天不上班。原來鄧小平要召開秘密會議，請來了趙紫陽、薄一波、楊尚昆、王震、彭真，決定要胡耀邦下台。

那就是所謂「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實際上只有鄧小平、趙紫陽兩名常委出席。胡耀邦未被通知開會，陳雲、李先念未出席。事先鄧小平曾派楊尚昆坐軍機冒著大霧飛到上海接李先念回來開會，李先念拒絕，對楊尚昆說：「急急忙忙幹什麼？耀邦可是個陽人啊。」（指胡耀邦不搞陰謀，那麼誰在搞陰謀呢？）

胡耀邦的職務是中央委員會選舉的。鄧小平既不開中央全會，也不援華國鋒的先例，開政治局全體會議討論。華國鋒辭職時，中央政治局於一九八○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五日連續開九次會議討論，作出三項決議：

（一）向六中全會建議，同意華國鋒同志辭去中央主席、軍委主席的職務。

（二）向六中全會建議，選舉胡耀邦同志為中央委員會主席、鄧小平同志為軍委主席。

（三）在六中全會前，暫由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的工作，由鄧小平主持中央軍委工作，都不用正式名義。

在通過三項決議時，華國鋒也舉手同意。政治局會議還決定，當需要時，仍由華國鋒以正式名義接見外賓。

非法倒胡的「生活會」

這回鄧小平卻完全不顧正當程序，只是找幾個親信老人到家裡，就決定胡耀邦下台，由他指定趙紫陽、薄一波、楊尚昆、萬里、胡啟立組成「五人小組」，召開「生活會」解決胡耀邦問題。

所謂「生活會」，就是對胡耀邦的批鬥會。事先由薄一波、楊尚昆佈置了一幫打手，如鄧力群、

胡喬木、姚依林、余秋裡、王鶴壽等，在會上作批鬥發言。

據鄧力群說，會前薄一波、楊尚昆把他找去，說學生鬧事，是胡耀邦的錯誤引起的惡果，中央要開一個「生活會」。要鄧力群準備一個揭發胡耀邦的發言。鄧力群說：「更多的事情胡喬木知道。」薄一波、楊尚昆說：「他是他，你是你，我們找你，是要你做好準備，講你知道的事」。

「生活會」就是這樣準備的。不是政治局委員的，有備而來，充當打手。而政治局委員如習仲勳，事先一無所知，只通知他來開會，不知道開什麼會。習仲勳一進會場，看到這麼一副架勢，就質問：「這樣的會為什麼事先不告知？」其實只是不告知習仲勳這樣的政治局委員而已，習仲勳不但是政治局委員，而且是書記處常務書記，人又在北京。開這樣的會，瞞著習仲勳似乎太荒唐了，只好通知他來。習仲勳又是個正直的人，佈置打手之類的骯髒勾當不能讓他知道，所以就出現這個場面。

打手們有備而來。余秋裡開頭炮，罵了胡耀邦半小時，內容空洞無物。接著鄧力群講了兩個半天，六大罪狀，洋洋數萬言，都是老一套黨八股。然後是姚依林講經濟問題的長篇發言，批判胡耀邦不懂經濟，又不好好學習陳雲經濟思想；歷數胡耀邦搞高指標、高速度、高消費的錯誤，給下面製造壓力，造成經濟混亂。王鶴壽則負有特殊使命，會後到胡耀邦家裡「摸態度」。

王鶴壽在延安時期同胡耀邦、陶鑄關係好，人稱「桃園三結義」。但王鶴壽沒有胡耀邦、陶鑄那種正直性格，是個小人，早在一九八三年「倒胡打周」時就被鄧力群他們拉過去了。胡耀邦卻渾然不覺，王鶴壽來時，說了些心裡話，被王鶴壽在會上端了出來。王鶴壽說：「胡耀邦目無中央，鄧小平、陳雲說了要開除方勵之、王若望，陳雲說了要處理福建假藥案，胡耀邦都頂著不辦。我去看他時，還說沒想到要把他搞倒搞臭，很傷心。說明胡耀邦態度不端正。」

紫陽發言尖銳 耀邦痛哭失聲

趙紫陽的發言雖不長，但最尖銳。他說：

「耀邦喜歡標新立異，喜歡一鳴驚人，不受組織約束。現在老人還在，你就這樣。將來氣候變了，你的權威更高了，可能成為大問題。我過去也想過，雖然我們現在合作得很好，將來到了這種情況能否合作得好，就很難說了。劉賓雁、王若望這些人那麼狂妄，你胡耀邦為什麼對這些人這麼寬容，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另有一種可能，是你要在國內、國外維持開明的形象。反正黨的格局已經定了，小平同志今年八十三了，現在如果你還不能自由行動的話，將來你是可以自由行動的。他們將來有你這個靠山，不要緊。即使你現在還不能完全保護他們，他們寄希望於你。」

趙紫陽又說到一九八四年他給鄧小平寫的一封信，希望鄧小平和陳雲健在時，認真解決黨中央一級的民主集中制問題，趙紫陽說，「當時就已感覺到，胡耀邦不遵守紀律，等到格局一變，小平、陳雲不在了，黨內老人不在了，我們兩個無法共事下去，那時就要辭職了。耀邦同志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在今天黨內很多老同志都在的情況下，他還這樣不遵守紀律；等以後不在了，誰也沒有辦法。現在還不能完全自由行動，對小平、陳雲主要是小平同志這裡不能不有所考慮。一旦情況變了，可以自由行動，不受任何約束」。

趙紫陽的話厲害在哪裡？在一般人眼中，胡耀邦為人直率，不弄權謀。照李先念的說法：「耀邦可是個陽人啊。」但按趙紫陽的說法，胡耀邦是別有用心，對人寬容，在國內、國外維持開明形象，是在積累實力，圖謀將來老人不在了，自己不受任何約束自由行動。那不就是做獨裁者嗎？那時趙紫陽就只有辭職了。這種說法最能打動老人猜忌之心，也最讓胡耀邦傷透了心。那天（一月十五日）開完會，胡耀邦走出會場，坐倒在台階上痛哭失聲。

第二天，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鄧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鄧小平說：「今天的會，耀邦不便主持，我主持。會議就是通過《公報》，其他事都不談，到會的顧問委員可以舉手。」這就是說，「生活會」已批鬥結束，政治局無需再討論，政治局委員們跟著老人（如主持「生活會」的薄一波，不是政治局委員，連中央委員都

不是）舉手通過胡耀邦辭職下台的《公報》就是。所謂「公報」，就是宣佈「會議一致同意胡耀邦辭去黨中央總書記職務」。當天在中央電視台向全國公告。

倒胡《公報》遭強烈抗議質問

一九八七年胡耀邦下台，比一九七六年鄧小平下台在國內外產生的衝擊更大。因為鄧小平下台時的中國是封閉的，胡耀邦下台時的中國已經開放。就在通過《公報》的第三天（一月十九日），留學美國的一千名學生和學者共同簽署《致中共中央、國務院公開信》，在海外各大媒體發表。《公開信》指出：

「胡耀邦為思想解放運動，平反?假錯案，開拓改革局面，以及在思想文化領域創造寬鬆氣氛都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他的去職將極大地損傷全國人民進行改革與現代化建設的積極性，使我們感到震驚和不安。我們認為，近來事態的發展，是與三中全會以來的基本國策背道而馳的，並使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等權利受到嚴重侵犯，發展下去會斷送我國的經濟、政治改革。我們強烈期望黨和政府堅持改革，反對倒退，堅持民主法治，反對以言治罪。出於對祖國的責任感，我們認為不能不向中央和國務院表達我們的心聲。」

黨內反應同樣強烈，紛紛質問：「十三大就要召?，中央究竟出了什麼問題，要用這種方式倒胡

？」中央無法應付，薄一波就讓胡喬木、鄧力群趕快炮製材料，把「生活會」上的批鬥發言拼湊成胡耀邦的「十個問題」作為「中央文件」下發。因為內容空洞無說服力，自三月至五月又陸續發下去五個「補充材料」，仍無補於事。黨內各系統的傳達內容，口徑也不一致。楊尚昆在軍隊的傳達最出格，竟把胡耀邦說成向鄧小平「搶班奪權」，比喻成同林彪一樣。楊尚昆的講話稿曾印發軍隊高級幹部，因毫無事實根據，影響極壞，被迫立刻收回銷毀。

毛鄧交班結局不同

鄧小平怎麼辦？

以毛為師，毛規鄧隨。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廢黜鄧小平，不把權力交給虎視眈眈、等著掌權的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們，卻交給了華國鋒。因為毛瞭解江青他們只會鬥爭別人，治不了國。

一九八七年鄧小平廢黜胡耀邦，也不把權力交給虎視眈眈、等著掌權的胡喬木、鄧力群、王震們。那時王震赤裸裸對鄧力群說：「我這個人就要掌權，就是要權啊！沒權你就什麼事情也辦不了！」

但鄧小平看他們，正像毛澤東看江青他們一樣，靠他們批鬥別人行，靠他們掌權治國卻不放心。對胡喬木，當年胡耀邦提名他當宣傳部長接替了張

平化，鄧小平都不同意，鄧小平說：胡喬木是軟骨頭，又無行政能力，只是一枝筆。對鄧力群，鄧小平認為他只有四項原則、沒有改革開放，把國家的政策方向往「左」拉，當然不能讓他治國。至於王震，只是「一門炮」，在倒胡打周時放放炮而已。對這些幫他倒胡打周、渴望權力的「功臣們」，鄧小平並未論功行賞，卻把權力交給了趙紫陽。這是鄧小平無可選擇的選擇，是一種權宜之計，同當年毛澤東把權力交給華國鋒時差不多。因為在鄧小平當時的視野裡，胡啟立、喬石、李鵬這些「第三代」，似乎還不夠做「核心」的條件，那就只能交給趙紫陽作為過渡了。

然而毛澤東和鄧小平兩人交班的結局不同。

一九七六年，八十三歲的毛澤東廢黜了七十二歲的鄧小平。十一年後，一九八七年，八十三歲的鄧小平也廢黜了七十二歲的胡耀邦（鄧比毛小十一歲，胡比鄧也小十一歲）。

毛在把權力交給華國鋒後說過那樣一段話：「和平交不成就動盪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毛澤東不會料到：他去世後不到一個月，「華主席一舉粉碎四人幫」，兩年後又把權力和平交給被他兩度廢黜了的鄧小平，都沒有「血雨腥風」。

而鄧小平呢？被他廢黜的中國理想主義領導人胡耀邦兩年後先他而去。鄧小平在胡耀邦去世後掀

起一場震驚世界的「血雨腥風」，一以抵擋住逼近中國的「國際大氣候」第三波全球民主化浪潮，二以消滅天安門廣場的「中國小氣候」學生民主運動。

在這場「血雨腥風」中，鄧小平廢黜了他的第二個接班人趙紫陽，從此把中國的改革開放同國際國內的自由民主潮流徹底拉開，在毛澤東封閉式共產奴役制度的原有基礎之上，建構成他的開放式共產奴役制度的鄧小平帝國。

這就是中國人民的命運悲劇。

二○○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爭鳴》第375期 2009年1月號

鄧小平帝國三十年（１１）

血雨腥風中再換接班人

胡耀邦下台，趙紫陽任代理總書記後，於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八日與二十九日發表了兩次講話。

一月二十八日是舊歷除夕，趙紫陽在中南海召集中央各部委和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共二百多名高級領導幹部，作了一次內部講話。他說：

「中央在一九八四年已經察覺胡耀邦不行，想去掉他，考慮到十二大開過不久，過早解決這個問

題對穩定大局有影響，所以準備在十三大解決，更自然些。這次學生鬧事，胡耀邦看到了自己造成的惡果，痛哭流涕提出辭職。在京政治局常委認為，現在這種情況下再由胡耀邦出面去解決學生問題已不適當，所以必須提早讓他下來。這也不是說胡耀邦做的事都不對，他當組織部長期間平反冤假錯案是正確的，老幹部至今承認這點。但是他對反自由化態度曖昧。胡耀邦自己承認當了壞人的保護傘，很痛心。他一月二日提出辭職，說自己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公報只說在重大的政治原則問題上『失誤』，極其寬宏。這次對胡耀邦的處理，是歷史上黨內鬥爭最完美的一次。」

第二天，一月二十九日，舊歷新年元旦，趙紫陽在團拜會上講話。他說：

「改革、開放、搞活，講得最早、最多、最深刻的，是鄧小平同志。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講得最早、最多、最深刻的，也是鄧小平同志。他是在深入研究中國實際的過程中提出這兩個基本點的。我們大家都應當好好學習小平同志關於這兩個方面的論述，這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真諦，是三中全會以來路線的基本內容。」

這兩篇講話，帶來了鄧小平與趙紫陽之間一年多的短暫蜜月。鄧小平最欣賞的，是趙紫陽對「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作了重新詮釋，提出「兩個基本點」的新概念。趙紫陽說：

「現在，『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引號是原有的）已經成為全國人民最親切的政治概念，但並不等於都已全面深刻地理解了它的含義。那麼，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究竟是什麼呢？中共中央認為，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就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條路線的基本點是兩條：一條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條是堅持改革、開放、搞活的方針。兩者互相聯繫，缺一不可。不講四項基本原則，改革、開放、搞活就沒有方向，沒有保證。不講改革、開放、搞活就不可能迅速發展社會生產力，就談不上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只講一條，不講另一條，不符合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

大家記得，胡耀邦下台之前，包括鄧小平自己，都習慣用「三中全會路線」的提法，把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為「中國歷史的偉大轉折」。但大家也都知道，鄧小平那篇「三中全會主題講話」，是為適應當時形勢，廢棄了胡喬木為他精心起草的稿子，臨時讓胡耀邦另組班子替他草成的「急就章」，講的是思想解放和民主，既沒有「四項基本原則」，也沒有「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鄧小平提出他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大戰略，是在三個半月之後（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胡喬木稱之為「馬克思主義者與自由化份子分道揚鑣的起點」。所以趙紫陽為鄧小平的「兩個基本點」路線加上（三中全會）「以來」二字，就比較「完整，準確」了。

專政派要消滅民主改革力量

但鄧小平與趙紫陽的「蜜月」又注定只能是「短暫」的。因為「鄧胡趙」體制破裂之後，中國的政治格局與力量對比已發生根本變化。

第一，在專政派清算胡耀邦「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過程中，中共內部以人民的自由、平等、幸福為改革目標的民主改革派被大量整肅與邊緣化。從中央的習仲?、李昌、李銳、朱厚澤，到地方的項南、任仲夷，均被迫離開改革崗位，由專政派指派的特權腐敗官僚接替，導致「改革」變質為特權官僚侵吞國家資產、壓搾人民血汗的惡政。

第二，專政派並不滿足於胡耀邦下台後的權力再分配；為繼續擴張權力，專政派發動的全面清算最終必然把矛頭集中於趙紫陽。曾經是「凡是派」主將之一的熊復說：「從理論務虛會開始，這八年來我似乎做了一個噩夢，在胡耀邦縱容下，自由化份子製造了三場混亂：第一場實踐標準討論，打?解放思想旗幟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第二場是周揚提出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對社會主義制度懷疑動搖；第三場是陸定一反對反自由化。八年來，馬列主義受壓，這股惡氣今日始出。」另一名反對周揚人道主義與異化觀的急先鋒林默涵說：「自由化不只是一股思潮，而且是一股勢力，我們今天不消滅這股勢力，總有一天我們要被他們倒掛在電線桿上，像匈牙利事件時那樣。」

鄧力群認為他手下這兩名打手的說法，不足以把目標從胡耀邦轉向趙紫陽。他進一步提出「反自由化三段論」。鄧力群說：「自由化思潮氾濫，第一段是思想政治領域，第二段是自由化侵入經濟領域，第三段是形成代表資產階級的政治勢力。」第一段指胡耀邦，第二段、第三段指趙紫陽。鄧力群稱趙紫陽是「資產階級政治勢力的代理人」。他說：「有一次李先念問陳雲，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講黨內有個走資派，犯了錯誤；但是從這幾年看，趙紫陽像不像一個走資派呢？陳雲說，什麼像不像，他就是走資派，他的思想，他的生活，他的政見，證明他是地地道道的走資派。」

陳雲是中共黨內最頑強的斯大林主義專政派。毛澤東批評他「右」，只因為他堅持斯大林高度集權的「有計劃、按比例」統制經濟，不同意毛澤東不按計劃、比例的「高指標」。他反華國鋒、反胡耀邦、反趙紫陽，就是要清除專政派奪權的障礙，讓鄧力群當總書記，姚依林當總理，王震當國家主席，徹底消滅中國的民主改革力量。

第三，胡耀邦下台，標誌鄧小平的政治立場，大幅度向專政派傾斜。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六年的八年，鄧小平反覆在「兩個基本點」之間玩弄平衡術，逢雙強調改革開放，逢單強調反自由化，使鄧力群得出「逢雙自由化氾濫，逢單馬克思主義者揚眉吐氣」的公式。直到十二屆六中全會前鄧小平與鄧力群談話，要他支持胡耀邦的《精神文明決議》

，仍是平衡術的運用。但在十二屆六中全會上突然變卦，大講反自由化，會後全力支持專政派倒胡，自己向楊尚昆說出「這幾年我如果有錯誤，就是瞎了眼，看錯了胡耀邦」這樣的話，表明鄧小平從此已打破平衡。這意味?鄧力群把黨的路線向「左」拉，抵制改革開放，鄧小平可以容忍；胡耀邦堅持改革開放，對反自由化「渙散軟弱」，鄧小平絕不容忍，非去之不可。因為鄧小平認為，前者是經濟領域發展的快慢問題，後者是共產黨專政制度的存亡問題。

中共十三大後趙紫陽陷於孤立

在這樣一種情勢之下，趙紫陽的處境的確十分嚴峻。那時政治局常委會已停止運作。書記處會議上，姚依林、胡喬木、鄧力群的專政派聯盟處於優勢，咄咄逼人。趙紫陽只得採取先找鄧小平請示報告，獲得鄧小平支持後再提交書記處的工作方式。

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八日，趙紫陽到鄧小平家中口頭匯報三個月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中「左」的傾向，包括鄧力群「把反自由化擴大到經濟領域，藉口反自由化否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開放路線」，王忍之的「第二次撥亂反正論」，熊復的「噩夢論」等。趙紫陽說：「這樣下去，我無法搞經濟，無法繼續改革。」

鄧小平表示支持趙紫陽，要他準備一篇講話糾正「左」的思潮。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三日，趙紫陽

在宣傳、理論、新聞、黨校幹部會議上講話，對專政派展開全面反擊。

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大的報告，也是草擬出《十三大報告大綱的設想》，先交鄧小平審閱，得到鄧小平批示「這個設計好」，才把自己的《設想》和鄧小平的批示同時報送書記處，使專政派難以下手阻撓。

中共十三大是鄧小平與趙紫陽短暫蜜月的高潮。趙紫陽《十三大報告》中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兩個基本點」的設計，深得鄧小平的讚賞，直到鄧小平與趙紫陽決裂之後，鄧小平仍多次重申，「十三大報告一個字都不能動」。

十三大有一個振奮人心的插曲，是鄧力群的落選。鄧小平和陳雲原來安排鄧力群在十三大進政治局，但十三大在選舉中央委員會之前進行一次差額預選，預選的候選人比委員名額多出百分之五，即十名。結果鄧力群落入被差掉的十名之中，後來被安排進等額選舉的顧問委員會當常務委員，又因得票不足半數落選。

專政派因此遷怒於趙紫陽。十三大之後王震到了珠海，住進「元首套房」，號稱「養病」，邀集老人們到他那裡「議政」。王震說：「鄧力群同志是我們黨內理論水平最高的，反自由化最堅決的；還有薄一波同志，是毛澤東、周恩來時期黨中央的主要領導人，馬列主義水平高。他們兩個，一個落

選，一個少了三分之一選票，就是因為他們批判胡耀邦起了主要作用，支持趙總理，他們的選票是為趙總理丟的。」

十三大後的形勢對趙紫陽可說是急轉直下。原來鄧小平與趙紫陽商定的政治局常委是七人：趙紫陽、萬里、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田紀雲。專政派在最後關頭反掉了改革開放的堅定支持者萬里和田紀雲。剩下五人，李鵬、姚依林屬於專政派；喬石、胡啟立原是胡耀邦部下，在專政派反胡耀邦鬥爭中立場搖擺，胡啟立還被鄧力群抬出來同「自由化」的朱厚澤對比，表揚他「態度轉變好」。這樣一個班子在專政派壓力下顯然難以把改革開放堅持下去，趙紫陽最後陷於孤立是勢所必然。

專政派對趙紫陽的鬥爭策略在十三大後也有所改變。鄧力群發現趙紫陽在經濟領域的「自由化」主張與鄧小平相通，鄧小平又欣賞趙紫陽的「兩個基本點」，因此批經濟領域「自由化」批不倒趙紫陽。鄧力群認為必須把重心轉向挑撥趙紫陽與鄧小平的關係這個「要害」。

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訪華時，趙紫陽送他一部《河殤》拷貝，說「值得一看」。鄧力群即以此為「突破口」。他說：「趙紫陽支持的《河殤》提出了一個新觀點，趙紫陽上台的一年叫『新紀元』。趙紫陽非常欣賞『新紀元』這個說法。首先提出批評的是王震，由林默涵幫王老整理成文章。李先念有

一次見到我，說你對王老文章有什麼意見啊？我說我提了一個意見，要害是『新紀元』的提法。《河殤》裡有兩個『新紀元』。一六四九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是一個『新紀元』，一九八七年趙紫陽當了總書記又是一個『新紀元』。這是用資本主義代替社會主義的『新紀元』，這是反對鄧小平同志代表的黨，大樹特樹趙紫陽新權威的『新紀元』。」

那時知識界有些人，似乎是各行其是地在國內外宣揚「新權威主義」。有人在紀念百日維新失敗九十週年座談會上以「光緒」與「慈禧」暗喻趙紫陽與鄧小平，主張中國現代化需要「乾綱獨斷」的政治強人。還有人接受美國媒體專訪，稱「中國當前最迫切的問題，是把黨政軍全部權力集中到一個領袖—趙紫陽的手中」。香港也出現了《假如趙紫陽是獨裁者》的文章。這些言論與動作，都被專政派搜集起來，送到鄧小平、陳雲和其他老人手中。

全球自由民主浪潮氣勢澎湃

國際上，一九八八是全球自由民主浪潮氣勢澎湃、湧向共產主義國家的一年。六月一日，美國總統列根和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在莫斯科簽訂雙方拆除和銷?中程核導彈的《中導條約》，並就尊重人權、全面控制軍備等議題展開談判，為結束東西方冷戰揭開序幕。六月二十八日，戈爾巴喬夫在共產黨代表會議上宣佈「對政治體制的根本性改革是摧毀中央集權的政府僵化體制及其命令壓迫機制這一官僚巨石」，「蘇聯的變革應沿?深入且持續

的民主方向前進」。他宣佈「釋放全部政治犯」，並將為斯大林大清洗中的遇害者建立一座紀念碑。一九八九年一月六日，數十萬在一九三○至一九五○年代的二十年間斯大林清洗的受害者得到平反。三月二十六日，蘇聯舉行一九一八年以來第一次包括非共政黨的全國性選舉，許多共產黨人被擊敗。被俄共開除的葉利欽在莫斯科選區贏得壓倒性的百分之八十九選票。一些蘇聯共和國開始要求獨立，在斯大林故鄉第比利斯，示威者要求格魯吉亞脫離蘇聯。

東歐局勢比蘇聯更加激盪。一九八八年，戈爾巴喬夫撤走部署在匈牙利的全部核武器。一九八九年一月，匈牙利議會通過法律允許反對黨成立，共產黨四十年的壟斷地位被打破。三月二十八日，共產黨以外的候選人第一次被允許參選議員，匈牙利民主聯盟的候選人擊敗共產黨候選人取得勝利。他們的政綱是「民主、融入歐洲、反對共產主義、保持匈牙利價值。」匈牙利政府開始拆除用以防止匈牙利人逃至奧地利的長達二百一十八英里的安全圍牆。在波蘭，團結工會取得合法地位。共產黨政府與團結工會領袖華里沙於一九八九年四月五日簽訂了一項進行政治、經濟改革的協議。

由此可見，在胡耀邦去世和天安門學生民主運動爆發之前，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已經滾滾而來，席捲歐洲共產黨國家，即將抵達中國天安門廣場了。這將是一次遠比導致胡耀邦下台的一九八六年學生運動更為嚴峻的挑戰，對此鄧小平已有預感。

　　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六日，鄧小平會見美國總統布殊時說：「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穩定。沒有穩定的環境，什麼都搞不成，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掉。如果我們現在十億人搞多黨競選，一定會出現文化大革命中那樣全面內戰的混亂局面。」

二○○九年二月十二日於美國家中

《爭鳴》第377期 2009年3月號

鄧小平帝國三十年（１２）

　　鄧小平是「對外開放」專政派

　　一九八九年三月四日，鄧小平在住地同趙紫陽談話時說：「凡是妨礙穩定的就要對付，不能讓步，不能遷就。外國人要議論，讓他們議論去。中國不能亂，這個道理要反覆講、放開講；不講，反而好像我們輸了理。要放出一個信號，中國不許亂，中國不能允許隨便示威遊行。如果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遊行，什麼事也不要干了，外國資金也不會進來了。我們在這些方面控制嚴一點，不會影響外商來投資，恰恰相反，外商會更放心。」

　　所以認為「八九民運折斷了共和國歷史上具有決定意義的十年改革進程，破壞了中國社會的轉型，改變了中國的發展軌道」；或者認為「鄧小平聽信了李鵬、李錫銘、陳希同的不實匯報作出錯誤決

策」等等，都是沒有弄懂鄧小平的「穩定」哲學。鄧小平的「穩定」哲學與毛澤東的「鬥爭」哲學一樣，靠的都是專政即鎮壓手段，目的都是絕不改變中國共產黨一黨天下的發展軌道；不過一個叫「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一個叫「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而已。誰偏離這個軌道，無論是胡耀邦縱容「自由化」知識份子，或者趙紫陽反對鎮壓學生，都只能下台。鄧小平對此同毛澤東一樣堅定不移。他自己在大屠殺後第一次露面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說得明白：

「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大氣候和中國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只不過是遲早的問題，大小的問題。而現在來，對我們比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們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們經歷的風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關係，他們是堅持對暴亂採取堅決行動的。」

歸根到底，鄧小平與毛澤東、陳雲、王震、鄧力群們一樣，也是專政派。區別只是鄧小平是主張「對外開放」的專政派。鄧小平認為對內專政，「控制嚴一點，外商會更放心」。一點不錯，這正是鄧小平的一黨專政帝國在他死後仍能維持至今，而且成為華爾街的「負責任合夥人」（Responsible Stakeholder）的秘密。那位在血雨腥風中說出「殺二十萬人，換取二十年穩定」的太子黨，姚依林的女婿王岐山，二十年後的今天，不是已成了與美國財政部長鮑爾森平起平坐的大官

僚了嗎？

保持鄧小平帝國的「穩定」

一九八○年八月，鄧小平在答意大利記者法拉奇問時，曾批評毛澤東：一個領導人，自己選擇自己的接班人，這是封建主義的做法，改革制度也包括這一點。然而鄧小平自己也沿襲毛澤東的封建主義做法。離更換華國鋒僅僅八年，離更換胡耀邦僅僅兩年，鄧小平又要更換接班人了。

這一回，鄧小平仍然不選擇陳雲、王震屬意的鄧力群，也不選擇已經是政治局常委的堅定專政派李鵬、姚依林，因為他們是對外封閉的專政派。鄧小平要選擇的，是同他一樣對外開放的專政派，好把鄧小平帝國對內專政、對外開放的大戰略繼承下去。

這個人就是江澤民。鄧小平選中他，首先是根據政治標準。鄧小平說過：「過去兩個總書記都沒有站住，都在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上栽了觔斗。」而江澤民，風波來臨時在《世界經濟導報》自由化問題上同趙紫陽對?干，表明他是夠格的專政派。他又不像李鵬、姚依林死抱陳雲的「經濟鳥籠」，不至於斷送鄧小平的對外開放。於是在血雨腥風中鄧小平冊封江澤民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第三代核心」，並諄諄囑咐李鵬、姚依林「注意樹立和維護」這位「江核心」，「不要不服氣」。

與毛澤東不同的是，毛澤東選擇華國鋒之後五個月就去世了，未料到華國鋒在他死後不到一個月就「粉碎四人幫」，然後自己被鄧小平、陳雲廢黜。而鄧小平觀察與扶持江澤民達八年之久，既幫他同對外封閉的專政派鄧力群們「保持距離」；又幫他解除了楊尚昆、楊白冰兄弟對其掌握軍權的威脅。這就使江澤民得以鞏固其「第三代核心」的權力地位，保持住對內專政、對外開放的鄧小平帝國的「穩定」。

整體而言，除了開頭三年的「經濟滑坡」，「九二南巡」之後鄧小平對江澤民繼承其對內專政、對外開放的大戰略是滿意的，而且為江澤民之後鄧小平帝國的持續「穩定」指定了隔代接班人胡錦濤。

鄧小平與蔣經國的世紀對奕

鄧小平一生最大的遺憾，是他對台戰略的失敗。他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會見戈爾巴喬夫時坦承：

「我這一生，已經做成的事情是，調整了與日本、與美國的關係，也調整了與蘇聯的關係，確定了收回香港，已經同英國達成協議。這是對外關係的參與。對國內工作的參與，確定了黨的基本路線，確定了以四個現代化為中心，確定了改革開放政策，確定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灣問題，恐怕看不到解決的時候了。」

這段話是鄧小平對自己一生成敗的簡明概括。的確，對外對內，鄧小平都是極高明的政治棋手。蘇聯的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美國的卡特、列根、布殊、英國的戴卓爾夫人、日本的中曾根康弘；國內的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鄧力群，誰都未能突破他的意志。鄧小平算來算去，費盡心機，下不贏的對手只有一個，就是他的莫斯科中山大學學弟蔣經國。

鄧小平講這個話時，蔣經國（一九一○──一九八八）去世不久，鄧小平（一九○四──一九九七）又活了八年。但鄧小平已不得不承認，蔣經國生前布下的棋局，他這一生已無法破解。

蔣經國的一生，算得上是個傳奇人物，跨越三個時代：

蘇聯時代　十五──二十七歲，一九二五──一九三七，十二年。

中國時代　二十七──三十九歲，一九三七──一九四九，十二年。

台灣時代　三十九──七十八歲，一九四九──一九八八，三十九年。

若以一生度過的歲月來劃分，前半生（二○一○──一九四九）三十九年在中國和蘇聯，後半生

三十九年在台灣。若扣除童年至少年的十五年成長期，對他人格形成與事業成敗構成主要影響的經歷，在蘇聯和中國各十二年，在台灣三十九年。

這就是說，蔣經國的歷史角色，他的失敗與成功，主要在台灣。特別是蔣介石死後的十三年（一九七五──一九八八），蔣經國不但在台灣歷史上扮演了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而且透過與鄧小平的世紀博奕，對中國與世界留下了不可低估的影響力。這一點迄今尚未被歷史家們充分認識。

蔣經國生命的最後十三年，面對世界和中國歷史的變化，承受了內外沉重壓力：

第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自南歐國家興起，以席捲全球之勢，迅速衝擊到亞洲和台灣。

第二，毛澤東去世，鄧小平掌握權力後，改變中國的全球戰略，從聯美制蘇轉為聯美壓台。

對中國的台灣戰略，現在台灣流行的說法是：「毛澤東『血洗台灣』，鄧小平『一國兩制』，江澤民『三通四流』，胡錦濤『和平發展』。」好像越來越輕鬆，其實是歷史的顛倒。

毛澤東沒有力量，也沒有意願「血洗台灣」；他的「大戰略」是「聯美制蘇」。他臨死前不久（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一日）還對基辛格說：「現在你把台灣還給我，我也不要，因為現在要不得，那

裡反革命份子太多了。等到我上天堂去見上帝，我要同祂講，現在讓台灣由美國代管還比較好。一百年以後，我們就會要了，打仗也得要。」

當時美國的立場，是雙重承認。一九七二年《上海公報》後，一方面美中兩國在華盛頓和北京互設大使級「聯絡處」；另一方面美國繼續保持與台灣的外交關係，駐軍和《共同防禦條約》，也就是毛澤東所謂「讓台灣由美國代管」，不讓日本、蘇聯插足，也不支持台灣獨立，美國政府均予承諾。

這個雙重承認的三角架構，是毛澤東、周恩來的選擇。一九七三年二月，基辛格第五次訪問北京，談判美中雙方如何在對方建立常設機構。基辛格提出四種可供選擇的方案：

（一）貿易使團，類似中日建交前，分別在東京和北京設立的「廖承志辦事處」和「高崎達之助辦事處。」

（二）利益小組（Interests Group），類似美國在古巴設立過的。

（三）領事館。

（四）聯絡處。

基辛格把互派貿易使團作為首選向周恩來推薦，是考慮到對中國不會引起政治上的困難。出乎意

料的是周恩來毫不遲疑地選擇最高一級的聯絡處，而且是相互對等的大使級，人員享受外交特權。

周恩來的選擇使基辛格喜出望外，因為這等於是中國毫不計較美國在同台灣保持外交關係的狀況下，同美國互派外交使團，這是基辛格原來不敢想像的。

原因就在毛澤東「聯美制蘇」大戰略。在那次訪問中基辛格與毛澤東有一百一十分鐘的談話（二月十七日晚十一點三十分至十八日凌晨一時二十分），毛澤東在談話中提出聯合美國及其盟國形成「一條線」，共同遏制蘇聯擴張。基辛格為這次北京之行寫給尼克遜的報告稱：「自從一九七一年七月以來，我們的進展遠比任何人預期或察覺的更為快速而深入。我們現在已經成了心照不宣的盟國。」

毛澤東為「聯美制蘇」，主動擱置台灣問題。基辛格說：「在任何一次會見中，毛澤東從來沒有對台灣問題表示過不耐煩，沒有進行過任何威脅，或把它作為我們兩國關係的試金石。『台灣事小，世界事大』、『我們可以暫時不要他們，過一百年再說吧』、『為什麼這樣匆匆忙忙呢』？這就是毛澤東多次向我們說明的他關於台灣問題的思想。」

鄧小平贏得美國贏不了台灣

一九七八年中國形勢的重大變化，是鄧小平的崛起。在十二月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鄧小

平已經以國務院副總理身份分管外交工作。鄧小平把改變毛澤東的對美、對台戰略，列為他的首要目標。

鄧小平的幸運，是他遇到了美國歷史上最弱的對手，卡特和布裡辛斯基；而鄧小平的不幸，是他遇到了台灣歷史上最強的對手蔣經國。這就決定了鄧小平在台、美、中三方博奕中，贏得了美國，贏不了台灣。鄧小平聯美制台，成功地誘惑了卡特、布裡辛斯基對台「斷交、撤軍、廢約」，打破了毛澤東時代台、美、中三角的平衡；卻在蔣經國「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堅定意志抵抗下，改變不了台灣與共產中國隔海對峙的「現狀」，實現不了「台灣歸回祖國」的「統一」夢。

鄧小平對台、美雙方的判斷錯誤是重美輕台。他過於看重美國對台灣的支配力量，而輕視台灣自身的力量和獨立意志。鄧小平以為，他只要迫使美國對台「斷交、撤軍、廢約」，台灣就會乖乖地聽美國擺佈，除了同他談判「和平統一」別無選擇。

布裡辛斯基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日抵達北京，同中國外交部長黃華會談，一開頭就表明「我們對推進雙方關係正常化已經下定決心」，他將代表卡特總統「盡其所能地加速其進程」。

第二天（五月二十一日）鄧小平接見布裡辛斯基時佯作不知，對他說：「現在的問題是有沒有下定決心？福特總統一九七五年說，如果他連任的話

，會毫不保留根據這三個條件（對台斷交、撤軍、廢約）來完成雙方關係正常化。後來福特總統沒有連任。當然新政府有權重新考慮，我們非常期待有一天卡特總統能夠下定決心。現在我們換個話題吧。」

布裡辛斯基急忙表明：「我已經說過，卡特總統已下定決心。」

鄧小平接著說：卡特總統下了決心，事情就好辦，我們雙方隨時可以簽訂關係正常化的文件。就是三個條件：斷交、撤軍、廢約，都涉及台灣，我們不能有別的考慮，因為這關係到主權。你們要表示你們的希望，這可以；但我們也要表示我們的立場，即中國人民在什麼時候，用什麼方式解放台灣，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指不放棄使用武力）。」

研究中國談判策略的《索樂文報告》（Chinese political negotiating behavior: a briefing analysis）指出：鄧小平使用的是故意質疑對話人，刺激他急於接受中方條件的一種手法。卡特總統在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六日的日記中記道：「布裡辛斯基已由中國回華盛頓，他被中國人壓倒了；我告訴他，他被誘惑了。」

然而卡特沒有糾正布裡辛斯基，他跟著布裡辛斯基被中國人「誘惑」、被中國人「壓倒」了。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在華盛頓和北京同時發表的《美中建交公報》，完全遵循鄧小平提出的條件

，美國完全被「壓倒」。

在美國宣佈同台灣「斷交、撤軍、廢約」前七小時，美國駐台北大使安克志請求會見蔣經國總統。安克志讀了美中建交公報和卡特致蔣經國的訊息：美中建交的同日，與台灣的外交關係將終止；《共同防禦條約》一年後終止。安克志還說：「這些是極重要、有高度機密性的訊息，務請保密。」

蔣經國答覆：「如此重大決定，美國竟然在七個小時前才通知我國，此實為對我國重大打擊，對我個人系一大侮辱，也是不可思議的事。此事的後果極為惡劣。美國以為如此仍可以保持台灣的內部安全及繼續發展，事實亦斷不可能。美國在如此侷促時間內決定此一重大問題，其方式及決策本身，不僅失信於我國政府及人民，亦失信於整個自由世界人民。對於今後可能引起的一切嚴重後果，應由美國政府負其全部責任。」

鄧小平在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美國與共產中國建交當天，樂得忘乎所以地在政協全國委員會座談會上宣佈「台灣歸回祖國已提到日程上來」。他說：「今天是一九七九年的元旦，這是不平凡的日子。說它不平凡，不同於過去的元旦，有三個特點：第一、今天是我們全國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四個現代化建設上來；第二、今天是中美關係實現了正常化；第三、今天把台灣歸回祖國，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提到具體日程上來了。」

同日，以國防部長徐向前名義發表的關於「停止對大金門、小金門、大擔、二擔等島嶼炮擊的聲明」，特別強調「中美建交是一件歷史性大事，為台灣歸回祖國，完成祖國統一創造了有利條件。」

緊接著，一月二日至五日，鄧小平頻繁會見美國國會議員和美國記者，宣佈「我們將採取多種方法同台灣當局，特別是蔣經國先生商談祖國統一的問題。就我個人來說，我希望今年就實現這個願望。就我的健康狀況來說，至少還可以活十年，但那就太久了」。

一九八○年一月十六日，鄧小平在《關於目前的形勢和任務》報告中，又把「台灣歸回祖國，實現祖國統一」定為「八十年代三大任務」之一。

然而「願望」沒有實現，「任務」沒有完成。等到一九八九年，鄧小平終於放棄，承認他「看不到了」；也就是承認他在這場博奕中已被蔣經國擊敗。可惜這場世紀對奕至今未被正確解讀。台灣今天的執政者，作出了完全違背歷史真相的荒謬解讀。

二○○九年三月十六日於台北紅樹林

《爭鳴》第378期 2009年4月號

鄧小平帝國三十年（１３）

蔣鄧對奕的歷史真相

二○○九年二月十八日，江丙坤在台灣「投資新中國」高峰論壇上說：

「八○年代兩岸關鍵人物在關鍵時刻做出正確決定，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讓中國大陸在過去十五年，經濟成長率平均百分之十點五，為世界第一名，並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第三貿易大國；至於蔣經國的政策，讓台商在台幣升值、自由化過程中，大舉到大陸投資，利用大陸作為台灣出口到美國的平台，對台灣經濟有莫大貢獻。

「去年關鍵人物再度出現，馬英九主張兩岸和平穩定發展，在過去八個月所呈現的發展，得到全世界肯定。現在是關鍵時刻，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與內需市場，對台灣帶來良好機會，因此馬英九競選政見兩大主軸，為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兩岸經貿合作協議。」

顯然江丙坤是為了表白今日馬英九與胡錦濤的「合作」雙贏，不惜偽造出昔日蔣經國與鄧小平「合作」雙贏的歷史。蔣經國與鄧小平那場對奕歷史真相是：

第一，從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五年，鄧小平的確千方百計「誘惑」蔣經國同他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談判「一國兩制，和平統一」。他始終把

自己的願望寄托在學弟蔣經國身上。最後一次是一九八五年九月，鄧小平得悉蔣經國健康狀況不佳，拜託李光耀去找蔣經國做說客。因為李光耀是雙方都信得過的朋友。鄧小平對李光耀說：

「蔣經國不在了，台灣出現獨立怎麼辦？確實存在台灣獨立的可能性。如果蔣經國先生從中華民族利益著眼，同我們一起來解決這個問題，將會有很多好處。事情只能由他來決定。你下次見到他時，請代為問候，希望同學之間合作一下。」

在此之前，鄧小平還多方設法通過美國對蔣經國施加壓力。卡特、布裡辛斯基是聽他擺佈的，布裡辛斯基在他的著作《大失敗》中公開主張台灣在鄧小平的「商業共產主義」統治下，「仍可保持它自由經營的、成功的社會經濟制度」。

卡特競選連任失敗後，鄧小平把希望寄托於列根總統，他在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八日會見列根時說：

「中國準備在不放棄主權原則的前提下，允許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中國統一後，台灣可以繼續實行資本主義，而且台灣還可以繼續維持對外關係，主要是對美國、日本的關係不變。但是，這要取決於美國政府的政策。美國有許多事情可以做，並非無所作為，就是不要做使蔣經國翹尾巴的事情。這樣，海峽兩岸可以從逐步增加接觸到談判統一。」

列根未為所動，鄧小平再接再厲，於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會見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時，托她傳遞訊息給列根，希望美國能像英國同意把「一國兩制」用於解決香港問題那樣，同意把「一國兩制」用於解決台灣問題。鄧小平說：

「『一國兩制』構想的提出，還不是從香港問題開始的，是從台灣問題開始的。請戴卓爾夫人再過幾天見到美國總統列根時，介紹一下中英兩國合作解決香港問題的情況，並祝賀列根先生連任總統。列根總統認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式是可取的話，美國在台灣問題上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特別是列根總統本人。」

鄧小平想用列根和戴卓爾包圍蔣經國的這兩步棋均未見效。戴卓爾在華盛頓會見列根時，一字未提鄧小平請她轉達的重大建議。等戴卓爾一離開華盛頓，中國駐華盛頓官員就向美國官員探聽，列根對鄧小平的建議有何反應？美國官員被問得莫名其妙，後來在英國人協助下才弄清是怎麼回事。

李光耀倒是很認真，專程到台灣與蔣經國在日月潭會面，轉達鄧小平對蔣經國的問候與國共和談建議，但被蔣經國拒絕。蔣經國委託李光耀訪美時，帶信給美國總統列根。信中指出：共產中國以各種手法在國際上孤立台灣，對於美國，則指稱台灣是美中關係絆腳石，企圖迫使美國對台「廢法」（廢除《台灣關係法》）、「停售」（停止對台軍售

）、「逼和」（逼迫台灣接受和平統一談判）。蔣經國表達了他堅持不與共產中國談判的立場。

第二，面對美國對台「斷交、撤軍、廢約」和鄧小平進一步迫使美國「廢法、停售、逼和」的凌厲攻勢，蔣經國的中國戰略是從專制反共轉變到民主拒統。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蔣經國在國民黨十一屆四中全會上說：「這是本黨歷史上最艱險的一年。」也就是比一九三七、一九四九更艱險。一九三七日本侵犯，還可以退到大後方堅持抗戰。一九四九被共產黨打敗，還可以流亡台灣。一九七九遭美國背叛與鄧小平「促統」雙重壓力，台灣已無路可退。

蔣經國從專制反共到民主拒統

那一天是世界人權日，當晚高雄發生「美麗島事件」，標誌台灣自由民主運動新高潮的來臨。一九八○年二月的「美麗島大審」，是蔣經國對台灣自由民主運動的最後一次大規模鎮壓，幾乎把著名的反對人士一網打盡，然而台灣人民卻站在蔣經國的對立面—被審判者一邊。當年年底台灣民意代表選舉，「美麗島大審」的受難者家屬和辯護律師獲得空前勝利，使蔣經國看到戒嚴恐怖統治的威懾力量已經阻擋不住自由民主的歷史潮流，民眾不再畏懼支持挑戰國民黨黨國專制制度的政治反對派了。

在這歷史的關鍵時刻，蔣經國可以有三種選擇：

一是屈服於美國「斷交、撤軍、廢約」與鄧小平「統一時間表」的壓力，滿足他的學長「同學之間合作一下」的願望，實現國共和談；或者如江丙坤所言，迎合鄧小平改革開放，「大舉到大陸投資，利用大陸作為台灣出口到美國的平台，從經貿合作逐步增加接觸到談判統一。」

二是繼承蔣介石的哲學，「以不變應萬變」。國民黨流亡政權在台灣已經維持了三十多年，而蔣經國晚年已疾病?身，他可以繼續拖延殘局，留給台灣一個不確定的未來。

三是順應歷史潮流前進，跟著台灣人民告別過去，同黨國獨裁政權決裂，走上自由民主新路。

蔣經國只要走錯一步，今天的民主台灣就不存在了。在這場博奕中，鄧小平轉勝為敗，蔣經國轉敗為勝，就在一九八○年代他們各自走出的最後幾步棋。

蔣經國晚年走出的關鍵一步，就是從專制反共到民主拒統。

四十五歲時的蔣經國（一九五五）曾對訪問他的美國學者艾倫?懷丁說：「在亞洲，一黨專政是唯一統治的辦法。政工、特務、青年救國團被攻擊得

最厲害，美國誤會也最深。但唯有如此，才能反共。只要中共存在一天，我們就永遠沒有民主。」

三十多年專制反共的結果，反而被中共逼到了絕境。蔣經國終於看到「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台灣的國民黨黨國戒嚴體制已無法照舊統治下去，不能不變了。他提出「革新保台」，解除戒嚴，解除黨禁、報禁，準備開放全國民意代表直接選舉，這就是終結把台灣當作反攻大陸基地的國民黨外來政權體制，跨向以台灣為主體、依靠台灣人民，把台灣建設成為自由民主現代國家之路的第一步。這是台灣在中國促統、國際孤立環境中唯一的生存、發展戰略，也就是民主拒統戰略。

鄧小平「統一」夢碎

當歷史機會來臨時，歷史人物在轉瞬即逝的關鍵時刻作出的選擇，能夠決定國家的命運。鄧小平在一九八○年代的歷史機遇，比他的學弟蔣經國好得多。中國於一九七○年代末起步的開放進程，在胡耀邦、趙紫陽等改革派領導人主持下，擁有廣泛的國內外支持。然而鄧小平本人始終在改革力量與反改革力量之間舉棋不定。越到晚期，越偏向反改革力量一邊。當台灣解除戒嚴，解除黨禁、報禁，允許反對黨成立之際，鄧小平在中國先後廢黜了兩任改革派總書記胡耀邦、趙紫陽，把黨國權力交到反改革勢力掌握之中。

他的學弟蔣經國的最後歲月，結束了國民黨一

黨專政，把台灣的命運從國民黨手中交還給台灣人民，從而使鄧小平的「統一」夢碎。在蔣經國死後一年，鄧小平終於承認了他同蔣經國的博奕以失敗告終，說出「我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灣問題，恐怕看不到解決的時候了。」

毛澤東的「政治遺囑」

毛澤東臨終前不久，曾召見華國鋒、毛遠新、汪東興等人，說了一段話：

「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吧！我一生干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斗了那?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麼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麼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麼交？和平交不成就動盪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

這段話可以視為毛澤東的政治遺囑。

毛澤東挑選兩名接班人劉少奇、林彪失敗之後，雖已到風燭殘年，卻不再明確指定新的接班人，而是在左、右兩派之間玩平衡遊戲，時而支持鄧小

平批評「四人幫」（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時而支持「四人幫」批評鄧小平。毛對「四人幫」，是利用而非信任；毛認為他們能「亂天下」，不能「治天下」。毛認為鄧小平能「治天下」（「人才難得」），但對鄧的治法（「路線」）沒有把握。特別是鄧對「兩件大事」之一的「文化大革命」的態度，毛最不放心。

當初毛讓鄧復出的條件，是鄧承認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錯誤，表示「永不翻案」。後來毛又發動批鄧，也是由於懷疑鄧小平的「永不翻案，靠不住吧？」毛建議鄧小平主持政治局通過一份決議，肯定「文化大革命三七開，三分錯誤，七分成績」；即打算把這份「遺產」和平遺交給鄧繼承，但被鄧拒絕。

鄧小平說：「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適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這就證實了毛的懷疑，鄧拒絕接受毛的文革遺產，「永不翻案」靠不住。

鄧小平拒絕文革遺產，「四人幫」不能治國，這筆「遺產」怎麼交，成了毛澤東臨終的難題。毛澤東的政治遺囑所透露的，正是那種難以釋懷的無奈與悲涼。

毛澤東最後決定，讓「公道不蠢」、「人家說他水平低，我就選這個水平低的」華國鋒出任黨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已是無可選擇的選

擇。究竟這筆遺產交得成交不成？將帶來和平還是「血雨腥風」？毛已經沒有把握，只得聽天由命（「只有天知道」）了。

華國鋒與四人幫爭奪毛「正統」

華國鋒的思路比較簡單，以為依靠葉劍英、汪東興抓了「四人幫」，鞏固了權力，他就能以毛澤東的「正統接班人」地位「抓綱治國」了。

但鄧小平認為：「華國鋒只是一個過渡，說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沒有一個獨立的東西，就是『兩個凡是』」。

這話不錯。華國鋒和「四人幫」都沒有「獨立的東西」，雙方打的是一場爭奪毛澤東「正統」的宮廷內戰。爭戰的主題非常可笑：華國鋒以毛澤東親筆寫的「照過去的方針辦」七個字，打敗了被四人幫「篡改」的「按既定方針辦」六個字。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澤東去世，二十五天後的十月四日，《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按既定方針辦》的長文，把「按既定方針辦」定性為「毛主席的臨終囑咐」。這六個字也被寫進外交部長喬冠華在聯合國大會的發言稿，華國鋒在喬冠華的發言稿上批示：「毛主席原文『照過去的方針辦』，七個字錯了四個！」華國鋒和汪東興判斷這是「四人幫」將有所行動的預兆，決定「先下手為強」；於是十月六日將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

和毛遠新等人逮捕。汪東興手下的「理論組」成員鄭必堅，寫了一篇被評為「氣勢磅礡」的聲討文章《覆滅前的猖狂一跳》，指稱十月四日《光明日報》文章把毛澤東的「照過去的方針辦」篡改為「按既定方針辦」是「四人幫發動反革命政變的信號」！然而人們難以理解，究竟「照過去的方針辦」與「按既定方針辦」的差別在哪裡？不都是「按照毛主席的方針辦」嗎？

鄧小平帝國的理論基礎

之後華國鋒又提出「兩個凡是」，所以鄧小平說他「沒有一個獨立的東西」。可見鄧小平自己是有「獨立的東西」的。但鄧小平的「獨立的東西」究竟是什麼？在很長時間內沒有人弄得清楚。外國人說他是不講意識形態的「實用主義者」，鄧小平也自稱「不爭論」是他的「一大發明」。有人寫過一本小冊子「鄧小平的哲學思想」概括為「貓論」和「摸論」。根據是鄧小平的兩句話：「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和「摸著石頭過河」，也還是實用主義、經驗主義的意思，說不上「獨立的東西」。

事實上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到中共十三大那些年，鄧小平的思路是不穩定的；尤其是一九七八年冬天和一九八○年春夏之際，他確曾試圖跳出專政派的思路，向民主派的思路傾斜，但為時都很短暫。

中共黨史學家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龔育之，把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中央工作會議講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和《鄧小平文選》最後一篇《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稱為鄧小平理論的「精髓」和「解放思想的宣言書」，恐怕並不符合「完整、準確」的鄧小平思想體系和歷史的真相。

我說過鄧小平那篇後來被定為「三中全會主題報告」的講話，「是在當時會外西單民主牆『大氣候』和會內各小組討論『小氣候』逼迫下的急就章」。也就是說，它是鄧小平追隨當時「大、小氣候」的應變產物，不是他深思熟慮的理論產物；鄧小平不但並未堅守，而且很快以他堅守的東西否定了它。由於最近一個時期有人對這段歷史所作種種歪曲與偽造，有必要再作點說明。被稱作「中國歷史重大轉折」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起關鍵作用的是胡耀邦，不是鄧小平。胡耀邦不但為這個轉折進行了思想和組織上的準備（真理標準討論、分清歷史功過是非、平反冤假錯案），而且為實現這個轉折運用了社會民主力量（以北京西單民主牆為標誌，遍及全國）與黨內民主改革力量（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黨內民主改革派）的暫時聯盟。沒有胡耀邦創造的這兩個條件，當時占統治地位的「凡是」派是不可能如此輕易認輸的。

增加黨內民主改革派參加會議，是胡耀邦向華國鋒建議的，主要是吸收理論界、新聞界、文藝界知識分子領導人周揚、胡績偉、秦川、楊西光等參

加，他們在會上發揮了重要作用。胡耀邦還讓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收集西單民主牆提出的重大問題，由馮文彬帶到會上，以便「啟發思想」。

二○○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二十週年，於台灣淡水紅樹林

《爭鳴》第379期 2009年5月號

鄧小平帝國三十年（１４）

「把歷史的顛倒再顛倒過來」

中央決定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份召開中央工作會議，討論農業問題和一九七九、一九八○兩年的國民經濟計劃；那時鄧小平在日本訪問。十月二十九日鄧小平訪日結束回國，曾建議工作會議開始時增加討論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問題，並找了胡喬木為他起草會議講話稿。

鄧小平當時的主要注意力在外交方面。同美國的外交談判已到最後關鍵時刻，鄧小平要求「加快步伐」。另外他在訪日之後，緊接著在十一月上半月正式訪問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三國。十一月十四晚才經緬甸回國。那時中央工作會議已經開了五天。當時的形勢，是中央工作會議與西單民主牆相互呼應，對一九七六年四月天安門事件、歷史上的冤假錯案，以及黨的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當馮文彬把西單民主牆要求為

一切冤假錯案平反、撤銷汪東興的中央專案組等大字報內容在會上傳播時，獲得與會大多數人的響應。另外，凡是派代表人物胡繩在會上對周揚的攻擊，引發了實踐派對凡是派的回擊。

胡耀邦對此會議的進程充分掌握、成竹在胸。由於他就任中央組織部長後，早已對會上提出的案件進行過認真調查，在會議期間及時向中央提供相關資料，使中央能夠迅速回應人民的呼聲作出決定；包括「全國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決定」、「一九七六年四月天安門事件」的平反決定、「六十一人叛徒集團」、「二月逆流」和彭德懷、陶鑄等冤案的平反決定等。照胡耀邦的說法，這是「把歷史的顛倒再顛倒過來」，也就是歷史的偉大轉折。

鄧小平看到這種形勢，於十一月十六日再約胡喬木談修改他的講話稿。胡喬木於十一月十九日完成修改稿交給了鄧小平。胡喬木的修改稿在鄧小平手裡壓了十二天，鄧小平在繼續觀察形勢。

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在與華國鋒、葉劍英等聽取北京市委和團中央?報天安門事件平反後群眾反映和西單民主牆大字報的情況。那時大字報已有批評毛澤東的歷史錯誤，貴陽市啟蒙社提出「毛澤東的功過三七開」。鄧小平聽取?報時說：

「有些歷史問題要解決，有些歷史問題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不能勉強去解決。有些事件我們這代人解決不了，讓下一代人去解決。外國人問我，對

毛主席的評價，可不可以像對史達林評價那樣三七開？我肯定地回答，不能這樣講。黨中央、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幹赫魯雪夫那樣的事。」

但那時鄧小平還沒有否定民主牆和大字報。他在第二天（十一月二十六日）會見日本民社黨委員長佐佐木良作時說：「群眾貼大字報是正常現象，是我國形勢穩定的一種表現。我們沒有權利否定或批判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

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

到了十一月三十日晚上，鄧小平才把讓胡喬木起草並經過修改的稿子拿給胡耀邦，對他說：「這個稿子不能用，喬木的思路不行，你給我找人寫。」兩天後（十二月二日），鄧小平又提出了一些想法，重點是解放思想和民主。這篇重新起草的「急就章」完成後，鄧小平卻又讓胡喬木參加「修改」，去破壞自己提出的「解放思想」和「民主」兩個重點。舉例說，「解放思想」的主題下有段話，原來是這樣的：

「目前進行的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實際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大家認為進行這個爭論很有必要，意義很大。從爭論的情況來看，越看越重要。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從這個意義上說，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

爭論，的確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

評價真理標準爭論之意義的這段話，本來是周揚的發明。胡喬木當時就站在反對一方；這次工作會議上，胡繩再次拿來攻擊周揚。但鄧小平在十二月二日談到思想解放時，對周揚這段話予以肯定並重複講了一遍，因此寫進了「急就章」。胡喬木不敢貿然去掉，他採取的破壞手段，是把這段話從中間一刀切斷，在「就要亡黨亡國」之後塞進他的東西：

「這是毛澤東同志在整風運動中反覆講過的。只有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繫實際，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才能順利進行，我們黨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也才能順利發展。」

然後再接上鄧小平肯定的周揚原話。這樣一來，對真理標準爭論的評價變成了毛澤東早在延安整風中「反覆講過」的老調子了。

對「急就章」中民主這個主題，胡喬木塞進去的是：「實行無產階級的民主集中制，我們需要集中統一的領導，但是必須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確的集中。」這麼一來，民主的價值就被降低為「集中制」和「專政」的「手段」了。

但無論胡喬木怎樣玩他的戲法，這篇「急就

章」中既無「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也無「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道路，連「改革開放」的明確概念也未出現；而僅僅三個月後，鄧小平就發表了那篇胡喬木幫著起草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走向了十一屆三中全會解放思想和民主兩大主題的反面，那才是鄧小平帝國的政治綱領。

鄧小平帝國的理論基礎

所以龔育之把鄧小平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急就章」與一九九二年「南巡講話」並列為鄧小平理論的「精髓」和「解放思想的宣言書」，恐怕更多出自他個人情感的好意，而非歷史的真實。且看鄧小平自己怎麼說？

—粉碎「四人幫」後，我們做的第一件事，是取消憲法中關於「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一條。

—三中全會以來我們的方針，第一條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第二條是搞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建設。

—有的同志主張在《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中不要寫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胡耀邦同志實際上就持這種觀點。我在那個會上講了話。當時我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僅現在要講，而且要講十年到二十年。今天我又加上五十年。

—兩個總書記都沒有站住，他們在根本問題上，就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上犯了錯誤，栽了跟頭。四個堅持的對立面是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些年來每年我都講多次，但是他們沒有執行。

—依靠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社會主義制度，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馬克思說過，階級鬥爭學說不是他的發明，真正的發明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歷史經驗證明，剛剛掌握政權的新興階級，一般說來，總是弱於敵對階級的力量，因此要用專政的手段來鞏固政權。

—對改革開放，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這是正常的。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東西有，動亂就是右的！「左」的東西也有。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些就是「左」。

　　這幾段話，前四段，是鄧小平的原話，雖然不準確、不完整，卻是他的心裡話。憲法中取消「四大」，是一九八○年，當然算不得粉碎四人幫後「第一件事」，況且三中全會時鄧小平自己還公開講話肯定過大字報。那時大字報支持鄧小平，鄧小平在那種特定「氣候」下肯定大字報，如同他廢棄胡喬木的「思路」一樣。後來大字報貼出「警惕新的獨裁者」，矛頭對準自己，取消「四大」才成為鄧小平心中「第一件事」。

後兩段，是經過龔育之、鄭必堅整理，鄧小平審定的文字，較有「理論色彩」，可以說是鄧小平理論的「精髓」，也可以說是鄧小平帝國的理論基礎。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那一段，是繼承毛澤東帝國的。這本來也是三中全會時被鄧小平暫時收起的胡喬木「思路」（其實也是鄧小平自己的「思路」）。那個被廢棄的稿子裡就有「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目的是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社會主義社會還有階級鬥爭，黨內還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但王、張、江、姚是走資派，河南省委的王維群、駐馬店地委的蘇華，也都是不折不扣的走資派，我們一定要經常保持清醒頭腦，隨時採取必要的措施，務必要使階級敵人的一切活動在開始出現的時候就加以消滅，不要等問題成了堆再去處理。」

鄧小平後來不再使用毛澤東那根「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棍子，因為那根棍子打倒過他自己。鄧小平改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拿來打別人，理論上完全一致。

鄧小平與胡耀邦的根本分歧

關於反右防「左」那一段，是「鄧小平理論」對「毛澤東思想」的「修正」或者「發展」。政治思想領域反右、反和平演變，鄧小平與毛澤東是一

致的。差別就在「經濟領域」。毛澤東在「一切領域」實行「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而鄧小平認為反和平演變反到「經濟領域」就是「左」。

所以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只是在「經濟領域」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和平演變」。

這就是鄧小平的半毛澤東主義（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半實用主義（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也是鄧小平與胡耀邦的根本分歧所在。

胡耀邦的「思路」，從「真理標準」、「生產目的」、「人的解放」三大討論到《精神文明決議》，追求的是自由平等的人類普世價值。當然他也從馬克思經典中找理論根據，馬克思並沒有否定人類普世價值。胡耀邦主張「全面改革」，經濟領域改革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人的自由與幸福。而鄧小平卻視之為「資產階級自由化」。

鄧小平在廢黜胡耀邦後選擇趙紫陽，也是從鄧小平帝國的理論基礎出發的。趙紫陽提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後來寫進十三大報告），符合鄧小平的警惕右（胡耀邦的「全面改革」、「普世價值」論）、防止「左」（鄧力群的「和平演變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論）。

趙紫陽說過，他與胡耀邦不同，如果他不反對戒嚴、不反對派軍隊鎮壓學生，他的總書記是可以

做下去的。這是真心話。鄧、趙分歧主要在趙反對鎮壓學生運動，所以鄧一面恨趙、反趙，一面又不得不說趙的十三大報告「一個字也不許動」。

龔育之如果不從個人感情出發，而從歷史進程來研究「鄧小平理論」，他理應把鄧小平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那篇講話《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作為首篇才「準確」、「完整」。因為那才是鄧小平理論貫徹始終的「精髓」，不是那篇鄧小平講完即丟的三中急就章。

為了「完整、準確」地說明鄧小平帝國理論基礎奠定的歷史進程，還需要簡略地提一下一九八○年與一九八四年的兩段插曲。

二○○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二十週年，於台灣淡水紅樹林

《爭鳴》第380期 2009年6月號

鄧小平帝國三十年（１５）

關於「興無滅資」的插曲

一九八○年四月，胡喬木和韋國清在黨內、軍內發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胡喬木四月一日在中央宣傳部會議上提出：「現在的問題是要對自由主義的思想、方針發動進攻，宣傳部要當警察。」四月十八日，韋國清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重

提「興無滅資」。

「興無滅資」(興無產階級思想、滅資產階級思想的簡稱)是鄧小平一九五六年在同青年團幹部談話中提出的，一九五七年反右之後，成為「思想文化領域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的主要口號之一。這是對鄧小平的「凡是」，韋國清拿來寫進了華國鋒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的講話，經鄧小平同意公開發表。

這件事引起了李維漢的注意。五月二十四日，李維漢到鄧小平家中拜訪，表示不贊成重提「興無滅資」。他認為思想戰線最重要的任務，不是批判資產階級思想，而是肅清封建主義影響。

李維漢這個看法，過去也有人提出過，包括葉劍英、胡耀邦和學術界的黎澍等。胡耀邦早在一九七七年分析「四人幫」的思想社會根源時，就指出其根源是封建法西斯主義和流氓無產者。李維漢此行的重要性在說動了鄧小平，使他同意收回「興無滅資」口號，並於五月三十一日發表了一篇肅清封建主義影響的講話。鄧小平說：

「李維漢同志的意見很好，很值得重視。黨內生活，社會生活，都要肅清封建主義影響。各種制度，都要從肅清封建主義影響的角度去考慮，逐步加以改革。李維漢同志建議我在十二大講話專門講一下肅清封建主義影響的問題。我看，這個意思首先要體現在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

這就是一九八○年春夏之際，鄧小平試圖跳出專政派思路，向民主派思路傾斜的最後一躍。八月十八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發表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講話，主旨就是「從肅清封建主義影響的角度」進行制度改革。鄧小平說：

「黨和國家現行制度中的弊端，同歷史上封建專制主義的影響有關，也同共產國際時期實行的各國的工作中領導者個人高度集權的傳統有關。肅清封建主義影響，重點是切實改革並完善黨和國家的制度，從制度上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中央將向五屆人大三次會議提出修改憲法的建議，要使我們的憲法能夠切實保障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國家各級組織和各項企業的權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權利，要使各民族真正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等等。」

這篇講話經政治局討論，在八月三十一日通過。接著舉行的五屆人大三次會議選舉了「憲法改革委員會」，準備修憲使之符合國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要求。

鄧小平在陳雲集團進攻下退卻

鄧小平五月、八月兩次講話，打亂了專政派「對自由主義思想、方針發動進攻」的部署。他們利用七月發生的波蘭團結工會事件進行抵制。胡喬木九月二十四日寫了一封信給胡耀邦，提出「中國也

可能爆發像波蘭那種局勢，必須像毛澤東在一九五六年發生波、匈事件時那樣制定對策。」胡耀邦未予回應。胡喬木就通知中央書記處把他的信印發給黨、政部門和群眾團體。

中央宣傳部討論胡喬木的信時，傳達了陳雲的意見：「一個宣傳方面，一個經濟方面，這兩方面不注意，中國也會發生波蘭那樣的事件。」會後中宣部發出通知：「小平同志講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不要再宣傳。」

然後在十二月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在陳雲集團進攻下全線退卻，不但在政治領域放棄「從肅清封建主義影響角度」進行黨和國家制度改革，而且在經濟領域也接受了「抑需求，捨發展，緩改革」的陳雲路線。鄧小平還在講話中首次明確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也就是退回他一度自我否定的「興無滅資」綱領。

第二段插曲在經濟倒胡、政治倒周之後的一九八四年。鄧小平後悔一九八○年中央工作會議對陳雲「讓步太多」，讓胡耀邦起草十二屆三中全會《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

鄧小平玩弄左右平衡的手段，比毛澤東厲害：他決定對陳雲讓步時，要鄧力群替他起草那個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退卻的講話。他想挽救經濟，收回對陳雲的讓步時，又要胡耀邦起草《經濟體制改革決定》；而之前胡耀邦已被排除出經濟工作的中央決

策核心。

胡耀邦是在陳雲集團的極大壓力下，獨力完成這個《決定》的。不是都說胡耀邦「不懂經濟」嗎？這回鄧小平卻稱讚胡耀邦起草的這個決定是「政治經濟學的一大發明、一大創造」。這也是鄧小平最後一次利用胡耀邦的智慧來挽救經濟，實現其收回對陳雲讓步之需要。這兩段插曲表明：

第一， 在政治思想領域，鄧小平認同李維漢，放棄自己的「興無滅資」，正如十一屆三中全會那篇「急就章」一樣，是一時的。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興無滅資，反自由化，是鄧小平帝國不可動搖的理論基礎。

第二， 在經濟領域，鄧小平認同「抑需求，捨發展，緩改革」的陳雲路線，也是一時的。而堅持對外開放，引進國外資本、資源、資訊、科學技術、管理人才，建構和平發展的新國際聯盟，是鄧小平的全球戰略，也是鄧小平帝國不可動搖的理論基礎。

把這「兩手硬」合起來，就是利用資本主義，鞏固和發展共產黨一黨專政的中國特色新奴役制度，這才是「鄧小平理論」的「精髓」。

沒有鄧小平的鄧小平帝國

毛澤東去世兩年之後，毛一生中的兩件大事之

一文化大革命被「徹底否定」，毛澤東時代的冤假錯案被平反，對毛澤東的兩個「凡是」被批判，除了他的遺體還靜靜地躺在天安門前的「毛主席紀念堂」裡，他所建立的那個毛澤東帝國無聲地消失了。

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鄧小平在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發表他的主題演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用對他自己的「凡是」，取代對毛澤東的「凡是」，跨出了締造鄧小平帝國的第一步。

難道不是嗎？胡耀邦、趙紫陽兩屆總書記被整肅，罪名都是不聽鄧小平的話，違背鄧小平教導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鄧小平接受毛澤東的歷史教訓，在生前對鄧小平帝國未來的鞏固和發展作了周密部署。

對兩代接班人的指定

一九八○年鄧小平一度同意李維漢建議，在政治局會議提出從肅清封建主義影響角度進行政治制度改革的同時，接受意大利記者法拉奇專訪，批評毛澤東「一個領導人，自己選擇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種封建主義的做法」。他說的是真心話，後來忘記或者變卦了，還是原來就言不由衷，且不去追究，只要看鄧小平自己的做法，比毛澤東更封建專制主義。

毛澤東拋棄劉少奇、林彪兩個接班人之後，並未明確他打算「交班」給誰。一度選擇過鄧小平（「人才難得」），因鄧小平不願繼承「文化大革命」這筆「遺產」而發動「批鄧」。直到最後也未明確「交班」給華國鋒，還說出「和平交不成就動盪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那樣對未來毫無把握的話。

鄧小平比毛澤東深謀遠慮，他選擇在「血雨腥風」中確立自己的接班人江澤民時，說得十分明確：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建立了一個新的領導集體，這個集體一建立，我就一直在安排接班的問題。雖然兩個接班人都沒有站住，但在當時，按鬥爭的經驗、按工作的成就、按政治思想水平來說，也只能作出那樣的選擇。

「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實際上我是核心。因為有這個核心，即使發生了兩個領導人的變動，都沒有影響我們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始終是穩定的。進入第三代的領導集體也必須有一個核心，這一點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覺性來理解和處理。要有意識地維護一個核心，也就是現在大家同意的江澤民同志。開宗明義，就是新的常委會從開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樹立和維護這個集體和這個集體中的核心。這是最關鍵的問題，是我的政治交代。」

　　這就是鄧小平獨創的「核心」理論。為什麼胡耀邦、趙紫陽「都沒有站住」？因為「第二代實際上我（鄧小平）是核心」。即使胡、趙有「鬥爭經驗」、有「工作成就」、有「政治思想水平」，是全國黨代表大會選出的總書記，黨章上的第一把手，又有人民支持，只要「實際上的核心」不高興，鄧「核心」隨時可以弄個「生活會」、「八老碰頭會」，一句話廢掉。

　　後來喬石任人大委員長時，曾經主張「法治」，爆發過一場「法治」與「核治」之爭。江澤民的「核治」，就是以鄧小平的「核心」理論打敗了喬石的「法治」，在中共十五大逼退喬石。

　　江澤民當上「第三代核心」之時，民間流傳過一則小故事《毛澤東的一顆核桃》。故事說：

　　毛澤東臨終前，把政治局委員召來，一一握手告別。葉劍英告別後走到門口，毛示意讓葉回來，握住他的手長時間不放，嘴唇微動，似乎要說些什麼。等到葉點頭表示領會，毛才鬆手讓葉離去。

　　原來毛暗暗把一顆核桃放到葉的手裡。葉劍英後來說，毛曾同他論及漢朝故事，稱周勃「厚重少文」，「能安劉氏者，勃也」。意思是知識分子靠不住，將來安定天下，要借助葉這樣的重臣，臨終把核桃交到葉手裡，是託付後事。

毛死後，葉劍英幫助華國鋒除掉了「四人幫」，準備把核桃交給華，鄧小平說：「慢，再看看」。接著鄧小平與陳雲聯手廢掉華國鋒，十一屆六中全會選出胡耀邦當黨主席兼總書記，葉劍英又準備把核桃交給胡耀邦。鄧小平還是說：「慢，再看看」。直到葉去世，核桃未能交出。

天安門屠殺前，鄧小平在北京西山召見從上海趕來的江澤民。鄧告江，趙紫陽不聽話，反對戒嚴，已撤銷其總書記職務，由江接任。江大驚道：「我不適任，在黨內我只有小學生水準。」

鄧小平說：「稍安毋燥，我先給你看樣東西（拿出核桃），這顆核桃，是第一代核心毛澤東傳下來的，他臨終交給葉帥，託葉傳給第二代核心。葉帥想交給華國鋒、胡耀邦，我都擋住了。葉帥死後，到我手中，我算第二代。今天我交給你，你就是第三代核心。你幹也得幹，不幹也得幹。」

江澤民接過核桃，轉憂為喜。

這是一九八九年的故事。三年後，鄧小平對未來還是不放心，怕江澤民到時候不交權，或交到不適當的人手裡。於是又指定當時四十九歲的胡錦濤為「第四代」，將來接江澤民的班。

確立基本路線和戰略佈局

鄧小平廢黜胡耀邦，心中最大隱憂是怕胡耀

邦「樹立自己的開明形象」，將來會改變他的路線與戰略，正如趙紫陽在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五日批判胡耀邦的生活會上點出的，「你要在國內、國外維持開明的形象，反正黨的格局已經定了，小平同志今年八十三了，現在如果你還不能自由行動的話，一旦情況變了，可以自由行動，不受任何約束。」

因此鄧小平選擇趙紫陽取代胡耀邦之後關注的第一件事，就是在黨的十三大制定未來的「基本路線」和「長遠戰略」。

一九八七年二月六日，鄧小平把趙紫陽、楊尚昆、萬里、薄一波找到家裡，談十三大報告。鄧小平說：「十三大報告應該是一篇好的著作，要在理論上講清楚我們的改革是不是社會主義；要申明四個堅持的必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必要，改革開放的必要。在理論上講得更加明白。」

三月三日，鄧小平會見美國國務卿舒爾茨時說：「四個現代化，我們要搞五十年至七十年。在整個四個現代化的過程中，都存在一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我們堅定不移的原則，是要有穩定的政治局面，以保證有秩序地進行四個現代化。國外有些人過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別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錯；如果要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

遵循鄧小平的思路，趙紫陽提出了一份《關於草擬十三大報告大綱的設想》，於三月二十一日報

給鄧小平。

趙紫陽的設想，是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為立論根據，把黨的基本路線概括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一個中心」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兩個基本點」，一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二是「堅持改革開放」。

鄧小平三月二十五日批示：「這個設計好」。

趙紫陽在十三大的報告，就是按照這個設計完成的。即使在一九八九年鄧小平廢黜了趙紫陽之後，仍然堅持「十三大政治報告一個字都不能動」。（一九八九年五月三十一日）對此鄧小平曾再三強調：

—「黨的十三大概括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對不對？兩個基本點，即四個堅持和改革開放，是不是錯了？沒有錯。如果說有錯誤的話，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不?一貫。」（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

—「十三大制定的路線不能改變，誰改變誰垮台。」（一九八九年九月十六日）

—「十三大確定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戰略佈局。我們十年前就是這樣提出的，十三大用這個語言把它概括起來。這個戰略佈局我們一定要堅

持下去，永遠不改變。」（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二○○九年六月十五日台灣淡水紅樹林

《爭鳴》第381期 2009年7月號

92 (下有脫節)

江澤民被封為「第三代核心」

江澤民被鄧小平封為「第三代核心」的頭三年，面對的政治局常委班子，是血雨腥風中拼湊起來的妥協產物。

十三大選出的五個常委，去掉了趙紫陽、胡啟立。

剩下三個：李鵬、喬石、姚依林。

補進三個：江澤民、宋平、李瑞環。

江澤民是陳雲、李先念提出，鄧小平支持，確

立為「第三代核心」。

宋平，是陳雲派的大將。長期以來，陳雲是中共內部斯大林主義派別的主角，在黨史上的資格比毛澤東、鄧小平還老，因為他是工人出身，也更得共產國際的器重，與王明、康生同為駐莫斯科的中共代表。他從斯大林那裡學得了極權制度的兩種權力基礎：一是對經濟計劃的壟斷，一是對黨組織的壟斷。斯大林就是靠這兩條打敗了軍事統帥托洛茨基與理論天才布哈林的。自延安整風王明失勢後，陳雲轉向毛澤東營壘，即致力於經營經濟、黨務這兩個部門。而宋平，是陳雲派中唯一兼具計劃經濟和黨務組織兩方面經驗的幹將，比光懂計劃經濟的姚依林更受陳雲器重。所以鄧小平選擇宋平進政治局常委，陳雲喜出望外，認為是對他幫助鄧小平廢黜趙紫陽、平息暴亂、解決接班危機的回報。

李瑞環也是鄧小平提議進常委的，陳雲本來不贊成，但因鄧小平讓宋平進了常委，陳雲也只好妥協讓李瑞環進常委。

這樣，六個常委中，三個「左」派：李鵬、姚依林、宋平。他們政治上是專政派，經濟上是鳥籠派。

另外三個算中間派：江澤民、喬石、李瑞環。在鄧小平眼裡，經濟上是「改革派」或「開放派」，政治上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保守派」，符合他的「兩個基本點」。

這個政治局常委會上面，還有兩個半「太上皇」：鄧小平一個，陳雲一個。李先念算半個，因為他沒有自己獨立的堅持，只是在鄧小平、陳雲之間搖擺。

江澤民頭三年（一九八九──一九九一）採取的策略，是疏遠中間派喬石、李瑞環，靠攏「左」派。在經濟領域，他依靠姚依林、宋平，執行陳雲的鳥籠經濟路線，搞「治理整頓」，打擊地方、鄉鎮經濟。江澤民自己也揚言，「要把個體戶打得傾家蕩產」；在思想文化領域，架空李瑞環，依靠鄧力群、胡喬木的「左」派隊伍。江澤民不但重用鄧力群網羅的文革「左」派，而且把早期反胡風、反胡適、反右派歷次運動中的老「左」派如林默涵、許立群、魏巍等都請出來組建「反自由化」思想文化戰線。

反和平演變導致經濟大滑坡

中國天安門屠殺後出現的那場經濟、政治、思

想、文化領域全面向「左」轉的危機，在一九九一年蘇聯共產黨八月政變前後達到高峰。江澤民在一九九一年七月一日慶祝中國共產黨誕生七十周年大會上，發表了引人矚目的以「反和平演變」為中心的演說。接著在中央黨校舉辦高級幹部「反和平演變」學習班。鄧力群們的「反和平演變」宣傳，迅速擴展到經濟領域，「特區租界論」、「鳥籠經濟論」、「姓資姓社論」等爭論，統統搬了出來。這股洶湧的「反和平演變」浪潮，導致連續兩年的經濟大滑坡。一九八九年GDP增長率從上年度的百分之十一點三降至百分之四點八，一九九○年降至百分之三點八。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二日，鄧力群在北京發表《學習毛澤東，做堅定革命者》，文中寫道：

「老一輩革命家王震說得好，戰場上當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對方也困難，甚至比我們還困難，只要我們堅持下去，就是勝利。」

鄧力群還強調，陳雲提出重新學習毛澤東哲學著作，加強黨的建設。

這時在北京「韜光養晦」的鄧小平坐不住了。一月十七日下午，他乘專列南下，開始了著名的「

一九九二南巡」。有人把鄧小平「一九九二南巡」與毛澤東的「一九七一南巡」遊說地方和軍隊注意林彪相提並論，以為他又要廢黜接班人了。

鄧小平南巡講話的消息傳到北京時，其中有一句「誰不改革誰下台！」連喬石和田紀雲都會錯意。當時任中央黨校校長的喬石，請田紀雲到中央黨校作反「左」報告，有些話是針對江澤民在黨校辦那個高級幹部「反和平演變」學習班的。喬石還質問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薛駒：「辦反和平演變學習班，為什麼我這個校長不知道？」喬石當然知道薛駒是奉命辦事，他是明批薛駒，暗攻江澤民。

與鄧小平相交共事六十年（一九三二──一九九二）的戰友楊尚昆，也未弄明白鄧小平的真意，趕忙緊跟著南下，為老戰友「保駕護航」，助長聲勢。美國《紐約時報》有位偏好揣摩中共高層內鬥秘辛的駐京記者Patrick Tylor，憑自己的臆測，寫了一篇專稿《誰將拿到鄧小平的斗篷？》斷言鄧小平將把最高權力交給楊尚昆，致使美國輿論界關注中國的目光再度轉向鄧小平：這個八十八歲的老人究竟又要幹什麼？

鄧小平在「南巡」最後一站上海，講了一段後來整理文稿時被刪去的話：

「有人問我，難道今天還要全面批鄧小平路線？我說這個問題問得好。那個高狄（六四屠殺後派去的《人民日報》社長）想幹什麼？看來《人民日報》不在我們手裡。他們不發表改革開放文章，你們可以多發，廣東也可以講話。總之，現在不是四人幫當道的時代了，誰也別想封住我們的口。」

鄧心中的「沛公」是陳雲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鄧小平心目中的「沛公」是「今天還要全面批鄧小平路線」、「不發表改革開放文章」、「想封我們的口」的陳雲集團，不是江澤民。鄧小平知道江澤民沒有這個膽量和能量。

鄧小平對待江澤民與對待胡耀邦、趙紫陽不一樣。鄧小平需要利用胡耀邦、趙紫陽的才幹幫他開天闢地，但不放心胡、趙的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怕他們「樹立自己的形象」，脫離他的「鄧小平路線」。所以雖然重用，名義上讓他們當「第一把手」，卻並不交出權力；還小心設防，讓鄧力群、胡喬木們去監察，讓陳雲去制約，最終與陳雲集團聯手罷黜，把他們的名字從歷史上抹掉。

對江澤民，鄧小平相信他不會主動背叛「鄧小平路線」，但擔心他頂不住壓力，被動追隨陳雲集團。

一是政治局常委有一半（李鵬、姚依林、宋平）是陳雲派，中間派的喬石、李瑞環，也不會跟江澤民合作。

二是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一這幾年，「國際大氣候」是全球民主化高潮，整個蘇聯、東歐共產帝國被吞沒；中國邊緣的蒙古也自由化了。鄧小平自己也常講「和平演變」是「一場無硝煙的世界大戰」。

鄧小平在這幾年，也未如外界所言的「垂簾聽政」，而是「韜光養晦，冷靜觀察」。他觀察到陳雲集團控制了中央的施政方向，在經濟和意識形態領域全面背離他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提出以「反和平演變為中心」取代了他的「經濟建設為中心」；鄧力群、高狄掌控下的《人民日報》，「不發表改革開放文章」。若不反擊，不但中共十三大確定的「翻兩番」戰略目標將落空，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制度能否在世界上生存下去都成問題。

鄧依靠地方「炮打中央」

鄧小平選擇一九九二年春節前後作為反擊的時機，一是下半年要開中共十四大。他必須在十四大前解決路線問題。鄧小平說過：「十三大政治報告一個字都不能動，這個我徵求了李先念、陳雲的意見，他們都贊成。」現在陳雲「動」了，講過贊成也不算數；那鄧小平就不客氣了。

二是各省、市尤其沿海地區，對陳雲、姚依林　宋平們那套中央干預地方的「禁令」已忍無可忍。鄧小平選擇廣東、上海，依靠地方「炮打中央」，勝券在握。

鄧小平南巡前，並沒有同政治局常委們通氣，所以南巡講話的消息斷斷續續傳到北京，大家都不明白鄧小平的意圖。他有的話說得很重，如「誰不改革誰下台」！那個「誰」，是指哪一個？誰也猜不透。

最敏感的是楊尚昆。鄧小平一月十九日抵達廣東深圳。兩天後，一月二十一日，楊尚昆就趕到了。鄧小平帶著家人，楊尚昆也帶著家人。一月二

十二日上午，鄧小平和楊尚昆兩家三代人，在深圳仙湖植物園相逢，有一段談話。

鄧小平：「我們在一起幾十年了囉。」

楊尚昆：「我們是一九三二年認識的。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二，六十年了！」

（這時，楊尚昆的兒子楊紹明身揹三部照相機走來。）

楊紹明：「鄧伯伯，新年好。」

鄧榕（鄧小平之女）：「他是全國攝影家協會副主席呀！」

鄧小平：「你們楊家有兩個主席了！」

（兩家人還在植物園各種下一棵常青樹──高山榕。）

當天下午，鄧小平和楊尚昆，在深圳市迎賓館一起接見了深圳市領導人。由於那時楊尚昆還掌握著軍權，所以那回緊跟鄧小平南下，稱作「保駕護航」。楊尚昆大概不會想到，就在這年下半年，中共十四大召開，他同鄧小平兩家的友情即告終結，不再「常青」。

江澤民當時也猜不透鄧小平南巡真意何在？心情頗為不安，同曾慶紅商量之後，決定找鄧小平的牌友丁關根和鄧小平的小兒子鄧質方「通氣」，表白自己對鄧小平的忠誠，也訴說了在中央工作中的難處。

鄧小平表示理解，帶給江澤民的話是：「注意同鄧力群保持距離」。那意思很明白：南巡中那句畫龍點睛的話：「警惕右，主要防止『左』。」指的是鄧力群們。鄧小平囑咐江澤民同「左」派保持距離，意味著他炮打的是「左」派，不是江「核心」。

二月二十一日，鄧小平結束「南巡」回到北京。二月二十八日，江澤民將鄧小平「南巡」講話要點作為一九九二年中央二號文件下發，要求「盡快逐級傳達到全體黨員幹部」。江澤民自己重返中

央黨校，宣講鄧小平南巡講話。

接著，江澤民提出，「中共十四大報告要以鄧小平南巡講話作為貫穿全篇的主線」，「著重闡明為什麼要毫不動搖地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就是要一百年不動搖！」

江澤民說：

「對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有這麼幾種提法：

（一）建立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體制；

（二）建立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市場經濟體制；

（三）建立社會主義市?經濟體制。我個人的看法，傾向於使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提法。」

鄧小平對江澤民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寫進十四大報告稿表示讚賞，說「報告有份量」。

「十四大」鄧小平擊退陳雲路線

中共十四大是鄧小平「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路線擊退陳雲「鳥籠經濟」路線的一次大會，也是江澤民鞏固「第三代核心」地位的一次大會。鄧小平為十四大挑選的政治局常委會，有幾個特點：

第一，原來的三個陳雲派常委，姚依林、宋平出局。剩下一個李鵬、名義上仍是國務院總理，已無法主導經濟政策。

第二，朱鎔基進入政治局常委，雖然職務上只是副總理，但實際上掌握經濟大權，被稱為「經濟沙皇」。鄧小平在推薦朱鎔基時說：「我自己不懂經濟，但聽得懂；我現在推薦朱鎔基，他懂經濟」。鄧小平還批評了反對市場經濟的人，是「沒有常識」。

所以中共十四大，可以說是從路線到組織人事全面廢棄「陳雲鳥籠經濟思想」的分水嶺。十四大

後的「江、李、朱」體制，實際上是「江、朱體制」，李鵬的影響力已式微。

第三，七十六歲的老將軍劉華清進入政治局常委，並非如當時評論家所言增強軍隊在中央決策的影響力，而是鄧小平為江澤民鞏固軍權。

鄧小平在「南巡」時楊尚昆的「保駕護航」中，察覺江澤民在軍隊中無威望；讓楊尚昆、楊白冰兄弟掌控了軍隊，對江澤民的軍事統帥權將構成威脅。所以他寧可同相交六十年的老戰友「割袍斷義」，也要在中共十四大削掉「楊家將」的兵權，以劉華清取代「楊家將」，因劉華清沒有個人政治野心，可以幫江澤民讓軍隊「服從黨的絕對領導」。

鄧小平廢胡耀邦、廢趙紫陽、棄楊尚昆，有一點值得注意，忌諱他們對外「樹立自己形象」。陸鏗的《胡耀邦訪問記》，張五常的《陪同弗里特曼會晤趙紫陽》，《紐約時報》的《誰將拿到鄧小平的斗篷》，這三篇海外評價胡、趙、楊的文章，刺激了鄧小平對三人的反感。

第四，四十九歲的胡錦濤進入政治局常委，比鄧小平自己進入常委時（一九五六年，五十二歲）

還年輕，那是對「江澤民之後」繼續推行「鄧小平路線一百年不變」的長期佈局。

鄧為江全面掌權掃清障礙

這三個新人，朱鎔基、劉清華、胡錦濤，是鄧小平精心挑選：兩個是過渡，一文一武，幫「第三代核心」江澤民鞏固權力，朱鎔基幫江澤民統帥經濟，劉華清幫江澤民統帥軍隊；胡錦濤則是未來接江澤民班的隔代「儲君」。鄧小平下好這三步棋，自我感覺良好，他可以高枕無憂了。至於同江澤民、李鵬一起留下的老人喬石、李瑞環，在鄧小平看來，已是無足輕重的保留席了。

鄧小平在十四大作出的另一重要「改革」，就是取消設置了十年之久的「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也就是取消了「退休」老人的干政權。當時有人主張保留一個七、八個人的「顧問小組」，讓鄧小平、陳雲、李先念、楊尚昆、薄一波、萬里、王震、宋任窮等七、八個人保留干政權，也被鄧小平否決。

在十四大結束之後五個月召開的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鄧小平把楊尚昆的最後一個位置—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也給了江澤民。這就為他

的「第三代核心」全面掌權掃清了道路。所以江澤民說，一九九二年的中共十四大，是他「個人的歷史轉折點」。

二○○九年六月十六日，台灣淡水

江澤民啟用「風派」和「海派」

十四大以後，意識形態領域中的「左」派，如「左」王鄧力群手下的高狄、何東昌、王忍之、賀敬之等，紛紛離開他們主管的部門，讓江澤民安排進自己的人馬。這已是十年來反右防「左」的第三次大洗牌。

第一次是反胡耀邦的「自由化」。從中央黨校開始，到《人民日報》、中央宣傳部、各意識形態部門，清洗認同自由、民主、人道主義普世價值的改革派。第二次是「六四」屠殺後的大逮捕、大清查，把胡耀邦下台後趙紫陽時期留下的和新任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一網打盡。經過這兩次反右大清洗，體制內自由派知識分子已經絕跡。意識形態各部門由「左」王鄧力群全面掌控，思想文化陣地全部落入「左」派之手。

十四大後的第三次洗牌，江澤民洗掉了「左」王鄧力群手下的一批人，例如被鄧小平點名的高狄，以示「同鄧力群保持距離」。江澤民啟用的，一部分是原來鄧力群「左」派營壘中「見風轉舵」的「風派」，一部分是上海調來的「海派」。前者如鄭必堅、滕文生，後者如周吉、王滬寧。「風派」和「海派」，都是意識形態「左」派，表現形式略有不同。「風派」是老「左」派，原來言必稱馬、列、毛，十四大後，在馬、列、毛後加上鄧、江，變成言必稱馬、列、毛、鄧、江，政治上就「絕對正確」了。「海派」是新「左」派，就是多了一點「西方理論色彩」和「西方商業色彩」。如王滬寧到美國轉了一圈，回來就寫出一本《美國人反對美國》，這在美國沒有什麼新奇，但在中國一出版，就奇貨可居了。江澤民喜用這兩派人毫不奇怪，因為他自己就是政治上「風派」兼「海派」的雙料人物。

從中共十三大到十四大（一九八七──一九九二），是鄧小平帝國最終確立其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的五年，其間可略分兩個階段。

鄧小平玩弄左傾政治平衡術

第一階段。從十三大到十三屆四中全會，鄧小平的重點是除右防「左」。一手利用陳雲集團在胡耀邦辭職後發動的反自由化攻勢，清除了思想文化部門的民主改革派；另一手利用趙紫陽，頂住陳雲集團把「反自由化」擴展到經濟領域，在十三大確立「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鄧小平路線」。

在十三大的政治局常委班子裡，鄧小平仍在玩弄他的政治平衡術。但由於支持胡耀邦的民主改革派既被清除，這「平衡」只能是向「左」傾斜的假平衡。五個常委，趙紫陽之外，兩個極「左」：李鵬、姚依林；兩個中間偏右：胡啟立，喬石。

趙紫陽看到了這一點，所以面對「左」派的「反自由化」強大攻勢，在政策上和處理上有意作出嚴格限制。如把「反自由化」限於思想文化領域，不得擴大到經濟領域；又提出「思想文化領域工作的黨員中，有些人擁護四項基本原則，而有點保守僵化，也有些人熱心改革開放，而講了點過頭的話，既不要把前者看成教條主義，也不要把後者看成自由化分子，都屬於認識上的片面性，都是要教育團結的人」。在討論「左」派提出的處分「自由化分子」名單時，趙紫陽採取了保護和拖延戰略，使一批被鄧力群列入清洗名單的人得以倖免。

趙紫陽的這些措施，得罪了陳雲、李先念、薄

一波、王震、鄧力群、胡喬木等本想趁胡耀邦下台之機擴大「左」派權勢的黨國大老。他們很快把原來指向胡耀邦的矛頭轉向了趙紫陽，攻擊「趙紫陽比胡耀邦更胡耀邦」！

「左」派在胡耀邦下台時未能實現的權力擴張，在鄧小平「六四」屠殺、廢黜趙紫陽之後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再次獲得實現的機會。經過「六四」屠殺後的大逮捕、大追查、大清洗，鄧小平心目中的「自由化」分子已追殺殆盡。連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中央政治局常委秘書鮑彤都一遭軟禁，一囚獄中，鄧小平的「警惕右」，可高枕無憂，堪憂的是「防止『左』」了。「左」王鄧力群雖未能晉身總書記之位，但他的「左」派大軍已控制全國思想文化戰線。總書記又是陳雲、李先念聯手提名獲鄧小平支持的江澤民，政治局常委中「左」派佔優勢（李鵬、姚依林、宋平），不怕江澤民不跟著向「左」走。

這局面是鄧小平一手造成，可見其「除右務盡」決心之大；這同他至死堅持「反右派鬥爭」之「必要」一脈相承，足以反證毛澤東視鄧小平為「走資派」之判斷錯誤。歷史已經證明，鄧小平是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和實踐的堅持者，他以「資產階級自由化」罪名打倒胡耀邦、趙紫陽，企圖把這兩位改革元勳從中國歷史上除名，其手段與毛澤東在「文革」中把開國元勳打成「走資

派」，從中國歷史上除名如出一轍。鄧小平否定的，只是「文化大革命」，毛把他打成二號「走資派」而已。

「除右」易，「防左」難

第二階段，從十三屆四中全會到十四大。鄧小平在「韜光養晦，冷靜觀察」中，終於發現，在中國這個共產黨一黨專政國家中，「除右務盡」易，「防『左』再起」難。除胡耀邦、趙紫陽改革元勳易，除「左」王、「左」老「全面批鄧小平路線」難。但再難，也難不倒鄧小平。

過去鄧小平的注意力，主要在「警惕右」，警惕胡耀邦、趙紫陽。因為胡、趙堅持改革、開放是毋容置疑的，「天坍下來由胡趙頂著」，這是鄧小平自己講的，講給反改革開放的陳雲聽的。但對胡、趙會不會離開他的「四項基本原則」，「樹立自己的開明形象」，鄧是多疑的。趙紫陽說，「六四前鄧一直支持我」，恐怕未必。一九八八年下半年十三屆三中全會後，鄧小平對趙紫陽的信任開始動搖，起因也同對胡耀邦一樣，疑忌趙紫陽「樹立自己的開明形象」。幾件小事：趙紫陽會見美國自由派經濟學家弗里特曼受到讚揚，手下智囊提出「新權威主義」主張，紀念戊戌百周年有人鼓吹「乾綱獨斷」，以及向李光耀推薦《河殤》等，都觸動

鄧小平那根敏感神經。趙紫陽雖然沒有感覺到，但他身邊的「左」派李鵬、姚依林們已感覺到了。所以早在胡耀邦去世、學運開始之前，常委會中對趙紫陽的反叛已經出現。

　　鄧小平要利用一九八九年學生運動去趙，如同他利用一九八六年學生運動去胡一樣，是他對付「國際大氣候」（全球民主浪潮）和「國內大氣候」（中國民主運動）的大戰略，是必然的選擇。要不然，鄧小平為什麼始終不肯把軍權交給胡、趙，也不肯把毛澤東那顆「核桃」交出來？

　　鄧南巡炮打中央

　　事後再來看這五年鄧小平的動作，就可以明白，為了鞏固他的「鄧小平帝國」，鄧小平確比毛澤東高明。他「除右務盡」的大動作，是學毛澤東的，把自由民主力量從黨外（民主牆、民主運動）到黨內（胡、趙民主改革力量）一網打盡。鄧與毛不同的是，毛只有反右一手，沒有反「左」，連反林彪也不反「左」、只反右，所以反不下去。鄧小平卻準備了兩手，一九九二年要開中共十四大，鄧小平的反「左」一手已「蓄勢待發」了。

　　但鄧小平明知在北京中央，經濟大權控制在烏

籠派手中，完全沒有反「左」空間。要掃除北京「左」派，只有舉家南巡，靠地方炮打中央。而地方特別是東南沿海地區，多年來受中央鳥籠派無理打壓，正在伺機而動。經鄧小平南來一引爆，果然威震全國。

當時人們看不懂鄧小平南巡意圖，他把分歧提升到「全面批鄧小平路線」的高度，加上楊尚昆、楊白冰兄弟渲染軍隊為鄧小平「保駕護航」，容易使人聯想一場全國全面的路線鬥爭又將開始。

其實鄧小平的目標：一是打擊「左」派。鄧小平清除了以胡耀邦、趙紫陽為代表的自由派改革力量之後，自然突出了經濟領域陳雲的鳥籠路線和鄧小平開放路線的衝突，使陳雲的鳥籠經濟路線在中央佔了上風。鄧小平要繼續他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路線，必須及時把經濟「左」派清除出權力核心。十四大正是這樣的時機，所以鄧小平必須在十四大前出擊。

二是警告江澤民，必須同「左」派和陳雲路線劃清界限。

鄧小平這兩個目標，在十四大都達到了。「左」派不戰而降，陳雲人馬退出中央權力核心，陳

雲本人從此不再干預中央工作。江澤民衷心感激鄧小平對自己的支持，尤其是除掉「楊家將」勢力，為江澤民掌握軍權清除了障礙。

十四大後，汪道涵曾問江澤民：「今後有何打算？」江答：「主要是掌握好軍隊和思想領域，一手槍桿子，一手筆桿子」。

當時頗遭人譏諷，以為江澤民還是毛澤東的老一套，缺乏「新思維」。

江澤民自有他的道理。在經濟領域，鄧小平既然信任朱鎔基，朱又是獨裁性格，就放手讓「朱沙皇」去管，出了差錯也由他去負，像毛澤東對待周恩來一般。江只要保留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的位置，略加控制即可。對江澤民來說，最重要是控制軍隊和意識形態。毛澤東和鄧小平鞏固權力，都靠這兩手。鄧小平清除了意識形態領域的右派和「左」派，又清除了軍隊中有影響力的楊家兄弟，就是為江掌握這兩桿子創造條件，江澤民當然心領神會。

十四大後，鄧小平的開放式專政路線已徹底戰勝陳雲的鳥籠式專政路線。江澤民不再需要看兩個婆婆（鄧小平和陳雲）臉色行事，只要看鄧小平一

人即可。鄧小平也看出江澤民已定下心追隨鄧小平路線「一百年不動搖」，就不再說三道四了。

江澤民奉行鄧南巡講話路線

江澤民十四大後執政的十年（一九九二—二○○二），以鄧小平去世（一九九七）為界，可分為前後兩個時期。

（一）鄧小平在世的五年（一九九二—一九九七），江澤民奉行鄧小平「南巡」講話規定的路線，避免「樹立自己的形象」，在軍事、外交、兩岸、意識形態領域逐步鞏固自己的權力基礎。他自任中共中央財政經濟、外交事務、台灣事務三個「領導小組」的組長，並讓鄧小平信任的橋牌搭擋丁關根當中央宣傳部長，協助他掌控思想文化部門。

第一，抓槍桿子，建立忠於「第三代核心」的現代化黨軍。

江澤民鞏固軍權，著重抓兩條。一條是強調「黨指揮槍」、「軍隊服從黨的絕對領導」。江澤民說：

「中國人民解放軍是執行黨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它以黨的宗旨為宗旨，以黨的目標為目標，就是用槍桿子鞏固政權。軍隊工作最根本的是保證黨的絕對領導，一定要在全軍樹立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觀念，任何時候都要聽黨中央的話，保證槍桿子永遠掌握在忠於黨的可靠的人手裡。西方敵對勢力為實現其『西化』、『分化』中國的圖謀正在伺機對我軍進行滲透和破壞，他們鼓吹的『軍隊非黨化』和『軍隊非政治化』那一套，就是妄圖改變我軍的性質，使我軍脫離黨的領導。」

江澤民採取的另一措施是強化和擴大武裝警察部隊，建立國防軍─武警部隊的「流水制」，即從國防軍轉為武警部隊。江澤民提出「把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建成維護社會穩定的一支重要力量」。他說：

「必須時刻警惕某些滲透進我國搞顛覆活動的外國勢力。必須把任何危及社會穩定的跡象消滅在萌芽狀態中。這是人民武裝警察的職責。」

這是江澤民接受一九八九年學生民主運動教訓的一項新措施。那時學生「人民軍隊愛人民，人民軍隊人民愛」的口號，使軍人在執行鎮壓學生命令

時產生困惑。現在改為「武裝警察部隊鎮壓顛覆活動」的使命，執行「消滅危及社會穩定的跡象於萌芽狀態」的命令，就「師出有名」了。

但這樣，號稱「人民的軍隊」，就變成鎮壓人民的「黨衛軍」了。

另一條是強調「科技強軍」，準備打「高科技條件下的現代戰爭。」

毛澤東時代的軍事戰略是防禦戰略，所謂「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要準備打仗」，是防禦蘇聯進攻。

鄧小平時代國際形勢變化，中美建交後蘇聯威脅減弱。一九七九年中國入侵越南，蘇聯袖手旁觀。鄧小平從此放心裁減軍隊，緊縮軍事預算，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

江澤民在國無外敵威脅的和平環境中，每年軍費支出兩位數字增長，遠遠超過經濟增長率，花費大量外匯向俄羅斯、烏克蘭購買先進軍事裝備，引進現代軍事技術，加快發展大規模進攻性武器。江

澤民主張「科技強軍」，「把解放軍建設成為強大的現代化正軌化革命軍隊」，「重視國防科技研究和國防工業，改善武器裝備，全面增強戰鬥力，適應打高科技現代化戰爭的需要。」江澤民說：

「什麼叫現代戰爭？海灣戰爭可以說給我們上了一課。如果我們不掌握現代科技知識、軍事知識，怎麼能懂得高科技條件下的現代戰爭？」

江澤民在軍事戰略上從對內防禦轉向對外擴張。軍方提出的「外向軍事戰略」，「第一個踏腳板是台灣，如果不把台灣拿過來，中國就永遠難以外向，永遠困守在中原大陸。」

第二，抓筆桿子，從號召學習《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開始，到逐步提出江澤民自己的「理論創新」。

一九九三年《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出版，江澤民立即作出《中共中央關於學習〈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的決定》，組織全國全黨學習。他親自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理論研討班」上作《用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武裝全黨》的講話。江澤民說：

「新一卷《鄧小平文選》是這十年鄧小平同志領導我們進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豐富經驗的理論結晶，是引導我們繼續勝利前進的科學指南，博大精深，閃耀著馬克思主義真理的燦爛光輝。」

「鄧小平同志是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他立足中國大地而又面向世界，高瞻遠矚地構思和設計了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整套發展戰略，進行艱辛的鍥而不捨的理論探索，使馬克思主義理論在當代中國進入了新境界，達到了新高度。」

江澤民推崇鄧小平理論的「新境界、新高度」論，可與當年林彪推崇毛澤東思想的「里程碑、頂峰」論「試比高」。

至於江澤民推出「自己的東西」，均未達到他預想中的效果。在十四屆五中全會上，江澤民有兩篇「重要講話」：一篇是在全會召集人會議上講的《領導幹部一定要講政治》（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七日），一篇是在全會閉幕時講的《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若干重大關係》（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八日）。據說江澤民講得津津有味，與

會者卻聽得昏昏欲睡。江澤民在第一篇中說：

「我們搞現代化建設，中心任務是發展經濟，但必須有政治保證，不講政治、不講政治紀律不行。這一點對高級幹部尤其重要。西方敵對勢力要『西化』、『分化』我們，要把他們那套『民主』、『自由』強加給我們，李登輝要搞『台獨』，我們不講政治行嗎？不警惕不鬥爭行嗎？」

江澤民在這裡樹立了兩個敵人：一個是「西方敵對勢力」，「要把自由民主強加給我們」！一個是「李登輝搞台獨」，使台灣在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向民主國家轉型，自由的台灣人民不可能接受共產專制國家的吞併。

這兩個敵人其實只是一個，即民主自由。江澤民害怕民主自由，故意把中國人民內在的自由民主要求予以「外化」，化為西方和台灣的「敵對勢力」。誰要自由民主，就是與西方和台灣的敵對勢力站在一起，就該被消滅於萌芽狀態！

二○○九年六月十六日，台灣淡水

第二篇論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十二大關係，是模仿毛澤東一九五六年的《論十大關係》。因內容空洞，了無新意，發表後反映冷淡。一年後，江澤民從上海帶來的「筆桿子」劉吉動員一批人專門寫了一本書《與總書記談心》。劉吉在《序》中說：

「江澤民總書記《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若干重大關係》一文發表已快一年了。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三代領導的標誌性著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和十分深遠的歷史意義。隨著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發展，必將進一步證明這一點。」

結果如一箭之射大海，未能激起一絲浪花。這個劉吉也不再受江澤民的青睞了。

第三，主導對台政策，提出「八項主張」。

十四大前，中央對台事務領導小組由楊尚昆主持。自一九九○到一九九一年底，楊尚昆已有密使楊斯德與李登輝的代表蘇志誠多次在香港秘密會見，屬於雙方互相摸底性質。江澤民當時已被鄧小平封為「第三代核心」，有心涉足對台事務，但又不好直接插手楊尚昆的領域，就另闢蹊徑，邀約參與起

草《國家統一綱領》、在台灣頗有名望的「四大公子」之一的沈君山（其他三人為連戰、陳履安、錢復；沈君山在四人中最有才氣）作了三次長談，在當時也是秘密的。沈君山每次都作詳細紀錄向李登輝報告。

一九九二年起江澤民直接掌控密使，開始由汪道涵與蘇志誠會談，確定了一九九三年在新加坡舉行辜、汪會。以後汪道涵公開主導對台事務，江澤民改派曾慶紅為密使。現在爭論不休的所謂「九二共識、一中各表」決定新加坡辜汪會的話題，根本是蘇起一類政客賣弄玄虛製造出來的東西；當時的事實，就是雙方密使談妥，需要一個兩岸開始交往的形式。

在一九九二年密使會談中。汪道涵提出國共兩黨談判討論和平統一問題。這本來是鄧小平的一貫主張，蔣經國時代鄧小平就想同蔣談，被蔣拒絕。

蘇志誠認為行不通。因為台灣有政府存在，只能由政府領導人出面才能解決問題。蘇志誠說：目前不可能一步走到李登輝與江澤民見面，是否可由汪道涵與辜振甫見面作為開始。

汪道涵回應：「這是個好主意，但談什麼呢

？」

蘇志誠說：「不談政治問題，不談統一問題；可以廣泛交換意見，先建立政府授權的高層對話機制，雙方溝通觀念。」

然後討論地點，汪道涵表示香港不宜，易有外部干擾。實際是暗指南懷瑾。江澤民對楊尚昆通過南懷瑾安排密使會面並不認同。蘇志誠建議地點可以在新加坡，由李光耀去安排；李光耀是雙方共同朋友，蔣經國時期就曾來往兩邊。

這就是一九九三年新加坡辜汪會的由來。

辜汪會後，江澤民改派曾慶紅與蘇志誠會面，地點不再在香港。一九九四年四月和十一月、一九九五年四月三次會面，都在珠海。雙方交換的主要訊息，包括：曾慶紅告知蘇志誠，江澤民將有重要對台政策宣示（即「江八點」），期待李登輝正面回應。蘇志誠告知曾慶紅，李登輝將訪問中東與美國，希望江澤民理解。

江澤民與李登輝的兩岸政策

一九九五年一月三十日，「江八點」發表。江澤民的對台政策原則上繼承鄧小平的「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和「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新內容」主要有兩點。一點是從鄧小平的一步到位談「和平統一」，改為分兩步走。第一步先進行「正式結束敵對狀態談判」，把「統一談判」放到第二步。另一點是從鄧小平的國共兩黨談判改為「政治談判的名義、地點、方式可協商，歡迎台灣當局領導人以適當身份訪問大陸，大陸方面也願意接受邀請到台灣訪問，藉以共商國是」，也就是可以接受政府對政府的談判。

這兩點變化，是江澤民通過密使來往的「心得」；事實上「江八點」也是汪道涵主導起草的。

李登輝通過密使來往，也摸清了江澤民的底細：江澤民的對台政策並不比鄧小平寬鬆，是更狡猾，「引君上?」，再吃掉你。這一點在沈君山同江澤民三次談話中已十分清楚。沈君山苦口婆心地對江澤民提出種種建議，如「一而不統」、「一國兩治」、「對等政府，兩個治權」等等，均被江澤民一概否定。江澤民對沈君山說：

「你是想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這個結給繞過

去，把主權問題繞過去，這個結是繞不過去的。我們反對兩個中央，還有邦聯、國協等等，中國從來不興這一套！只要我坐在這個位子一天，就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中央政府。別的人坐上這個位子，也是一樣！任何外交空間與統一背道而馳的一定排除。要是搞分裂，那對不住，共產黨不會手軟的。」

江澤民還給沈君山引了《左傳》中的《子產論政寬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

這就表明，從鄧小平到江澤民，以至將來「別的人」，對台灣的長遠戰略是不變的，和平方式與非和平方式兩手都在加緊準備，台灣必須制定相應的長遠戰略。李登輝的戰略是：

—政治民主化。通過憲政改革，實現公民直接選舉總統，完成主權在民的國家制度轉型。

—軍事現代化。終止動員戡亂，放棄「反攻大陸」，建立台灣自主防禦能力，保衛台灣人民的生存與自由。

—經濟國際化。實現台灣產業的現代化轉型，提升台灣經濟在全球的國家競爭力。

—外交務實化。加強與非邦交國的交往，擴展台灣的國際空間。

一九九五和一九九六，台灣在政治與外交方面有兩大戰役，一是一九九五年李登輝打破中國封鎖，成功訪問美國康乃爾大學；二是一九九六年台灣人民以選票戰勝中國飛彈威脅，選出自己的國家總統。

江澤民在這兩大戰役中都失敗了。

第四，靠朱鎔基「拚經濟」，確立中國特色的開放式奴役經濟新典範。

朱鎔基遵循鄧小平「南巡講話」大開國門，港、台和西方資金、技術源源流進中國，同「取之不竭」的廉價「農民工」結合，促進GDP年年兩位數字增長。一九九二年增長百分之十四點二，一九九三年增長百分之十三點五，一九九四年增長百分

之十二點七，因發展過快造成一九九四年通貨膨脹，朱鎔基實行「宏觀調控」，使一九九五年增長率降至百分之十點五，一九九六年再降至百分之九點六，稱為「經濟成功軟著陸」，然後又恢復兩位數字增長，使中國迅速成為「世界製造工廠」，中國特色的開放式奴役制度經濟模式在西方自由資本灌溉下開始「崛起」。關於這一主題，將在下文《民族主義新奴役制度帝國的崛起》中詳加論述。

（二）鄧小平去世後的五年（一九九七至二○○二），江澤民開始走自己的路，主要是在理論和外交兩個領域，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走向國際樹立「世界領袖」形象。

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九日，鄧小平去世，把他創建的新帝國交給了江澤民。江澤民當時講了被形容為「擲地有聲」的三句話：

—「鄧小平理論是我們的主心骨。」

—「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

—「我自巋然不動。」

那一年中共要開十五大，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江澤民說：「十五大報告的靈魂，就是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結束語要講準備迎接風險」。江澤民還回顧一九八九年的往事：「當我接任總書記時，我想一定還有比我能力更強、資歷更深的幹部……」。此時曾任鄧小平辦公室主任的王瑞林打斷他：「總書記，您自謙了，我們都知道這是小平同志做出的安排。」

另外，自二月十九日起，到二月二十五日追悼大會上，電台反覆播放鄧小平的一段錄音：「確定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是我們全黨做出的正確選擇。」在二月二十五日人民大會堂舉行的追悼大會上，江澤民宣讀五十分鐘的悼詞過程中，五次停下來以手帕拭淚。

一九九七年九月舉行中共十五大，江澤民作了題為《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的報告。報告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兩次歷史性飛躍」突出了「鄧小平理論的歷史地位」。江澤民說：

「第一次飛躍的理論成果是毛澤東思想；第二次飛躍的理論成果是鄧小平理論。在當代中國，只

有鄧小平理論，而沒有別的理論能夠解決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問題」。十五大還修改了黨章，把鄧小平理論確定為黨的指導思想。

江澤民的新教條：三個代表

十五大以後，江澤民已不滿足於自己在這個帝國的最高權力地位，他打算在意識形態領域提出自己的新教條，確立自己在這個帝國的最高理論權威。江澤民的新教條就是「三個代表」。

二○○○年二月，江澤民到了廣東的一個小城高州，對六百名城鎮幹部講了一番話，首次提出他的「三個代表」：「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當時的廣東省委書記李長春說：「江主席關於『三個代表』的講話，就像鄧小平同志一九九二年南巡講話一樣，是一個巨大的推動力量。」

到了二○○○年五月，江澤民再次宣講他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時，已經上綱到「這是我們黨的

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了。

胡錦濤也在一次會議中指出，「江澤民同志的『三個代表』思想，是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發展。」

一些國際評論家看不懂江澤民語意中的奧妙，以為這「三個代表」將擴大中國共產黨的社會基礎，吸收資本家和文化人入黨，共產黨就要「和平演變」了。

「三個代表」在理論上是不通的。誰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是代表一個時代引領生產前進的人類智慧和創造力的科學思想高峰，如牛頓代表的機械化時代，愛因斯坦代表的電子、資訊、數位化時代。中國共產黨靠專制制度奴役不自由勞工榨取財富，豈能冒充先進生產力？誰是先進文化的代表？蘇格拉底、但丁、莎士比亞、孔子、莊子、李白、曹雪芹、魯迅。箝制思想、踐踏文化的中國共產黨豈能冒充先進文化？誰是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只能是廣大人民自由意志選出的代表，中國共產黨豈能強姦人民意志自封代表？

江澤民創造出如此荒唐「理論」自封「三個代表」，其目的就是意圖鞏固一黨一己壟斷中國經

濟、政治、文化的全面專政。照當時一位御用理論家康曉光的闡釋：中國共產黨代表「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包括國內外兩個聯盟。國內是所謂「政治菁英」、「經濟菁英」、「知識菁英」的「三角聯盟」。國外是同全球跨國資本的聯盟。通過這兩個聯盟，剝奪中國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自由自主權利，榨取他們生產的物質和精神財富，換取本國權貴菁英與國際資本對中國專制奴役制度的支持。而所謂「代表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是「給大多數老百姓留口飯吃，繼續過日子」的「穩定」。康曉光寫道：

「中國未來的首要任務是確立『三個代表』的霸權地位，並根據『三個代表』的精神從事制度建設。只要菁英們還讓很大多數老百姓活下去，在掠奪瓜分之餘還給他們留下一口飯吃，他們就會接受現實，忍氣吞聲繼續過日子。這意味著，大眾中絕大多數還是擁護穩定的。」

康曉光的結論是：「專制政治具有巨大的適應能力，不僅可以適應農業經濟，也可以適應工業經濟，不僅可以適應計劃經濟，也可以適應市場經濟，甚至還可以適應全球化。」

從這位御用理論家的闡述中，可以看出江澤民的「三個代表」，雖然在理論上荒唐，在實踐上卻

是有效的。它代表中國特色的反自由、反民主、反平等的發展觀，是適應「市場經濟」、「全球化」需要的現代奴役制度新論述。

江用心塑造自己的國際形象

江澤民在鄧小平去世後，除了致力於「發展」鄧小平理論之外，就是用心塑造自己的「國際形象」。

一九九七年十月，江澤民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為了推銷自己，他在臨行前接受《華盛頓郵報》專訪，要求記者事先交上提問單子，為這場表演作了充分準備。

在回答西藏和台灣問題時，江澤民拿出他最拿手的林肯蓋茨堡演說，對記者說：「林肯是美國卓越的領導人，他解放了奴隸。中國除西藏外早已廢除奴隸制，直到達賴離開西藏，我們才消滅了那裡的奴隸制，你們為什麼還要支持達賴？」

江澤民又說：「林肯領導美國內戰除了解放奴隸，目的是統一美國。為什麼你們有人卻支持台灣

分裂、反對統一中國呢？」

　　這就是江澤民欺騙美國人的詭辯術。林肯演說的中心是自由民主，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家。江澤民迴避中國反自由反民主的奴役制度對西藏宗教、文化的壓迫和對台灣自由民主的威脅，隨意拿林肯消遣一番，就封了美國人的口。

　　當問到中國迫害人權的六四屠殺時，江澤民端出了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他說：「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也可以運用到人權問題上，民主與人權都是相對的概念，並不是絕對而普遍的。」

　　這不僅是對相對論的無知，而且是對愛因斯坦這位人權戰士的褻瀆。我在這裡還要補充一點，愛因斯坦對他的「相對論」說過這樣一句話：

　　「現在談『相對論』一詞。我承認這是不幸的，它給哲學上的誤解以機會。」

　　──致奇默（E. Zschimmer）的信，一九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當初愛因斯坦提出自己的理論時，並沒有使用「相對論」這個名稱。「相對論」是普朗克為愛因斯坦的理論命名的，愛因斯坦不喜歡這個名稱，他寧可稱作「不變量理論」。從愛因斯坦致奇默信中流露的憂慮來看，他似乎預料到將會有江澤民這樣的人利用「相對論」這個名稱來製造「哲學上的誤解」。另外，當年坎特伯雷大主教戴維森（Randall Thomas Davidson）問到「相對論」對宗教有什麼影響時，愛因斯坦回答：「相對論純粹是科學問題，與宗教毫不相干。」

愛因斯坦一生肯定人權的普世價值，明確反對「國權高於人權」之類的法西斯謬論。愛因斯坦說：

「國家是為人而建立的，但人不是為國家而生存的。這就是說，國家應該是我們的僕從，而我們不應該是國家的奴隸」。

我補充這一點，只是想說明愛因斯坦這樣的智者，不是江澤民那種小丑隨意玩弄得了的。

二○○九年六月十六日，台灣淡水

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江澤民抵達訪美的第一站夏威夷，在威基基海灘游泳一小時，游程一公里。中國領導人喜歡藉游泳顯示個人權力。毛澤東暢游長江，鄧小平游到內海，現在江澤民游進遠離中國的東太平洋，這是有象徵意義的。

二十八日晚間，克林頓邀請江澤民到白宮進行「親密的、個人的、非官方的會談」（美方用語），克林頓投其所好，向江澤民展示了林肯親筆繕寫的蓋茨堡演說，江澤民果然情不自禁地高聲朗讀起來。兩人一直談到深夜，克林頓後來在他的回憶錄《我的人生》中寫道：

「我對他（指江）的政治手腕、推動中國進入國際社會的渴望，以及在他及總理朱鎔基的領導下經濟的加速成長，都感到印象深刻，但我仍然關注中國持續壓制基本自由的問題。我們繼續討論中國可以接受在自由上有多大改變而不會導致中國內部的混亂。我們沒有化解歧見，但是加深了彼此的了解。我想，中國已接受現代社會潮流洗禮，變得更為開放；而在新世紀裡，美中兩國更有可能成為夥伴，而非敵人」。

江澤民需要美國支持鞏固權力

這正是江澤民的目標。他不僅需要美國對他個人權力地位的支持，而且需要美國對他從鄧小平手中接過來的龐大帝國的發展的支持，他需要美國成為他的帝國走向新世紀的戰略夥伴。為了實現其戰略目標，江澤民身上還帶著採購單，包括三十億美元的波音飛機和六百億美元的核能發電設備的訂單。江澤民還跑到紐約華爾街去敲響證券交易所的開市鐘。向來共產黨宣稱他們「敲響了資本主義的喪鐘」，江澤民去敲資本主義生命之鐘確是不同凡響，表明他不但不會「埋葬資本主義」，還歡迎美國資本主義去同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存共榮。華爾街的鐘聲感動了美國大商人，誰不想去嚐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甜頭？

克林頓在一九九二年競選總統時再三聲明，提倡民主是他的「第一優先要務」。他批評布殊的中國政策「軟弱」，他要認真對付「從巴格達到北京的暴君」。然而克林頓一見江澤民，就忘記了天安門屠殺和北京暴君。他只看到江澤民手中滴著中國人的血和淚的錢！這就是江澤民能夠成功地同克林頓締結「中美兩國走向二十一世紀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的物質基礎。

江澤民此行的最後一場餘興是哈佛演講。十一

月一日上午江澤民一行抵達時，五千餘人已在Cambridge街頭，表達對拒不認錯的天安門屠殺的憤怒譴責。江澤民演講的主題是「從歷史文化認識中國」，告誡人們不要從西方文化視角看中國，要從中國特有的文化傳統理解中國，也就是繼續發揮他那自由、民主、人權「相對論」哲學。演講結束後就十五分鐘提問，提問的五個問題是事先挑選好的，由會議主持人傅高義（Ezra Vogel）宣讀。其中一個問題是：

——「江澤民要求西方國家不要搞對抗而是進行對話，但為什麼拒絕跟自己的人民對話？」

這個提問顯然是針對「六四」的。因為當時鄧小平拒絕了趙紫陽與學生對話的主張，下令軍事鎮壓。

江澤民故意裝糊塗不予正面回答。他說：「中國是個具有多樣性的國家，要治理這樣一個國家很難、但在中國有各種渠道可以了解人民的看法，我自己就到處聽取人民的意見，使政府得到人民的支持。」接著又說：「政府工作中也難免有缺失，會努力改善。」

天真的美國學者、媒體都會錯意，誤以為這是

江澤民對「六四」屠殺認錯。主持人傅高義說：「江澤民親身體驗了美國民主，承認天安門事件有錯誤。意義重大。過去沒有中國領導人這樣說過」。第二天美國各報均顯著報道這一消息。

隨行的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立即會見記者予以更正，指出「江主席沒有這個意思！」

奇怪的是幾年後出版的克林頓回憶錄上仍然寫著：「江澤民在哈佛大學進行的演說中承認，中國對付天安門示威群眾的行動是錯誤的。雖然中國的步調常慢得令西方世界心急如焚，但中國並不是不可能改變的。」

「八個是」和「三個不」

第二年（一九九八）克林頓專程回訪中國九天（比江澤民訪美多一天），是江澤民的又一外交勝利。當時《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威廉?薩費爾（William Safire）寫過一篇評論《八個是和三個不》（The Eight Yeses， The Three Noes），列舉江澤民白得八加三等於十一分，克林頓○分。

一、 對天安門鎮壓說「是」：克林頓出現在軍禮上，幫助江澤民毋需改正就抹掉對屠殺的記憶。

二、 對中國堅持克林頓訪問行程必須專一說「是」：排除了順道訪問日本和韓國的計劃。

三、 對中國否決美國總統的陪同訪問團隊說「是」：三個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因中國反對被排除出訪問團隊。

四、 對中國要求降低加入WTO標準說「是」：克林頓在上海電台稱「中國經濟尚不發達」，迫使WTO調降入會標準。

五、 對中國迫害異議人士說「是」：克林頓稱江澤民放逐魏京生，王丹是「自由的進步」。

六、 對江澤民需要美國對他個人權力的支持說「是」：克林頓以極度讚揚的語言「絕頂聰明」（extraordinary intellect）、活力充沛（a lot of vigor）、想像力豐富（good imagination）、「有遠見、有理想、能預見未來（he has vision, can visualize, can image a future）等等，表達美國對

這位共產帝國專制統治者的政治背書。

七、 對中國拖延加入「飛彈技術控制體系」說「是」：江澤民需要更多時間出其他的飛彈技術，克林頓表示首肯。

八、 對中國強調的「中美戰略夥伴關係」說「是」：從而壓抑了美國的亞洲盟國。

以上是「八個是」。「三個不」，指克林頓在上海圖書館與八名各界人士座談時，說出「我們不支持台灣獨立，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我們不相信（don't believe）台灣將是主權國家組織的成員」。對江澤民來，重點是這「三個不」。因為他三個月後就要會見台灣的談判代表辜振甫了。江澤民期待這次「辜汪會」和「辜江會」能把政治談判提上議事日程。屆時國家主權爭議難以避免，因此在台灣問題上獲得克林頓的背書格外重要。

台灣的民主與對等戰略

一九九八年十月的辜汪會和辜江會，辜振甫打出了兩張王牌。一張是突顯「主權對等」，一張是

宣示「台灣民主」，突破了對方按「江八點」、「一個中國」設計的「政治談判」。這一戰略在台灣內部曾引發爭議，對海基會「打民主牌」的設計，台灣的外交部和陸委會均不表贊同，怕被對方認為挑釁。但李登輝主張，「台灣民主和主權對等，這兩個法寶缺一不可」，並決定讓台灣反對黨代表人物康寧祥擔任見證台灣民主的代言人。

結果台灣的民主與對等戰略大為成功。唐樹備原來設計的「一中政治談判」徹底破功。辜汪會第一天晚上，唐樹備氣急敗壞，在記者會上大批一通台灣「違背一中原則」，但只是虛張聲勢。等到辜江會一小時四十五分鐘的對話，辜振甫照樣笑談台灣民主，江澤民被動應對。

江澤民對辜振甫說：「你看我像是一個暴君嗎？我還是很開明的。」接著說：「對於民主，我有一個相對論的概念。我對克林頓也談過，我們的民主和其他國家不一樣，像村民選舉。有人問我，為什麼不可以從村到鄉，到縣，到省，一直到全國？我跟外國元首說，那不可能，毫無實現的可能，十二億人去選一個國家主席，怎麼個選法？」

辜振甫說：「民主的真諦是政黨政治，要放棄一黨專制，人民有自由選擇權。台灣可以提供這方

面的經驗。」

江澤民說：「我們也有八個民主黨派，其中有中國國民黨，都是參政意義的政黨。這是中國歷史形成的。十二億人，沒有一個堅強的 leadership 是不成的。像這次洪水來，只要一個電話給我，海軍陸戰隊馬上飆上去！」

辜振甫一行既堅持了主權對等和民主優勢，又達成「四項協議」，回國後到立法院接受質詢，不分朝野均給予肯定。江澤民從克林頓那裡得到的「三個不」，一個也未用上。

對江權威挑戰的兩個事件

一九九九年，發生了兩樁江澤民意料之外的「突發事件」：一件是四月二十五日法輪功包圍中南海，一件是七月九日李登輝發表「兩國論」。江澤民視之為對他個人權威的挑戰。

「法輪功」早在九十年代初期就與其他各種流派的氣功分別在中國各地流傳，並未引起江澤民的注意。四月二十五日那天，約一萬名法輪功練功者

在中南海周圍集合，起因是中國科學院院士何祚庥在雜誌上發表批判法輪功的文章，天津市的四十五名練功者到雜誌社抗議被警方拘捕，導致全國各地練功者來到北京向中央請願。當時朱鎔基接見了請願代表，答應以法處理，請願者也已解散。朱鎔基認為事件屬於人民內部矛盾性質。

　　當天晚上，江澤民給政治局委員們寫了一封措詞嚴厲的信：

　　「今天的事件，值得我們深思。人不知，鬼不曉，突然在黨和國家權力中心的大門口周圍聚集了一萬多人，圍了整整一天。其組織紀律之嚴密，資訊傳遞之迅速，實屬罕見。可是，我們的有關部門事先竟毫無察覺，而從互聯網上就能迅速找到法輪功在各地的組織聯絡系統，這還不發人深省嗎？資訊技術的迅速發展，給我們提出了新的課題。我們各個機關配置的電腦不在少數，是否有人注意到這些重要的社會動向呢？如果注意了，為何又沒有任何反映呢？這些問題都需要認真加以研究。此事發生後，西方媒體立即作了報道，並加以煽動性渲染。究竟同海外、同西方有無聯繫，幕後有無『高手』在策劃指揮？這是一個新的信號，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敏感期已經來臨，必須盡快採取得力措施，嚴防類似事件的發生。這次事件是一九八九年那場政治風波以來在北京地區發生的群體事件中人數最多的一次。難道我們共產黨人所具有的馬

克思主義理論、所信奉的唯物論、無神論還戰勝不了法輪功所宣揚的那一套東西嗎？果真是那樣，豈不成了天大的笑話？」

　　這封信的效果，法輪功被打成「邪教」，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專門立法予以取締，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專書《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論唯物論和無神論》，舉國上下展開對法輪功的大批判、大清查、大搜捕、大鎮壓。然而十年過去了，似乎江澤民的「唯物論」、「無神論」沒有消滅得了法輪功，讓江澤民自己「成了天大的笑話」！

二○○九年六月十六日，台灣淡水

　一九九九年七月九日，李登輝接受德國之聲廣播公司專訪。當記者問到中國視台灣為叛離的一省，台灣如何因應時，李登輝回答：

　　「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從未統治過台、澎、金、馬。我國在一九九一年修憲，增修條文第十條，將憲法的地域效力限縮在台灣，並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統治權的合法性；增修條文第四條明訂立法院與國民大會民意機關成員，從台灣人民中選出。一九九二年的憲改更進一步於增修條文第二條規定總統、副總統由台灣人民直接

選舉，使所建構出來的國家機關只代表台灣人民，國家權力的正當性也只來自台灣人民的授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完全無關。」

「一九九一年修憲以來，已將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亂團體，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個中國』的內部關係。所以北京政府將台灣視為叛離的一省，完全昧於歷史與法律上的事實。也由於兩岸關係定位在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因此沒有再宣佈台灣獨立的必要。」

李登輝這一宣佈打亂了江澤民「聯美制台」的戰略部署，江澤民本想利用克林頓在上海送給他的禮物──對台灣「三不支持」，等十月汪道涵訪台時再次推動「一個中國原則」前提下的政治談判。李登輝的「兩國論」等於取消了這個前提，使江澤民的對台戰略胎死腹中。

江澤民受此打擊，一面宣佈中止汪道涵訪台，一面趕緊接上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後斷掉的克、江「熱線」，在電話中要克林頓對台灣施壓。克林頓因「誤炸」事件理虧，只得恭恭敬敬同江澤民在紐西蘭登台合演了那齣最後的雙簧。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一日，克林頓與江澤民在紐西蘭奧克蘭舉行高?會後一同面對記者。江澤民說：「我們與李登輝的鬥爭，是維護還是分裂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鬥爭，我們從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

克林頓附和：「李登輝的兩國論給中國和美國都製造了許多麻煩，我今天願重申執行一個中國政策。」

江澤民的「政治遺產」

當歷史進入二十一世紀時，江澤民對中國的統治已接近尾聲。如果算一筆總賬，他統治中國十三年之久（一九八九—二○○二），僅次於毛澤東（一九四九——九七六），比鄧小平還長（鄧小平一九八○年十二月取代華國鋒任軍委主席，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卸任給江澤民，不過九年）。以成就來說，不過是踩著鄧小平的腳印，收割鄧小平播下的種。收回香港，收回澳門，引進資本技術發展經濟，提升綜合國力，都是鄧小平佈的局。同時他也繼承和發展了鄧小平的惡政，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權，強化一黨專政機器。他著重經營的對台戰略，從文攻武嚇到聯美制台，都被李登輝一一破局，終究一無所獲。

江澤民留下的屬於他個人特色的「政治遺產」，只有兩筆。一筆叫「三個代表」，已被中共十六大通過寫進黨章修正案，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並列為黨的指導思想，只是少了江澤民的名字。另一筆是鎮壓法輪功，大概也可以同毛澤東的「文革」、鄧小平的「六四」一道，並列於中國暴政史上。

二○○二年，輪到江澤民退場了。他雖已幹了十三年，似乎還在興頭上。大家都在懷疑，胡錦濤能不能接上班？那時中國民間又流傳著一個故事。

鄧小平去世前不久，曾單獨召見胡錦濤，同他談了一個舊夢，給了他一口密封的箱子。鄧小平說：

「六四之後，我夢見一個夜裡，與 李鵬、胡耀邦同車趕路，途中遇一毛驢擋道，無論怎麼按喇叭，毛驢都不動。李鵬喊『再不讓開，我戒嚴了！』仍不動。我喊『要開槍了！』還是不動。這時胡耀邦下車對驢耳語，驢即驚走。我問胡耀邦說了什麼？胡答：『我說你不走，就讓你當總書記』。我忽然醒來，想胡耀邦不是已經去世了嗎？」

鄧小平接著說：「這個夢讓我想起，歷來沒有一個總書記有好下場。毛澤東就是不當總書記，他當書記處主席、政治局主席。我當了十年總書記，也被打倒。江澤民當初也不想當，我給了他毛澤東那顆核桃才接受。我給你講這個夢，是想到我不在了，到時候江澤民不肯讓位。你就打開這口箱子。」

十六大前，江澤民果然不想讓位。胡錦濤打開箱子，裡面一張驢皮，一個驢頭；想起鄧小平那個夢，恍然大悟。

一個夜晚，江澤民回家途中，經西郊一條僻靜小道，見一毛驢擋道，猛按喇叭也不讓開。江澤民忽然想起鄧小平個夢，下車在毛驢耳邊輕聲說：「你不走我讓你當總書記了」。驢答：「好！你下我上，一言為定。」說罷脫下驢頭、驢皮，站在江澤民面前的是他最不想見到的胡錦濤。

江澤民知道這一定是鄧小平生前排好的戲，只得在十六大把總書記位置交給胡錦濤，自己還賴著軍委主席不交。

民族主義新奴役制度帝國的崛起

當二○○二年中共十六大結束，胡錦濤剛從江澤民手中拿到總書記的職務，江澤民自己還把持著中央軍委主席和國家軍委主席不放手的時候，不少人曾以同情和期待的眼光看著胡錦濤。當時胡錦濤似乎也有意博取人們的認同。

第一，發表「樹立憲法權威」的主題演說

胡錦濤當選總書記後發表的首次公開演說，打出了「憲法牌」。他在二○○二年十二月四日紀念「一九八二年憲法二十周年」大會上，強調「憲法高於一切」。他說：「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準則，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能凌駕於憲法權威之上」。他還說：「要抓緊研究和健全憲法監督機制，進一步明確憲法監督程序，使一切違反憲法的行為能及時得到糾正。」

胡錦濤的演說，引起黨內外正面回應。中共內部民主派元老李銳接受《二十一世紀環球報道》雜誌採訪時說：「中央領導談憲法，這是一個可喜的訊號。」

接著，二○○三年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與民主黨派人士舉行「民主協商會」。胡錦濤在回答民主黨派人士提問時說：

「政治改革，長期以來是黨內、黨外和社會各界的主流意見。政治改革是本屆中央政治局的一項重要工作。政治改革首先要在黨內、社會上確立憲法至高無上的權威，貫徹依法治國。在法律面前，黨組織、政府和黨政領導人，沒有任何特權。特權就是違法、踐踏法律。要建立對共產黨和領導幹部的有效監督機制，要確立全國人大是國家最高權力機構的法定地位。」

胡錦濤還說：「新聞解禁、開放人民輿論陣地，是社會的主流意見和訴求，是正常的，要以立法形式解決。」「共產黨自身不改革，不改造，就會失去生命力，走向自然消亡。」

自二○○三年初至七月，中國知識界（包括中共內部、民主黨派和專家學者），提出大量涉及憲政體制根本改革的建言。包括：

—通過修憲討論形成憲政共識，啟動憲法大修

，把這部非憲政架構的憲法，通過修改建立起憲政體制。

—修憲重點放在制度安排、人權保障、權力制衡與運作程序；細化憲法中的制度安排，使之在執行中具可操作性。

—憲法序言把共產黨合法性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同打敗國民黨、建立新中國等聯繫在一起，是個大錯誤，應去掉。

—人民民主專政與人權相對立，應改為人民民主憲政，增加基本人權內容。

—無罪推定原則入憲。

—軍隊國家化，國家軍事委員會主席由國家元首兼任。

—司法獨立，法院和檢察院行使職權不受任何組織和個人干涉等等。

這些建言驚動了中央。中共中央宣傳部於二○○三年八月，向大學、研究機構、新聞媒體下達文件規定「三不提」：「不提修憲」、「不提政改」、「不提六四」。二○○三年十月十四日，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決定向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出席全會的三百四十二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一致認為，在憲法中確立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指導地位，把黨的十六大確定的重大理論觀點和重大方針政策寫入憲法，有利於憲法更好地發揮根本大法的作用。修改憲法，必須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做到有利於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有利於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有利於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

結果不過讓這部非憲政架構的鄧小平帝國憲法，添上一筆江澤民油彩（「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而已。

第二，提出「執政為民」和「科學發展觀」

胡錦濤、溫家寶執政之初，提出「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五大要

點的科學發展觀。胡溫強調這是「以人為本、全面協調」的「可持續發展戰略」，還提出「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被稱為「新三民主義」。

這些提法，當時人們認為是針對江澤民十三年惡政的「胡溫新政」。江澤民的十三年，在經濟領域特權與資本結合，盲目追求GDP增長指標，資源、能源極度浪費，損害社會公平與人民福祉，以少數樣板大城市的畸形繁榮，掩蓋全國城鄉大面積災難性衰敗。那是造成當今城鄉工農差距、貧富懸殊、生態環境嚴重惡化、官員貪瀆腐敗成風、治安日益敗壞的反科學發展觀。已故經濟學家楊小凱曾指出，這種「中國發展奇蹟」是「後發劣勢」。他援引沃森提出的英文概念「Curse to the Late Comer」，也可譯作「對後來者的詛咒」或「上帝降禍於後來者」。楊小凱認為，「後發展國家若只模仿先進國家的技術，拒絕改革其政治制度，則只能獲取一時的發展，而最終帶來災禍，因為自由市場經濟必須建立在憲政制度的基礎之上，才能保持穩定發展。」這就是楊小凱的「憲政經濟學」（Yang Xiaokai, Economic Reforms and Constitutional Transition, Conference on Constitutionalism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a, Sydney, Australia, January 2003.）

楊小凱到北京時，曾經與北京大學的林毅夫對

陣，展開過一場「後發劣勢VS.後發優勢」的辯論。當時不少人認為，胡、溫的「科學發展觀」與「憲法權威論」，比較接近楊小凱的「憲政經濟學」；對「胡、溫新政」可能糾正江澤民時期反科學發展觀產生的「後發劣勢」，抱有厚望。

第三，以「和平崛起」消解「中國威脅」論

二○○三年十一月，曾任《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主編的鄭必堅，以「中國改革開放論壇理事長」的身份，在博鰲亞洲論壇上發表題為《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亞洲的未來》的演說，首次提出「和平崛起」論（Peaceful Rise）。

接著，二○○三年十二月，溫家寶訪問美國，在哈佛大學演說中提到，中國選擇的是「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

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胡錦濤在紀念毛澤東誕生一百一十周年座談會上，也提到要「堅持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二○○四年三月十四日，溫家寶在十屆人大二次

會議閉幕記者會上，闡述了「和平崛起」的四點含義：

一、 和平崛起就是要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時機，發展和壯大自己，同時又以自己的發展維護世界和平。

二、 和平崛起應把基點放在自己的力量上，依靠廣闊的國內市場、充足的勞動力資源和資金儲備，以及改革開放帶來的機制創新。

三、 和平崛起離不開世界，必須堅持對外開放政策，同一切友好國家發展經貿關係。

四、 和平崛起不會妨礙任何人，也不會威脅任何人；中國即使強大了也永遠不會稱霸。

由於江澤民執政十三年（一九八九—二○○二），中國軍事預算每年兩位數增長，一九九四年高達百分之二十七點三二，二○○一年和二○○二年也達百分之十七點八三和百分之十七點六（實際支出更遠高於此）。胡、溫執政第一年（二○○三），軍事預算降至一位數百分之九點六，同時提出「和平崛

起」，給人們一種印象，似乎將改變江澤民時期的軍事優先路線。

但那時軍權還在江澤民手裡。二○○四年六月二十日，即溫家寶在人大闡述「和平崛起」後三個月，江澤民在「上將軍銜頒授儀式」上頒授了十五名上將之後說，「一場現代化戰爭離我們不遠」。自一九九四至二○○四，十年間江澤民共頒授了七十九名上將。毛澤東終其一生，只頒授了五十七名上將，加上大將、元帥各十名，總共也只有七十七名。江澤民最後一次頒授這十五名上將，高出毛澤東一頭之心畢露無遺。再過三個月，二○○四年九月，江澤民在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交出了他的軍委主席職務。

然而人們對「胡溫新政」的期待，很快就破滅了。就在二○○四年九月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上，從江澤民手中剛剛拿到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的胡錦濤，發表了一篇殺氣騰騰的講話。胡錦濤說：

「一段時間以來，境外敵對勢力、媒體大肆攻擊我們國家領導人和政治制度。而國內媒體打著政治體制改革的旗號宣傳西方資產階級議會民主、人權、新聞自由，散佈資產階級自由化觀點，否定四項基本原則，否定國體和政權。針對這種錯誤，絕不能手軟，要加強新聞輿論管理，不要給錯誤思想

觀點提供渠道。蘇聯就是在戈爾巴喬夫提倡公開化、多元化，造成黨和人民思想混亂中解體的。政治問題一旦出現，要嚴厲打擊，不要熱炒，不要授人以柄。宣傳上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不要讓人猜測。敵對勢力總是從輿論入手，佔領宣傳陣地。」

○九年七月十五日美國新澤西州

胡錦濤把中國帶向何方？

四中全會結束後，中共中央宣傳部於二○○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召開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下達關於加強管理意識形態、打擊自由化思潮的中央文件。胡錦濤在文件上批示：「管理意識形態，我們要學習古巴和朝鮮。朝鮮經濟雖然遇到暫時困難，但政治上是一貫正確的。」

對胡錦濤在四中全會的大動作，當時有各種評論。有的認為胡錦濤「要用毛澤東思想糾鄧小平的偏，走回毛澤東之路」，有的認為只是胡錦濤為鞏固個人權力討好「左」派的策略運用。胡錦濤究竟是怎樣一個人？他將把中國帶向何方？

第一，胡錦濤四中全會講話不是策略運用，是露出廬山真面目。

回過頭看，他的「憲法高於一切」、「執政為民」「新三民主義」，倒是欺騙民眾的策略運用。因為那時權力尚未鞏固，胡錦濤需要輿論支持，從江澤民手中拿到軍權。現在軍權到手，可以大顯威風了。胡錦濤提到的那些「宣傳資產階級議會民主、人權」，「否定四項基本原則、否定國體」等等，不正是當初人們響應他的「修憲」號召，提出的種種建言嗎？今天一棍子打成「資產階級自由化觀點」，還要「嚴厲打擊」、「絕不能手軟」！這是以表明他前一階段的「放」，不但是「騙」，還不無毛澤東「引蛇出洞」的味道嗎？

第二，胡錦濤不是「走回毛澤東」，也不是「用毛澤東思想糾鄧小平的偏」；而是「十足鄧小平」的「兩手硬」。

鄧小平的「兩手硬」，一手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打擊資產階級自由化」硬，另一手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硬。胡錦濤的四中全會講話，正是「左」右開弓，兩手都「硬」！所以是「十足鄧小平」。胡錦濤那些話，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裡都可以找到根據。胡錦濤比江澤民更鄧小平，不會回到毛澤東。江澤民倒是一度離開過鄧小平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提出「以反和平演變為中心」，差點「回到毛澤東」，被鄧小平的「九二

南巡」糾正。

第三，胡錦濤的目標，就是把開放式奴役制度的鄧小平帝國推銷全球。

今年是中國「六四」天安門屠殺二十周年。一個奇怪的現象，是海外和香港媒體，都在競相歌頌當年下令開槍的鄧小平和今日鄧小平帝國的統治者。一篇題為《鄧小平自我平反六四：南巡執行趙紫陽路線》（亞洲週刊）的文章寫道：

「研究六四歷史的學者，都不會不同意：『六四』當天最後下達開槍命令的是鄧小平。這也使他在晚年中背負了歷史的罵名，但也恰恰是他，在生命的最後歲月中，作出了巧妙的安排，實質上自我平反『六四』，讓沒有趙紫陽的趙紫陽路線落實，也讓和胡耀邦關係密切的胡錦濤接上了班，當了黨的最高領導人，也讓當年和趙紫陽一道的溫家寶接任總理，成為政府的最高領導人。」

文章最後的結語是：

「今日的中國，是否可以出現一個沒有胡耀邦

的胡耀邦路線，完成二十多年前中國未完成的政治改革？被視為師承胡耀邦的胡錦濤，是否可以展現『二胡』的魅力，尋回飄遠了的時代共鳴？」

有趣嗎？按照作者的邏輯，在鄧小平「生命的最後歲月」，落實了趙紫陽的經濟改革路線；在胡錦濤統治下的今日中國，落實胡耀邦的政治改革路線也是可以期待的了。

可惜這是神話，或者叫「迷思」（Myth）吧？事實完全不是這樣。

鄧小平不可能自我平反六四

首先，「鄧小平自我平反六四，讓沒有趙紫陽的趙紫陽路線落實」不是事實，也絕不可能。「六四」屠殺「換來穩定和發展」，成了鄧小平晚年得意之舉。愈到「生命的最後歲月」，他愈自我肯定，而非「自我平反」。這在《鄧小平選集》第三卷中處處可見。如一九九一年蘇聯發生八月政變（八月十九日）的第二天（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日），鄧小平把江澤民、楊尚昆、李鵬、錢其琛找到家中談話。鄧小平說：

「中國局勢穩定，一個是處理一九八九年那場動亂時一點也不動搖，再一個是堅持改革開放。我們把工作重心放在經濟建設上，沒有丟馬克思，沒有丟列寧，也沒有丟毛澤東，老祖宗不能丟啊！」

鄧小平始終把「六四」屠殺提到「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無產階級專政不但要講，還要用」的原則高度，一再予以肯定；而且對外宣佈，「以後遇到動亂的事，我們還要戒嚴。這不會損害別人，不會損害任何國家，這是中國的內政。」這才是鄧小平的真面目，他怎麼可能「自我平反」六四？

趙紫陽可能也未能消除對鄧小平的幻想，以為他同鄧小平的分歧，沒有鄧小平同胡耀邦的分歧大，只有「反對戒嚴」一事。但鄧小平卻不這樣看。鄧小平反覆強調，「兩個總書記都沒有站住，他們在根本問題上，就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上犯了錯誤，栽了跟頭。四個堅持的對立面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些年來每年我都講多次，但他們沒有執行。」

《鄧小平選集》第三卷最後一篇一九九二南巡

講話，鄧小平是這樣講的：

「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把希望寄托在我們以後的幾代人身上。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對這個問題要清醒。文化大革命結束，我出來後，就注意這個問題。我們發現靠我們這老一代解決不了長治久安的問題，於是我們推薦別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但是沒有解決問題。兩個人都失敗了（指胡耀邦和趙紫陽），而且不是在經濟上出問題，都是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上栽跟頭。這就不能讓了。」

鄧小平的立場一清二楚。「經濟上出問題」，反對改革開放，提倡鳥籠計劃，都能讓。唯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出了問題不能讓！因為這是「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和鄧小平帝國「長治久安」的大問題。所以對陳雲，對姚依林，對鄧力群能讓，唯獨對胡耀邦、對趙紫陽不能讓！對第三代不能讓，對「以後的幾代」也不能讓。這是鄧小平的「政治交代」，怎麼可能出現「沒有趙紫陽的趙紫陽路線」，「沒有胡耀邦的胡耀邦路線」呢？胡耀邦和趙紫陽，是鄧小平帝國永遠的禁忌，必須在歷史上抹得一乾二淨。

胡錦濤不會師承胡耀邦

其次，胡錦濤與胡耀邦關係並不「密切」，更不會「師承胡耀邦」。

一九八○年代初胡耀邦物色接替團中央書記韓英的人選時，選中的是清華大學的羅征啟。胡耀邦親自對羅征啟進行考察，了解到文化大革命中清華造反派去抓羅征啟，羅不在家沒有抓到，抓了羅征啟的弟弟當「人質」。他弟弟有點弱智，被裝在一個麻袋裡，天氣熱在途中悶死了。粉碎四人幫後追查兇手，追到了那幾個綁架者。

羅征啟看到他們只是普通學生，當時要抓的是他本人不是他弟弟，考慮到這幾個年輕學生在那種大環境下犯的錯誤，主張不要過份追究。胡耀邦很欣賞羅征啟思考問題的這種大格局，加上羅的思想文化水準和工作能力都很強，就選中他到中央黨校培訓後，安排先擔任全國青年聯合會主席，等共青團換屆時接任團中央書記。

羅征啟在黨校培訓期間，發生了一件事。陳雲的女兒利用特權侵佔出國留學名額，社會影響很壞。羅征啟出於好意，給陳雲寫了一封懇切的信，希望他勸女兒放棄以示大公無私，足以挽回影響；沒想到陳雲下達指示，「這種人不可重用」。學期

結束，所有學員都走光了，羅征啟獨自一人留在黨校宿舍等候處理。胡耀邦也無可奈何，最後讓他遠離北京，任深圳大學校長。

後來接替韓英的團中央書記是鄧小平看中的王兆國。胡錦濤是王兆國任書記時，宋平從甘肅推薦到團中央的，曾經接替王兆國做過短時間的團中央書記，因與團中央的「太子黨」陳昊蘇、李源潮們處不好關係，去了貴州，又去西藏。最後提拔到中央政治局，是鄧小平拍的板。鄧小平選他接江澤民的班，看中他的當然是能「師承鄧小平」，而非「師承胡耀邦」。

胡將鄧「中國模式」推銷全球

過去曾有人稱胡耀邦、胡啟立為「二胡」，也是誤解，胡耀邦被廢黜後還向李銳澄清過。胡啟立雖然很長時間在團中央工作，與胡耀邦共事甚久，也只是工作關係。胡啟立被提拔到黨中央，是一九八○年代初他在天津工作時被鄧小平看中決定的。社會上流傳的所謂胡耀邦的「團派」如何如何，這樣的「派系」根本不存在。胡耀邦的確在共青團培養了一些思想開放、喜讀書、勤思考的人才，項南就是一個，羅征啟也是清華大學團委的優秀人才。但這樣的人才，總是被陳雲專政派打擊誣害，胡耀邦

想用也不可得。

胡錦濤初登政壇時，曾被稱作「謎樣的人物」。如今他已執政七年（二○○二—二○○九），只剩下三年任期了，似乎人們還沒有猜到謎底。有人說他「聰明」，有人說他「平庸」；有人說他「開明」，有人說他「保守」；有人說他「師承胡耀邦」，有人說他「回到毛澤東」。其實此謎毫不難解，只需翻翻《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對照胡錦濤之所作所為，就明白胡錦濤走的路，不過是遵循鄧小平的「政治交代」，讓鄧小平所創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即開放的民族主義新奴役制度帝國，「崛起」於世界的東方，並將此「中國模式」推銷全球。

○九年七月十五日美國新澤西州